



國中“孫子的明神”

述自的國報情本日個一

·譯漢宗邵· 著伯恩樊 卷

國中在“孫子的明神”

著伯思樊·意

譯 謨 宗 邵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

行發社版出民國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神明」的子孫在中國

目 錄

田伯烈序	一
第一章	九
我是中國人了	九
向白俄婦女的販子挑戰	一八
張作霖將軍之死	二一
第二章	二七
日本肇起侵略的火炬	二七
第三章	三六

呻吟於滄感之下	三六
曾見土肥原	四四
第四章	四八
日本怎樣統治「滿洲國」	四八
新主人的訓示	五七
我的第一件事情	六六
第五章	七二
會見一個舊相識	七二
好像要中風的樣子	七八
我的助手	八六
第六章	九四
「滿洲」的娼妓	九四

「滿洲」的烟毒.....	一〇四
第七章.....	一一一
日本軍人的報應.....	一一一
一個憲兵長官的狼狽.....	一二六
第八章.....	一三三
復仇.....	一三三
第九章.....	一四四
李頓調查團.....	一四四
第十章.....	一六〇
贊美、獎勵、懲罰.....	一六〇
交換俘虜馬到成功.....	一六七
第十一章.....	一七五

訪問義勇軍的司令部.....一七五

一件愉快的事情.....一八一

第十一章.....一八八

鄉票成爲一時風尚.....一八八

小卡甫斯的鄉票案.....一九五

我發覺了.....二〇零

第十二章.....二一八

「澄湖」是青島的錢袋.....二一八

撈錢——撈更多的錢.....二三三

不盡財源滾滾來.....二三九

第十四章.....二五〇

脫離樊籠.....二五〇

重見上海	二六二
太太的話	二六八
第十五章	二七八
實踐語言	二七八

田伯烈序

一九三六年秋天，我在上海第一次和樊思伯（Amleto Vespa）先生見面。他因為他的眷屬從大連乘輪到上海來，在青島給日本當局扣留，所以他來看我，希望我在新聞宣傳方面幫他的忙。我把他介紹給某報的負責人，此後即音訊杳然。

將近一九三七年年底，樊思伯先生又來看我，據他告訴我，他已經寫成了一本書，敘述在滿洲日本特務機關內工作的個人經歷，希望我在出版方面予以指示。我問他求教於我的原因，他當時這樣回答：『因為閣下知道這些事情，因為閣下也和日本人發生了麻煩（指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向日本當局抗議扣留發往曼哲斯脫導報的電訊一事而言），所以我覺得閣下一定不會洩漏我的秘密。如果給日本人知道了，他們立刻就要來打壓我的。現在既已完稿，我想使它早日出版，愈速愈妙，了却一件心願，我也可以辦



我允許加以考慮，但並未明白表示，因為我當時也在編纂一本書（譯者按：當係外人目視中之日軍暴行），恐怕無暇及此。

隔了一兩天，樊思伯先生送原稿來，我交給一位長於批評的同業，請他坦直表示讀後之印像。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他大為激賞。我仍覺未能滿足，決定再須加以識鑑。我請教一位信實的朋友，他是某國政府的官員，具有各種便利，由他來檢驗書中各節的真實性，是最適當沒有的。他看完原稿並詳細探究以後，要求我安排和作者見面，討論似乎尚欠明朗的幾點。這要求我是接受了，經過幾度的長談，我的朋友確信樊思伯先生講的，全是老實話。

以下是他對於這本書的意見：書內所敘述的各種事實，大多數我是熟悉的；殘暴，兇惡，陰險，腐敗，足以表徵日軍統治被征服人民的方法，這一切是完全給暴露出來了；所以，本書給我以感情上極度衝動的經驗。這對於所謂西方文明的保衛者——希特勒和

的，畢索里尼當然是難堪的譴責。可是，他們如果能夠閱讀一遍，我相信他們也要聳聳不登

立派，這應該是一股強有力的消毒劑。

「這是對於一個階級，一個民族和一個不公平制度的最強有力的公訴。在這制度之下，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爲幾千人的逸樂而做牛馬，集團欺詐集團人類的大部份爲維持製造利潤的手段，不得不過着卑賤和飢餓的生活。」

我又徵求第三個人的意見。「西行漫記」(The Red Star Over China)的作者斯諾(Edgar Snow)看完原稿後，加以批評如下：「關於書內所敘述的事件，人物及其情形，據我所知道的」部份而言，都確鑿可信。這本書在揭發日本統治「滿洲」的內幕上，有着無比的價值。」

我然後親自閱讀原稿，一字一句加以推敲，憑我個人對於「滿洲」的一些知識和

經驗（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我以曼哲斯脫導報和亞細亞雜誌記者的資格，幾次訪問「滿洲」）作爲衡量的標準。我個人敢說，樊思伯先生這本名貴著作的內容，大體上是真實可靠的。

樊思伯先生生於一八八八年，他的故鄉是意大利的阿貴拉（Aquila）從學校中畢業，兵役期滿後，他到墨西哥去參加革命軍，在馬德辣將軍（Francisco Madero）的麾下做軍官，那時是二十二歲。他受傷兩次，晉級大尉。

一九一二年，據樊思伯先生自述，他離開墨西哥遊歷南北美洲，澳洲，法屬印度支那和中國各地，撰稿投寄各報。遠至西藏、蒙古和東部西伯利亞等荒僻的邊陲，也印上了他的足跡。

歐戰爆發後協約國方面因爲他富於遠東的知識和經驗，教他做情報工作。他於一九一六年隨着日本軍隊到濱海省和黑龍江，到貝加爾和尼可拉夫斯克。在那個期間他接辦了許多重要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中最聞名的是張作霖將軍。一九二零年，他成爲

「國外王」的「入幕之賓。」從那個時候起，他儼然是一「滿洲」政局中的重要人物。

可是，樊思伯先生不久就和本國的當局發生了衝突，意大利的軍火偷運到「滿洲」去，如果要使張氏能夠維持境內的安寧和秩序，他必須阻止這一種非法的交易。最後他決定改換國籍，歸化中國。他的保人是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朱慶瀾，東省特別區警察局長溫應星和中東鐵路路警處處長鄂慶全。這並非偷偷摸摸的舉動，而是光明磊落的行為。這樣，他保持着個人獨立的行動和獨立的生活。他雖然改換了國籍，思想上仍未改變，迄今依然是忠實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墨索里尼的虔誠的信徒。

一九二八年，張氏被日方暗殺，樊思伯先生為解決個人生活問題，見經營各種商業。一九三三年，日本人成為整個「滿洲」的主人，也就成為他的主人，他們以威脅的手段，強迫他服務，否則他的眷屬的安全將不可保。在這情形之下，他便成為日本特務機關的勉強的工具，而本書對於全世界所以有無比的重要性，也就是爲了這一點。他居於如此優越的地位，能夠在日本人的特務機關中洞悉其陰謀活動，可謂「前無古人，後無

也「後無來者」。他所說的，都值得我們重視。他毅然決然，把個人非常的經歷公佈出來，尤其值得我們感激。

歸化了中國的樊思伯先生，雖然可以不再受意大利官憲的干預，但「滿洲」被佔領後，日本人却又掌握了他的命運。鑑於一案大小生命的岌岌可危，他不得不忍辱負重，暫時屈服，可是，他對於日本人奴役「滿洲」人民所採取的各種方法，則不勝其憎惡憤懣，這一種情緒與紙上，他竭力掙扎，擺脫日本人的枷鎖。

他以獨特的風格，敘述親身的經歷。一連串的事實使他對於整個日本民族，懷着強烈的嫉恨，本書就是在這一種情緒之下寫成的。不過，他對於少數的日本官憲，像武藤大將和大井大佐等，也寫了他們的優良的品德，而予以最崇高的贊揚。

據我個人的意見——同時也是本書出版人的意見，我認爲日本大多數的國民，都能耐勞吃苦，宛如中國、印度或歐洲的農民。日本軍閥和財閥的罪惡，日本人民大眾是不能負責，不能代人受過的。澈底分析起來，他們正像中國的民衆一樣，也做了日本統治階

級——軍閥和財閥的犧牲品。日本皇族所以有一切對爲虐亡的表示和行動，一部份是由於他們並未瞭解事變的真相，一部份則由於他們中了歪曲宣傳的毒藥，以爲光榮和霸道是同樣的東西。

樊思伯先生向我索序，特將本書出版的經過情形和作者個人的經歷，簡單介紹如上。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於倫敦

第一章

我是中國人了

我從一九一六年起，就在遠東做情報工作，因此認識了中國的許多文武官員。其中大名鼎鼎的一位是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將軍，他知道我幹的玩意兒，曾有幾次教我，留俄中國人的實在情形隨時相告，並且教我供給其它重要消息。他屢次向我表示，要是我決定久居遠東的話，他很希望我能夠替他工作。他提出的待遇是非常動人的。那時，大戰剛剛結束，歐洲的情形十分黯淡，我仔細考慮一下，決定接受他的好意，於是從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便成爲張作霖將軍麾下的一個情報員了。

張氏囑付我，除了黑龍江督軍吳俊升將軍外，不准向任何第二個人知道我是替他工

作的；吳氏是張氏的心腹，一切都向吳氏接洽請示，但我必須令人相信我仍然執行着本國或協約國的命令（大戰期間，我為協約國當帶戰機團服務，曾在「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處工作。）

在瀋陽，我很少和張氏見面的機會，如果必須和他見面，時間一定是在黑夜，我穿了中國衣服，戴了黑色眼鏡，帽緣遮着眼角，跟隨最親信的副官同去。

我在張作霖將軍那裏服務，匆匆有八個年頭。張氏確是一個重信義富勇氣的人物，對於忠實的部下，張氏不愧為一個出色的領袖，對於觸犯錯誤濫用職權的左右，非常嚴峻，對於叛徒和好細，更絲毫不肯寬借。

那許多年間，我有時在俄國，有時在蒙古，有時在朝鮮，有時在中國，以不同的姓名和護照出現，進行我的工作。

我的任務是相當繁複的：搜集政治上的消息；注視各國情報員的活動；追索土匪，軍火和毒品的私運商人；白俄婦女販子；並設法探聽和「日本」方面的活動。

爲便利工作起見，我往往在不同的地方擔任不同的職業。譬如說，在蒙古的時候，我儼然是一個開發金礦或煤礦的大企業家；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到俄國去的時候，我的名義是中國政治調查團（研究如何恢復俄國與東三省的鐵路交通和商業）的秘書；一九二二年在滿洲里的時候，我是一家中俄報紙的編輯；以後在庫倫的時候，我的身份則爲幾家報紙的通訊員。

一九二三年二月，我奉命回到瀋陽，調查私運軍火的事情，那時私運的規模，已經相當駭人。

我把最初兩個月的光陰，化費在山海關、秦皇島和京奉路沿線。我的努力並非徒勞無功。三月二日，我破題兒第一次沒收了私運的來復槍五百枝。那些來復槍是意大利製造的，在離山海關九哩的地方給我破獲。三月二十二日，我又沒收了來復槍一千枝。四月十二日，我的部下也在北戴河附近沒收了意大利的自動手槍二百枝。四月二十七日，我更在內地破獲私運的來復槍二千枝。那些軍火統是運到關外去供給土匪的。要提高生

活的水準，要促進關外的繁榮，必須先恢復治安和秩序。因此軍火的不斷私運，顯然使張作霖將軍一天比一天感到麻煩。

我的活動當然不能夠隱瞞中國社會和有關係的國家。不久我便成爲各方面注目的人物了。七月七日我在天津的時候，意大利總領事卡勃萊利（Cabrini）教我去看他。

我不得不去拜訪本國的總領事見面之後他就問我在天津幹些什麼事情。我說，我是到天津玩玩的。

別胡說八道！我懂得你想在天津攪什麼鬼。可是，我現在警告你，不管中國政府當局怎樣命令你，你是意大利人，還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你再跟我搗亂，我老實不客氣要逮捕你，驅逐回國。滾出去，沒有別的話！

我早就疑心華北私運軍火的事情有幾個外國領事在暗中接應，所以我受着本國總領事的恐嚇，毫不驚奇。可是，我必須履行自身的責任，不管違犯中國法律若是誰，我決

定忠於職守。

那一個夏季，我除了沒收來復槍手槍等幾千枝外，還破獲嗎啡海洛因二百公斤，鴉片一千五百公斤。

十一月十四日，我獲得日本官方的同意和中國主人方面的幫助，搜查停泊天津的日本輪船，抄出意大利製造的來復槍四千枝。那些來復槍是裝往廣東的。第二天，意租界捕房的總巡在報上發表正式聲明，稱「在日本輪船上被中國當局所抄出的軍火，雖係意大利製造，但並非天津意海軍庫房中的存貨。」這聲明是很有趣的。

十一月十八日，意租界捕房內的某君來看我。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他顯出非常不安的神氣對我說道：

樊思伯君，我現在要幹一件事，心裏不願意幹的事情。卡勃萊利總領事吩咐我來向你傳達驅逐出境的命令，必須立刻執行。半小時之內，你必須趕到火車站，乘十點四十五分鐘的火車離津赴滬。不准和任何人見面，也不准和任何人通電話，你只能夠告訴你的

太太，說有緊急使命必須立刻動身到上海可是不能夠說出被驅逐的事實。如果你要和任何人接洽，我就只好把你扣留起來，押解到火車站，這是上面的命令。我派人在花園裏等候着。我知道我現在幹的事情，對你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我不得不執行上面的命令。我希望你不要違抗逮捕，不要使這一件事情成爲公開的醜聞。如果你能夠一言爲定，我就帶了護送隊上火車去等候你。

我仔細一想，只好接受他的辦法，向可憐的朋友點點頭，然後告訴我的女人，說有緊急的公事，必須立刻赴滬。半小時以後，我便被禁在一輛客車裏面，護送的有四個水兵和可憐的朋友。此君目前還留居中國，他可以證明這一件事情。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一行六人抵達上海，他們立刻把我送到意大利兵艦卡拉勃利亞（Calabria）號的密室中。

微倖得很，卡拉勃利亞號兵艦的艦長是一位真正的意大利人，他馬上喚我出去，詢問原因。我把經過的情形一一相告，他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上海總領事達西（D'Arcy）。

(三) 表示不能夠允許任何人利用意大利皇家的海軍，以行使非法的手段，要求於下午四時交到證明我犯罪的正式文件，否則將恢復我的自由。總領事迄無文件送去，過了五分鐘，我離開兵艦，又是自由人了。

兩天以後，副領事佛拉傑洛 (Ferrajolo) 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分別要求逮捕樊思伯，據說是卡拉勃利亞號兵艦上擅自棄職的水兵。

公共租界捕房的總巡，為人非常嚴正，他接到了逮捕狀後，就去訪問意國總領事，他這樣表示：如果逮捕狀上的像片，確是代表他們所欲逮捕的樊思伯，這毫不費力，立刻就可以照辦，因為樊思伯那時正在總巡的家裏，可是領事館方面必須取銷逮捕狀上「擅自棄職的水兵」等字樣，因為據他知道，樊思伯僑居中國，已經有十五年了。如果要逮捕的是另外一個水兵，那末，逮捕狀上誤貼像片，必須掉換一張。

中國政府也向意大利公使提出抗議，但後者表示樊思伯既是意大利人，中國政府實在沒有干預的理由。

這一件事情成爲上海報紙上公開討論的問題。天津總領事始終不肯取消驅逐回國的命令。最後，我和警務當局商量之下，決定向領事館自首。在正式開庭的時候，我詢問主審的副領事佛拉傑洛，我到底犯了什麼罪。他回答不出，含混其辭，似乎承認不無錯誤。我又恢復了自由。

幾天以後，我又應召赴領事館，據他們告訴我，本國的公使希望我離開中國，一切旅費由他們擔負，並允許另外贈我五千塊錢。我堅決拒絕這種可恥的交易。

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那一天，我經過鄧脫路的時候，暴徒刺傷我的胸部，逃逸無蹤。中國當局要求逮捕曾經當過水兵的意大利人塔布利（Tamburi），認爲他是暗殺的主使人。可是，意大利官方竟加以拒絕，甚至不願加以調查。另一意大利人曾有兩次謀害我的生命，均未成功，他的同黨——三個白俄和一個印度人，雖受哈爾濱中國法院和英國領事法庭的嚴厲懲罰，意大利當局却始終未加詢問。此君目前還在上海。

我不久回到哈爾濱。不料本國的當局對我仇視，使我無法維持誠實的生活，我於是

決定改變國籍。

我是中國人了。我的保人是朱慶瀾將軍，東省特別區警察局長溫應星和中東鐵路警處處長鄂雙全。做了中國人，我就可以向所有匪徒挑戰，不受任何人的阻礙了。

又有二次暗殺的企圖，請看下面一條新聞：

「（一月十二日哈爾濱特訊）關於上月企圖暗殺本埠大西洋影戲院總經理兼股東之樊思伯一案，從犯印人布辛（Burr Singh）業已就逮，且已引渡上海英國當局，惟主犯意大利人康多維洛斯（G. Condoveros）仍無被捕消息。按暗殺計劃係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覺，發覺後，印人即以同謀嫌疑就逮，英國領事乃要求引渡。此間對於康多維洛斯迄未被捕，依然逍遙於哈爾濱一點，深覺奇異，傳說紛紜。樊思伯旅華多年，與東三省情報機關密切聯繫，對取締共產黨與私販軍火者之活動，貢獻殊大。故此陰謀，恐與彼之工作，不無關係也。」

向白俄婦女的販子挑戰

流氓，匪徒，私運商人，白俄婦女的販子，一切惡勢力，都向我挑戰，好像我向他們挑戰一樣。

我注意的第二個目標是白俄婦女的販子。

從俄國逃亡出來的白俄，百分之九十都居東北，其中十分之九赤貧如洗，好像老鷹一樣，白俄婦女的販子紛紛趕往瀋陽、哈爾濱等處，挑選最漂亮的年青婦女，據說是把她們從飢寒交迫的絕境中，送到比較溫暖的地方去。我做特務和警務工作，接觸的罪惡集團，不知其數，但勢力最大，組織最好，最有錢和最頑強的首推白俄婦女的販子。我曾經破獲許多販賣婦女的機關，都因法官受了賄賂，搗塗了事，犯人依然逍遙法外。

和十年以前一樣，沙皇時代的一個貴族目前還是白俄婦女的事實上的暴君。他先後被捕二十三次，都有非常確鑿的證據，却被判了二十三次，保證金有時竟達二萬二

或二萬五千元。

情形非常糟糕，中國當局後來覺得沒有辦法，非限開眼閉，假作癡聾，就只好採取非法的手段，去對付他們。許多外國的「冒險家」也以領事裁判權為護身符，經營這一種罪惡的買賣。

兩個瑞典人橫行東北，已有一二年。一天，他們領着六個華貴的姑娘上哈爾濱火車站，另外派人護送她們到天津去，她們的職業據說是「女管家」。我的夥計把兩個瑞典人當場捉獲，因為經過法律手續，必然毫無結果，便把他們拖出火車站，吊上鐵路附近的電桿木，活活斃死。

一九二六年，一位衣冠端整的法國人，下榻哈爾濱的「摩登飯店」(Hotel No. deime) 佔據兩個設備最佳的房間，舉止甚為闊綽。第二天，他在當地各報大登廣告，招聘女打字員，年齡須在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之間，待遇優良。我吩咐幾個助手去監視他的行動。二十四小時以內，果然有二十多個少女前往報名應徵，他發給每一個投考的姑娘

二十塊錢，全部錄取。

我親自到「摩登飯店」去訪問他，他已準備動身了。我對他說，我有兩個女兒，急欲找尋適當的職業，但在領她們去應徵之前，我先要確實明白這職業是否高尚可靠，是否有相當收入。法國人看我一眼，問我是否知道他的來歷，他說：「我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秘書，我是來替公董局招聘縮記員的。」實則他並非法國人，而是保加利亞人，和上海法租界當局毫無關係。

「可是，我的女兒不懂法文。」

「不要緊，上海法租界現在已有兩萬多俄國人，所以懂俄文的人更有用處。」

我覺得反攻的機會已到，便對他說：「好極了。你的話正是我要知道的。請你看一看我的名片。如果你不坐今晚九點鐘的火車離開哈爾濱，當心你的性命。老實告訴你，這裏是不許人肉的販子猖狂的。」

法國人連夜離開哈爾濱，一個女打字員也沒有帶去。

日本人佔領了東三省後，撲滅買賣白俄婦女的活動，立告停止。我也開始替日方工作，我親眼看見我的上司收受賄賂，准許開設妓寮和人肉的「徵集中心」以供輸出。

有一個晚上，我的夥計在齊齊哈爾火車站，聽到一輛貨車中傳出悽慘的叫喊聲，打開車門一看，裏面原來藏着一個白俄婦人，名羅森寶（Ira Rosenbergs）和十一個中國少女，都不滿十六歲，兩個可憐的小姑娘，已經凍死。白俄婦人只出了幾塊錢，向她們的父母購買到手，準備送往天津。我吩咐結束她的性命。當夜獄吏就把那惡魔絞死。這件事情發生於日軍佔領齊齊哈爾的最初幾天內。

張作霖將軍之死

從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就在東北最好的統治者——張作霖將軍的麾下，以拙劣的武器，為維持法律與秩序，而進行猛烈艱苦的鬥爭。

張氏生於一八七六年，他的故鄉是奉天省的海城縣。他的青年時代充滿傳奇式的

故事。據說有一次他闖進縣衙門，痛罵縣官欺凌窮人，當場審問，判決死刑，並且立即執行，然後邁步出外，衙門裏的上下下，都目瞪口呆。

日俄戰爭時，他投效日軍，擾亂俄軍的交通線。他的功績是很大的，在戰時結束後，日方向北京政府代他請求特赦，並且委任他做奉天省的督軍。他從此飛黃騰達，青雲直上，東三省也走上發展的大道。一九二二年，他初次離開「滿洲」，參加關內的戰爭，却為吳佩孚將軍的軍隊所擊敗，仍退出關外，宣佈東三省的獨立。

張氏是一個高明的行政官，却也是一個無情的獨裁者。他沒有受過教育，也無所謂教養，可是，他具着驚人的智慧和記憶力，足以彌補這缺陷。東三省農民的生活，比較關內若干省份和朝鮮農民的生活，更為愉快，這不得不歸功於張氏。東三省本來只有一百萬左右的人口，其中土著僅佔半數，在他逝世的時候，東三省的人口已經超過三千萬了。每年有成千整萬的中國人，甚至有許多日本人和朝鮮人，到東三省去開闢新地，作久居的計劃。

張氏性情暴烈，可以引用下面的一件事情做例證。東三省的銀行家，以罪惡昭彰的手段，操縱貨幣；張氏邀請比較重要的九人，到瀋陽舉行會議，當場向他們發表簡潔扼要而截爽快的演講。他說：

你們操縱東三省的貨幣，毀壞農民和商人的幸福和利益，發了大財，這一點我早明白，你們也必然同樣明白，我過去曾經警告你們，要你們負責，你們却當做耳邊風。現在我正式告訴你們：你們是銀行家的重要份子，你們對於這一種投機操縱的事情，要是不能夠加以阻止，這是你們的才力不堪勝任，要是可能加以阻止而不願加以阻止，這是你們共同舞弊。這兩種罪狀都應該處死。」

五分鐘後，張氏的庭院裏就滾着九顆人頭。

許多年來，張氏屢次利用日本人以實現自己的企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郭松齡將軍發出通電要求張氏下野，他的軍隊也紛紛向瀋陽推進。張氏的部下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到了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郭松齡將軍的軍隊距瀋陽很近。但張氏並非毫不準備，他爭取了這一個時間，一方面說服日本人，加強南滿鐵路沿線的防禦力量，宣佈郭軍不能開入離鐵路線二十哩的區域內。這就是說，郭軍不能佔領瀋陽。另一方面，他改編軍隊，給予新的配備，把一個師團的日本兵換上中國軍隊的制服，幾天以後，他就下令反攻，獲得完全的勝利。郭松齡將軍夫婦雙雙被擒，立刻就刑。

一九二六年，張氏受了日本人的慫恿，進據北京，坐鎮兩年。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掃蕩全國，勢如破竹，達到了濟南近郊。控制膠濟鐵路的日本軍隊，阻止北伐軍的進展。張氏看見風勢不佳，急欲回到關外。當時實際負責主持東三省要公的吳俊升將軍，也敦請張氏回去。

可是，日本駐華公使却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警告張氏，不要出關。這也許就是張氏于五月二十六日決定迅速離開北京的直接原因。

張作霖將軍的東京情報員史溫哈 (Swineheart) 探得日方企圖在中途暗殺

張氏的消息，曾於五月三十一日鄭重通知張氏，不要乘坐火車。張氏不信，以為是謠言，却把這一件事情告訴日本駐屯軍的志賀大佐。志賀大佐笑容滿面，並向張氏表示，為證明謠言的無稽起見，他將一路伴隨張氏同往瀋陽。六月二日午夜，火車離開北京，我也同車而去，不過到天津我就下車，進行調查某項事件。

六月四日，日軍當局通知吳俊升將軍，赴瀋陽之南二十公里的車站去迎接張氏。吳氏當與若干高級官員前往，登車拜謁張氏，同返瀋陽。一路之上，志賀大佐確乎始終與張氏同居一室，可是在火車到達瀋陽前的十分鐘，志賀大佐忽然起立，據說要到隔壁的房間裏去取軍刀和軍帽。實則他一直走到了最後一節的客車內，因此幾分鐘後，當路軌交叉處爆炸的時候，他的地位相當安全。張氏和吳氏所坐的一節車，當場炸裂，吳氏和他的同僚十七人當場炸斃。張氏身受重傷，幾小時後呼吸最後的一口氣。

這一次暗殺係出于日人的預謀，這是無可懷疑的。日方把爆炸物安置於岔道的底下，保護那一段鐵路的本來是中國兵，幾天以前就由日本兵換防。

張氏逝世後，張學良將軍承襲父蔭，統治東三省。他對於國民政府更具同情，往往採取直接反抗日本的政策。楊宇霆將軍屢加勸告，始終無效。這樣，加速了日本以武力侵略東北的決心和行動。

第 二 章

日本擎起侵略的火炬

張作霖將軍逝世後我整個的生活是改變了。張學良將軍知道我的能力，繼續利用我。可是，我爲了增加收入，以應付開支起見，不得不經營各種商業，運道不壞，常能賺錢。不過，我的生命一向沒有脫離危險，而且，更爲惡劣的日子尙未到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夜南滿鐵路附近的日本軍隊，依照了預定的計劃，潛越防區，佔領瀋陽城，盤踞兵工廠和飛機場，中國軍隊猝不及防，慘遭殺戮。關於這一件事情，川本中尉曾發表聲明，足以代表日方的解釋，聲明的內容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夜，我和士兵六人沿鐵路線舉行演習。我們突然聽到

爆炸的聲音，相去不遠，我們知道路軌已被炸毀。我們正在調查進行的時候，藏匿在附近的中國兵，約百人左右，突向我們開火。我立刻報告相隔約一千五百碼的第三中隊的長官。當時，長春開來的特別快車已馳近出事地點。為避免發生慘劇起見，我命令部下放槍數響，警告司機人，但司機人並沒有懂得這意思。他繼續前進，居然神祕地越經爆炸的地點，並未出軌，終於準時安全抵達瀋陽。

這是對外的公開的解釋。日本軍部向士兵所散發的小冊子，內容完全不同：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夜，鬍匪將軍張學良（即鬍匪將軍張作霖的兒子，許多年來橫行東北，苛征暴斂，無所不爲）的軍隊，在瀋陽附近的南滿鐵路，埋置地雷，企圖傾覆從長春開往瀋陽的日本火車。川本中尉和士兵六人恰巧在出事地點的附近，舉行演習。他是武士的直屬血統的後裔，推算爲第四十八代。路軌已經燬壞了幾碼，火車愈趨愈近，川本中尉知道浩劫就要臨頭，已非人力所能挽回，乃遙向日本膜拜，祈求天照大御神和天皇保佑，虔誠的禱祝，獲得上蒼的感應。火車馳近出事區域時，飄飄然臨空而起，

過了危險地段後，又飄飄然降落地面，繼續前進。火車的司機人，火夫，川本中尉和六個士兵所提供的憑據，都足以證明這一個超自然事件的真實性。這一個事件更足以向全世界顯示，日本民族確是起源于神明。

事實的真相却是這樣的：日方等待火車馳過以後才把路軌炸燬。據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實地視察的結果，也完全承認這一點。而日方炸燬路軌的唯一目的，則在于攝取照片，以證明官方的解釋確乎合理。

對於炸燬路軌的事件，中國人方面不僅毫無關係，而且也完全沒有這種企圖。中國軍隊睡在營房裏，毫無準備，連槍械都未及領取，大多數束手就戮，日軍然後焚燬營房，消滅罪惡的痕跡。

遼陽營口和鳳凰城的日本軍隊，在事變的前一天接到命令，于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向瀋陽開拔。九一八事變，係出于日方的預謀，這是最有力的證據。各處的日本軍隊在炸燬路軌的七小時以前，便紛紛向目的地出動。十九日上午四時，成千累萬的傳單已經

張貼于瀋陽的街衢，宣稱東三省當局竟命令部下襲擊日本經營的鐵道，故有加以聲討的必要，並通告居民不必驚惶。按先後相差僅六小時，在這六小時之間，要查明事實，要起草，印刷並分散這許多傳單告示，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呵。

有一個白俄叫格勒琪（Giere）將軍。他一度曾受張作霖將軍的雇用，因與蘇聯方面發生關係，致被辭職，而受蘇聯方面的雇用，後來又投到日本方面去。他當時是俄文報的主筆，九月十八日，他也從日軍最高當局直接收到同樣的一檄文，和一告瀋陽白俄僑民書，一囑他在報上發表。第二天的俄文報就刊載着「檄文」和「告瀋陽白俄僑民書」的全文。

在事變尙未爆發的一星期以前，日本派遣各種工程師、電學專家和機械師到瀋陽，表面上是爲了設立新的電燈廠，實則那些專家們從未提倡創辦電燈廠的計劃，他們是來接管瀋陽兵工廠的。兵工廠的中國職員于十九日全部給日軍槍殺，那些專家們就取而代之。十九日的黃昏，駐守鐵道線和朝鮮的日軍，紛紛向「滿洲」推進。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即在九一八事變的四個月以後，日軍佔領哈爾濱。

哈爾濱是俄國人經營建立的，頗具歐洲城市的風味，被日軍佔領的時候，哈爾濱有居民三十萬，其中十萬是俄國人，二十萬是中國人。這是東三省鐵路網最重要的一個中心。

那一天上午十時，隆隆的砲聲，軋軋的機關槍聲，愈來愈響。日機低飛于中國營房的上空，掃射失去了戰鬥力的和沒有武裝的中國士兵。本來在兩星期以前，哈爾濱的商業活動，就已經完全停滯，大家閉門不出，整個街道宛如死市。從淪陷區域內逃到哈爾濱的難民，超過十萬人，他們講起自身所受的苦難，轉瞬即逝，哈爾濱充塞着恐怖。

中午，槍砲聲突然沉寂。下午二時半，架着機關槍的摩托腳踏車，從各方侵入市內，騎兵、步兵、坦克車、裝甲車，接踵而來。當機關槍隊通過各街道的時候，站崗的警察被解除武裝，每一個崗位由兩個日本兵駐守，白俄數千人則手持太陽旗，向日本兵歡呼萬歲，許多年青的白俄姑娘也臨時被雇出動，歡迎日本的步兵隊，向軍官獻花甚至獻吻。午後並有

白俄一萬人以上，遊行全市，高呼贊揚日本人侮辱中國人的口號。

◎ 俄國革命爆發後，成千累萬的白俄逃亡「滿洲」，中國當局對於那些逃亡者，一律以友人相看待。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每天有白俄入境。不管有沒有護照，不管是不是良民，中國當局一律給予熱情的歡迎，使能安居。現在上海的白俄三萬人，大多數來自哈爾濱，他們可以證明這些事實。中國當局確曾竭力設法減輕白俄僑民的苦痛，把他們安插到政府機關、軍隊、警務、鐵路、礦山和其它機關。對於白俄僑民所成立的各種組織，中國當局不僅加以贊同，並且給予資助。白俄僑民有參預市政府行政的權利，有被選為商會會員的權利。

如今他們却以怨報德，忘恩負義，向侵略者歡呼萬歲了！這卑鄙醜惡的行爲，究其何種動機呢？很簡單，他們想在「滿洲」的領域內，成立一個白俄政府。這是他們渴望已久的幻夢。日本人爲騙取二十五萬白俄僑民的好感，曾允許幫助他們實現這一個幻夢。

他們真是可憐的，愚笨的，易受誘惑的一羣，歡呼萬歲的熱烈表示，不久已成過去。在

很短促的期間，他們就恍然大悟。幾星期後，大批的人或逃避出境，或被捕入獄，或慘遭槍殺，他們的金錢和財產，變成了日本人的私蓄。更有許多年青的白俄姑娘，受着日本兵的污辱。

大規模的沒收財產，逮捕，拘禁或殺戮，幾乎是每天的必然程序。白俄僑民熱烈歡迎勝利的侵略者，却獲得這些酬勞。白俄女子向野蠻的軍隊獻花獻吻，日本人却以死亡和羞辱相報。

現在，滿洲一稍有地位的日本人，都娶了一二個俄國小老婆。日本人強迫年青的白俄姑娘在家裏侍奉，一個月給中國的紙幣五元，可憐的白俄僑民呵，今天你們歡呼萬歲，明天你們就萬分懊悔！

日本的軍隊源源開入，奇怪的謠言四面散播。大家懷着恐怖危懼的心理。大家切切私語着日本兵奸淫擄掠屠殺的各種暴行。二月十日的早晨，我親眼看見在離開日本騎兵營房只有幾步的地方，躺着兩個中國青年女子的尸首。她們是受過污辱後，再被勒死

的。一個中國人自告奮勇，向警察局報告目覩日本兵拖出尸首的事情，一去不返，當天晚上，俄婦薩利門夫人（Salimova）在街上給四個日本兵剝光衣服，赤身露體，受了一頓侮辱。

像這種暴行，每天要發生許多次，成爲談話的主要材料。真是恐怖的時代，大家都爲了自己的安全擔憂，大家想離開「滿洲」。

我個人却無所恐懼。這許多年來，我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常和日本軍事當局接觸，他們對我向以另眼相看。至少我覺得如此。何必恐懼呢？

我和當時任關東軍參謀長，旋任陸相，現任華北軍總司令的寺內大將，當時任「滿洲」特務機關長的鈴木大將，以及日方其它重要人物，都經過鄭重的介紹，發生關係。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大佐也是我要好的朋友，他曾經給我介紹了許多日方的高級官員，我還有日本駐意大使對我頗爲誇獎的一封介紹信。那末，我何必顧慮到個人的安全呢？

日本人確乎常常相當地尊重我。據我猜想他們是會繼續尊重我的。從所見所聞的一切加以推斷，我並無恐懼日本人的理由。事實上我在中國人面前常常替日本人盡居間調停的義務。可是，我也欺騙了自己。我的幻夢不久就完全覺醒。

第三章

呻吟于淫威下

在「滿洲國」政府內做事的中國人大多數是受了日本方面的脅迫，不得不繼續服務。這是整個計劃的一部份。日本人可以向全世界和國際聯盟表示：「滿洲國」的成立是出於「滿洲」人民的自決，是革命的產物，而和他們無關，他們也不能負責。

十五萬日本軍隊，一萬八千日本憲兵，和四千日本秘密警察，在保護「滿洲國」人民，撲滅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和土匪的藉口之下，長期駐守東北。

日本人控制整個行政機構，掌握全權，也是爲了保護「滿洲國」人民。在名義上他們是「顧問」。「滿洲國」內這樣的「顧問」不下十萬人。每一個部份，每一個辦公室，

甚至每一個公務人員，都有一個或幾個「顧問」。他們管理一切，支配一切，頭指氣使，隨心所欲。

這些「顧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在日本軍隊佔領「滿洲」後，阿貓阿狗的日本人，只要能夠講一點蹩腳的中國話，或俄國話，都搖身一變，成爲「顧問」。他們全是犯罪的惡棍：騙子，「冒險家」，私販毒販，妓院的老闆，幾乎沒有例外。這一類惡棍佔東北日本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受着日本法律和領事裁判權的保護，逍遙於中國法律的圈外。過去中國當局爲避免發生「意外事件」起見，令警務人員眼開眼閉，不加干預，因此日本人是格外肆無忌憚了。

這些寶貝榮任了「滿洲國」政府的顧問。

昨天他們還是社會的渣滓，爲人人所蔑視，爲人人所憎厭，今天他們突然做了各行政機關的首腦，小人得志，大權在握，對於被統治的中國人和俄國人，當然極盡欺凌殘酷的能事。要是你不先買通了他們，你就不能夠移動到任何地方。要是他們能夠控制空氣

的話，他們也許已向每一個人徵收呼吸稅。哈爾濱警察局的「顧問」上任幾天，就命令逮捕殷實的中國人和俄國人，教他們出重價保釋。法院裏判決是非曲直的，也是這些「顧問」。所以，富人打官司必佔上風，窮人則常常敗訴。

這裏，我來介紹一個典型的日本「顧問」，使讀者對於「滿洲國」的「顧問」統治，更有恰當的瞭解。

中村康斯坦丁·伊凡諾維支 (Konstantin Ivanovich Nakamura) 是一個日本人，從名字上看來，他已皈依俄國的正教。但日本人終於還是日本人，他在東三省和朝鮮各處，住了二十多年，原業剃頭司務，在哈爾濱近郊納哈洛夫卡 (Nahalovka) 地方開設一家理髮店，那是罪惡的大本營，不過，中村對於剃刀和剪刀並沒有什麼興趣，他的理髮店僅屬空門面，真正的營業是販賣嗎啡、海洛因和鴉片。此外，他還是一家妓院的老闆。中國官方爲息事寧人起見，對於販賣毒品和娼女的日本人，一律加以寬容。可是，如果那些亡命之徒太不守範圍，中國官方也就不採取行動，以敷衍面子。因此，中村和

哈爾濱警察局發生了三次關係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三年。中村和俄婦同居，俄婦是孤孀，有十一歲的一個女兒。幾個月後，中村強姦那小姑娘，俄婦報告警察局，警察局逮捕中村，引渡到日本領事館，日本領事館認爲他並未犯罪，因爲據日本法律他「購買」了母親，同時也就「購買」了女兒，換一句話，女兒已經變成了他的私產。

第二次是在一九二六年，有一個白俄到他的店裏去理髮，受了藥物的麻醉，身上五百塊錢被劫一空。他一覺醒來，發現巨款已不翼而飛，奔去報告警察局，和以前一樣，中村又被引渡到日本領事館。據領事宣稱，白俄實在是喝醉了酒，並沒有上述藥的事情，中村又恢復了自由。

第三次是在一九二八年。中村又因姦養十二歲幼女洩慾的獸行被捕，又經無罪開釋。

關於這些事實，我個人可以提供證據。

如今中村是哈爾濱日本憲兵的總顧問，是白俄僑民局的總顧問，是白俄學校的監督，是佛拉德米爾大學（Vladimir university）的名譽副校長，是哈爾濱唯一的紅人。

「滿洲」人民的痛苦，正方興未艾。成千累萬的亡命之徒，從日本侵入「滿洲」，宛如一羣一羣的吸血鬼，他們是最卑劣無恥的惡棍，一部份也許是蒙天皇大赦出獄的囚犯。他們褻瀆上帝，蹂躪人類和壞毀自然的各種罪行，非筆墨言語所能形容。「滿洲」各主要城市，沒有安全的時間，也沒有安全的空間。日本浪人白天拷打並劫略中國商人，日本警察袖手旁觀，毫不阻止。白種婦女到處遭遇危險。日本人常常剝光了她們的衣服，加以污辱。日本人儘量散播着恐怖。

我舉出下面的一個例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S. K. 夫人偕十六歲的女兒同行於杜戈佛（Torgova-
街）。一羣浪人把母女兩人拖入室內，先污辱母親，再由四人輪奸女兒，並脅迫母親目

觀戰行。

事後，母女兩人到附近憲兵隊，向一個下級軍官報告經過。

下級軍官帶着譏笑的口氣問母親：『他們强奸你的女兒，你有什麼證據呢！』

『我可以領你到那屋子裏去。醫生可以來檢驗她的下部。』

『好！我立刻就來把她檢驗一下，請你們走進這一個房間。』

她們走進房間後，兩個憲兵執住了母親，下級軍官和翻譯（也是日本人）輪流奸污已經失去了知覺的女兒。事後，下級軍官把母女兩人送入中國監獄，她們的罪狀是暗操淫業。

一個月以後，S. K. 先生從中國人方面，探悉妻女的下落。日本人強迫他交出五百塊錢，否則不能釋放。在繳款的五天以後，即在三月二十八日，日本軍官當局傳S. K. 先生前往，當面警告他，要是有一句話不利於日本人，就把他槍斃。

哈爾濱俄文報紙，最初曾刊載關於暴行一類的消息，日本軍事當局嚴令各報，絕對

不能用「日本人」三字，否則將受停刊的處分，並嚴令各報應以「外國人」三字代替「日本人」。因此，凡是「日本人」犯的罪，都變成「外國人」犯的罪了。

咖啡店，菜館，和酒排間的老闆——中國人或俄國人，簡直沒有辦法對付日本浪人，不管白天或晚上，他們神氣活現地衝進館子，吩咐夥計專誠侍候他們，儘量吃喝一頓，然後揚長而去。這一種劫略行爲，並不限於浪人，也是憲兵和皇宮的日常公事，而且，情形更壞。因為他們除了白吃白喝，席去時，還要順手牽羊，凡留聲機，收音機，台盤，酒瓶，圍椅，尤其是金銀飾物，他們都愛不忍釋。他們對於時鐘，特別嗜好。到「滿洲」的日本憲兵，竭力搜括，幾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們帶了這些「紀念品」，滿載而歸。

在大連登輪回國的日本兵，差不多個個攜着大批贓物，其中常常可以看到時鐘，收音機，或留聲機。

中國人和俄國人，尤其是婦女，呻吟於日本浪人，軍隊，憲兵和「顧問」的淫威之下，受着不可想像的苦難。日本侵略「滿洲」，殘暴成性，慘無人道，我們翻遍了野蠻部落的

戰爭史，實找不出一個例子。過去野蠻人雖然也屠殺劫掠，但僅取快於一時，現在日本人却以不慌不忙井然有序的步驟，來完成屠殺劫略的任務，他們抽取被犧牲者的鮮血，使長期陷於不死不活的狀態中。

城市中所發生的事態，固已駭人聽聞，可是，如與鄉間滿目荒涼飽經蹂躪的現象比較起來，則大有相形見拙之勢。凡日本軍隊所經過的地方，一律是死亡遍野，廬舍為墟。他們好淫，擄略，屠殺，毀滅，無所不為。

全世界認為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實在犯了嚴重的錯誤，這錯誤必然招致嚴重的後果。

日本必須擺脫了野蠻的制度，必須打倒不近人情的軍閥統治，然後才能立足於文明國家的行列。試想成羣結隊的野蠻人，武裝着現代的殺人利器，對愛好和平毫無防禦的人民濫施淫威，這是怎樣可怕的景象呵！

會見土肥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日軍中尉一人和曹長一人，突然光臨我的住宅。他們口操英語，對我說，他們的長官土肥原大佐（現在已經是土肥原中將了）要和我談話。中尉向我三鞠躬，那神氣非常奇怪，我懂得這意思，名義上雖是邀請，實際上等於是命令，但我還不能夠完全確定。

「請回報土肥原大佐，我吃過了飯就去拜訪他。」

中尉又鞠躬兩次，發出一種急促的並表示尊敬的吁吁聲，他說：「大佐請先生立刻就去。外面有車子等着，我侍候先生同行。」

這確是命令，我的猜測一點也不錯。

我披上外掛，戴了帽子，和他們同行。

五分鐘後到達日軍司令部，我被請直入土肥原大佐的機密辦公室。

我知道土肥原大佐已經有許多年了。第一次我和他見面是在蒙古。他給我的印象還不壞。圓圓的臉孔，稀疏的黑鬚，短而壯健的身軀。他對我常常表示許多禮貌。外國新聞記者稱土肥原大佐爲「東方的勞崙斯」。我却不敢不懷疑，因爲據我所見，要是他的姊妹，不做某皇子的寵妾，恐怕許多事情都沒有成功的希望。

和以前一樣，他仍是含笑相迎，至于是否含着幽默的意思，那就不得而知了，握手，請坐，然後他操俄語說道：

「我歡喜講俄國話，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我才用英語。我討厭英語，正如我討厭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

他靜默片刻，注視着我。

「樊思伯君，我們是相熟的，是不是你還記得上一次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的嗎？」

「我記得是在天津。」

「不錯，你的記憶力很好，據說你聰明非常，無論什麼事情，用不着人家向你解釋兩

邁。現在我們言歸正傳。過去日本軍事當局曾經幾次請你脫離中國方面的關係，替我們工作。你都拒絕。可是，如今情形已經不同，從現在起，你要為日本人服務。這不是請求，這是我的吩咐。我知道，要是你肯努力的話，你能夠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可是，如果你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做得不好，這就表示你不願努力。』說到這裏，他故意放慢調子：『我對於不懷好意的人，倘查有實據，就把他槍斃，這是我的脾氣。』

他回復了平常的語氣，繼續說下去：『樊思伯君，現在是戰爭的時期，宣戰或不宣戰，那是沒有分別的。你如果企圖逃避，我們將視為擅離職守，擅離職守要處死刑。你是有家眷的。合家大小五人要越過「滿洲」和蒙古的大草原，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一定懂得我的意思。所以，我勸你振作精神，努力幹去，不致後悔。』

土肥原大佐的態度如此傲慢，使我十分驚駭。我當時向他表示，我多少有一點積蓄，買了一兩家戲院的股票，可以維持生活，並無為日本情報機關工作的特殊興趣。要是他不採取那種咄咄迫人的態度，要是他提出了某項動人的條件，我也許可能加以考慮。

他怒目相視，聲色俱厲。

「樊思伯君，我不是懇求你，我是命令你的呵。我以為這一點不必多談。」

「明晨十一時。你到我的辦公室來，我領你去見『滿洲』的日本特務機關長，你和日本人混熟，並更能瞭解日本人以後，你就會相信日本人實在比中國人優秀一千倍，比美國人或任何民族優秀許多倍。歐洲人能夠替日本人工作，當表示驕傲，你應該步步小心，不要忘記了你的朋友——史溫哈君的事情。他是溺死的，你還記得嗎？」

史溫哈是美國人，為張作霖將軍服務，日本人把他殺死以後，擲入海中。

第四章

日本怎樣統治「滿洲國」

第二天上午十一時，我遵約前往。傳令兵入內報告後，土肥原大佐就走出辦公室，向我招呼同行。我們穿過花園，走進毗連的一座華廈。

那一座華廈本來是波蘭人卡佛爾斯基（Kavalisky）的私產。日本人把它強佔，打通隔離的牆垣，佈置了一個花園。

我們從左門而入，直通一個大辦公室，內有五個日本人，土肥原大佐和其中一人用日語交談，從者鞠躬而入，帷幔重重的密室。他立刻又走了出來，請我們兩人進去。

在寬敞的辦公室一角，約四十五歲左右的日本人坐在其大無比的寫字台旁，普通

服裝，相貌堂堂，眼睛閃着非常聰明的光芒。

我在他的手下工作，從未發覺他的姓名，從未發覺他究竟是什麼人。我也從未在任何活動方面，任何宴會上，或任何人的家中，看見過他。有一架飛機隨時供他使用，以便利他的神祕的旅行。不論在辦公室內或在辦公室外，如果向他提出任何問題，等于和自己的生命兒戲。如果以為沒有人會監視自己的行動，或以為沒有人會向他報告自己的行動，結果是必死無疑。我有一次向他表示，猶太人並非全是壞人，幾乎當場給他槍殺。

不過，這一次我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確乎表現出溫文完善的紳士態度，也相當尊重對方的人格。他講的英語，帶着美國口音，非常流利。

土肥原大佐先用日語和他交談，後用英語對我說道：

「樊思伯君，這一位先生就是你的上司，從現在起，你必須忘記了我的面孔，忘記了我的一切，以後我們如果仍有見面的機會，不管在什麼地方，你必須表示毫不相識。祝你前途無量。再會。」鞠躬而出。

前室內只剩上司和我兩人，他注視着我。

「請坐，」他說。

他的英語幾乎是十全十美，在日本人中間，是罕有的事情；我相信他一定在美國住了許多年。他給我的印象很爲生動，他的一言一語，我差不多都能夠明白記取。

「樊思伯君，我不必再問你的底細。從一九一二年你到中國的時候起，直到現在爲止，你的一舉一動，我這裏全有報告。在中國本部在「滿洲」，在蒙古，在西伯利亞，在俄國，日本的特務員到處跟隨着你；日本的軍人，尤其是田中大佐和寺內大將，都非常欽佩你。所以，我們的軍事當局不以爲你是反日的。有人甚至相信你，是親日的。無論如何，我希望我們能夠相互瞭解。你將感覺到和我們工作是一種愉快。如果土肥原大佐對你說的話，有什麼不悅耳的地方，請一笑置之。因爲外國人稱他「東方的勞崙斯」，所以他愛在人家的面前，擺出威風凜凜的神氣，表示自己的偉大。他在我手下工作了許多年，我敢說他決不能媲美勞崙斯。自然，我們不能否認有許多事情他做得很好。可是也有許多事情他

做得很壞，簡直令人不敢相信那是大佐所幹的事情。舉一個例子，你以為炸死張作霖將軍是得意的傑作嗎？」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我常常聽說日本軍人間存在着磨擦和嫉妬，我總以為那些謠言是反宣傳的產物。不料我第一天和他們接觸後，就不得不承認那些謠言都是事實；我的長官公然承認日本的參謀部授命暗殺張作霖將軍，並明示執行暗殺的是土肥原大佐。

我頗為震駭，但不發一言。

他繼續說道：『我這樣對你講，我懂得你會感到驚奇。現在日本人要使全世界和國際聯盟相信，「滿洲」的獨立是推翻舊統治的革命行動的結果，日本人只做「滿洲國」政府的顧問，可是事實却完全相反。你知道得太多了，我不必再欺騙你。而且今後我們要共同工作，我對你必須坦白相處，使你熟悉我們的情形。你的才幹和經驗，我完全明白，你住在「滿洲」已有二十年，對於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故，都有深刻的瞭解。如果

我也講日本代表向國際聯盟所陳述的那一套，恐怕你會哈哈大笑。

他看一看表，對我說道：「現在將近十二點鐘，吃飯的時候已到，午後二時請你再來。我給你一個工作綱領，我們須完成一個偉大的任務，再會。」

下午見面後，他向我大講歷史和外國人的倫理學。

他說：「英國人真值得佩服。他們把地球上將近一半的面積併入不列顛帝國的版圖，他們常常能夠使被征服的國家償付征服的血帳。印度一直向侵略者還債，南非也是如此，美國受英國統治的時候，也供養征服者的軍隊。法國人對付殖民地的本領也不弱，獨立後的美國，也採取了同樣的方法。古巴和菲律賓雖從西班牙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但迄今仍償付着解放的代價。我們日本人很窮，沒有力量擔負因佔領「滿洲」所招致的消耗犧牲，一切必須由「滿洲」的中國人來承當。這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不過，困難很多，並且相當嚴重。我們用什麼方法使他們出錢，同時不致引起其他人民和國際聯盟的反感呢？如果我們已經公開宣佈正式佔領「滿洲」，事情便容易辦

理，誰也不能說什麼話。可是，爲了自身的利益，我們已經向全世界正式宣佈「滿洲國」是「滿洲人」革命的產物，日本人只站在「顧問」的地位。因此，我們固然必須使「滿洲人」出錢，但事情必須做得非常巧妙，使第三者無從指摘。我們強迫他們出錢，或收受任何經費。

「在戰爭中，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我們在瀋陽和其它佔領城市內所慣用的方法，將在哈爾濱和北滿其它城市內一一推行。

「第一，我們以專利權秘密給予信實可靠的私人；第二，我們以間接的方式，強迫殷富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尤其是殷富的猶太人，讓出一部份的財產。這需要非常靈敏的手腕。使他們永遠不知道日本人在幕後操縱。

「主要的專利事業有下面幾項：各種貨物一律稱爲日本的軍用品，在中東路（該時管理權還屬於蘇聯）上免費運輸；開設烟館；販賣毒品；種植罌粟；販賣日妓；開設賭

窟……

「獲得專利權的人，必須報效苛重的捐款。他們都受着我們的保護。到「滿洲」來

的每一個日本軍官，都想在兩三年以內，能夠搜括了五萬到十萬的現款，滿載而返。我們必須監視他們，尤其是憲兵長官，因為我們從「滿洲人」身上榨取的錢，應該涓滴歸公，不應該給軍官侵吞中飽呵！

→他們用種種可能的方法撈錢，要加以阻止，確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憲兵長官尤其不容易對付，日本憲兵的名譽最壞。長官爲人人所輕視，誰也不會和他們接觸，甚至一般軍官也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退避三舍。在朝鮮和南滿，這些憲兵長官控制了整個的司法界，對於人民握着生殺的大權。憲兵長官告退時，銀行裏往往有十萬圓到二十萬圓的存款，一個普通的軍官却只能夠顧到溫飽。我們不能得罪這些憲兵長官，因為他們都屬於少壯軍人派。他們要使天皇恢復一切政治軍事的大權。這是最有勢力的一派。他們橫行不法，肆無忌憚。若干大臣和將領曾企圖反對他們，結果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我們和他們週旋，必須十分小心。我們決不能直接打擊他們，必須打擊他們的黨羽，把他們孤立起來。」

他的話如此坦白，使我驚駭不已。他燃着捲烟，吸了幾口，仰視窗外的天空，旋又拋去烟頭，繼續說道：

「幾天以內，將有五十個左右著名的中國土匪，從瀋陽到哈爾濱，來招集徒黨；我們在北滿需要一千五百個土匪，隨時可以執行我們的命令。我們必須在哈爾濱找到二十個左右壯健的白俄，可能勝任各種工作。他們必須擅長於白刃和手槍的使用，必須懂得怎樣「守口如瓶」。此外，我們還需要一打左右的老扒手，知道怎樣去應付上流人。」

「土匪有很多的用處。某種大規模的行動，往往少不了他們的協助。譬如說我們最初必須完成的任務是破壞哈爾濱到海參崴的一段鐵路，並完全阻礙它的交通。蘇聯把所有的商品和大量的黃豆都運到海參崴，這對於大連是不利的。我們必須命令土匪破壞那一段鐵路，要破壞了一處又一處，要破壞了一次又一次，使俄國人不得不放棄那一段鐵路，把貨物經過我們的鐵路運到大連。其它在蘇聯管轄下的鐵路，也要時常加以破壞，有時爲了掩人耳目起見，應該破壞我們自己的鐵路。此外，我們的土匪還可以完成下

而許多極有價值的任務：在蘇聯的邊境製造事件；綁架富戶；使家屬重價取贖；襲擊村莊；待日軍趕到，即迅速逃逸，這樣可以收買人心；向日軍佯裝，日軍即引為討伐的藉口，強迫境內的居民撤退，日本人乘機移殖……

「扒手有什麼用處呢？他們將向『滿洲』的外國人，尤其是臨時遊歷的外國人，施展絕技，偷竊他們的文件和信函。你知道，搜查外國人是很困難的事情，如果要加以搜查，他們總是竭力反抗。可是，如果白俄扒手偷竊了他們的日記簿或行李，他們就不能埋怨日本人了，是不是？」

在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以及北滿其它城市，有許多白俄僑民團體。據說這些團體的性質，大多數是反蘇聯的。樊思伯君，許多年來，你是東北秘密警察的高級長官，你懂得『滿洲』各種民族的語言習慣，你應該十分明瞭白俄僑民各方面的情形和白俄僑民團體的真相。所以我請你詳細報告每一個團體的性質、範圍、綱領和活動，並附開主要負責人的略歷。

「凡對日不是真心親善的團體。我想加以取締。此外，我們還有一個討厭的問題，那就是所謂有教養的白俄問題。他們佔着相當的地位和勢力，妨礙我們的計劃。那些沙皇時代的元帥、將校、教授和貴族，全是混蛋。我們只需要俄國人的名字來掩護我們的活動。我們不需要思想家，不需要過份聰明的人才。我們所需要的，是懷着野心和虛榮心的白俄，他們居於若玉團體的領導地位後，會覺得沾沾自喜。你必須從白俄僑民團體中挑選這種人物。他們的特徵是有貪慾而缺乏愛國心。請你準備好名單交給我。」

新主人的訓示

他滔滔講述日本政策的輪廓，我隨時扎錄，應該進行的各種工作。

他繼續說道：「當這些白俄僑民團體實行改組，每一個團體都由我們派員主持後，我們將設法使它們在北滿各處成立分會。在每一個區域內，我們將委任一個能講俄語的日本人做總管理和總顧問，一切事情必須先獲得他的准許。這些改組後的團體對於

侵害紅俄，尤其是住在鐵路線附近的紅俄，是極有用處的。

「我們每天可以向蘇聯人民和其他外僑挑起新事件。我們所欲觸犯或逮捕的任務，何蘇聯人民，不管是否共產黨員，事前駐「滿」日軍事特務機關的第二部，會提供各種資料。幹這事情，我們需要各種文件，同時我們也需要毫不猶豫的人物。你應該牢牢記取，布爾什維克宛如野獸，必須用野蠻的手段對待。」

「我永不露臉。除非絕對是關於日本內部的事情，我也從不預聞。你將做我和外界的居間人，這是你的主要的任務。我將直接向你發出命令，除了我以外，你不接受第二個人的命令。我給第三者的命令，也要由你傳達。俄國人和歐洲人都不准走入我的辦公室，也不和我當面接觸，只有三個人是例外，這三個人我已相知多年，可以信任。只有你能夠直接走入我的辦公室，無須通報。我給你這一種特權，並非因為信任你，而是因為你已經改入中國籍，我可以隨時把你槍斃。此外，我們還把你的家屬做擔保品，看你是否忠於職守。」

訓話的時間很長，我留神恭聽，並隨時札錄要點，不管「滿洲」的日本特務機關長說什麼，或怎樣說，我始終保持着泰然自若的態度。可是，當我格外瞭解所負責任的嚴重性質和必須進行的討厭工作時，我便覺得懷着一種強烈的慾望，想把他悶死。他確信從現在起，我將永遠不能逃出他的掌握，所以他敢說得這樣坦白。他以冷酷和深思熟慮的心情，策劃着如何使成千累萬的無辜人民投入苦痛和災難的絕境。但我完全明白，表示反抗是毫無用處的，甚至犧牲了我的生命和家屬，也是枉然。日本的侵略勢力仍然將向着預定的路線前進。所以我神色不變，鎮靜如常，一直聽到最後。

他繼續說道：「還有一件事情，哈爾濱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方，各國僑民很多，像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國人等，還享受領事裁判權的庇護，他們或為蘇聯的間諜，或為英國和美國的間諜，我們必須注意他們的行動。美國人和英國人更要加以經常的監視。他們相信他們的國家在遠東有特別的權利。日本每一次有所策動，他們總想提出干涉的憑證理由。我們日本人並不承認這種權利，美國有美國的門羅主義，我們有我們的門羅

主義，整個遠東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必須由我們管轄。現在的朝鮮，滿洲，蒙古，和不久以後的中國，西伯利亞甚至伊爾庫次克，將形成大日本帝國，由我們至高無上的天皇統治。只有我們的天皇真正可以稱為神明，因為他是天照大御神的後裔，日本人全是神明的子孫，而且地球上只有日本人是神明的子孫，因此他們從來不願和其它民族混雜。我們的文化是聖潔的，日本的一切都是聖潔的。我們不希望已經征服的或將被征服的民族，享受我們的文化。他們只有趨於消滅。朝鮮人將給各種罪惡所吞噬，中國人將給鴉片和其它毒物所犧牲，俄國人將給烈酒所摧毀。他們都要消滅。只有天照大御神的子孫才配做大日本帝國的人民。神明把重大的使命降到我們的身上，這不過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要征服印度和太平洋各島，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區域也包括在內。這些話你不要覺得好笑，神明決不撒謊。日本必然將成爲地球上最偉大的帝國！

「全世界人士不要爲了我們的內部鬥爭，政治暗殺，和經濟問題，而受騙上當。這些事態並非腐敗的表徵，却是愛國主義的表徵。有時我如果吩咐你注意想發橫財的日本。」

軍官，你也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他們撈錢並不犯罪，因為他們的錢是向註定要消滅的劣等民族索取的，而且他們的錢最後都歸到公家。我們的責任在於如何使他們的錢能夠更爲迅速而直接地歸到公家。日本法官拒絕強迫日本人償還欠款、房租或其它債務，外國人往往覺得奇怪。他們實在未能瞭解日本哲學的原理。日本法官知道自己是神明之子孫，怎樣能夠強迫另一神明的子孫向野蠻民族的子孫償還債務呢？在日本人看來，這種事情是不可思議的！

「サウテスカ」（可不是嗎）我講日本話。

「不要講日本話，你就是懂得日本話，也不要講。我感覺到這是一種侮辱。我們日本人不歡喜聽外國人講日本話。這是褻瀆神聖。日本話是天皇的語言，是天照大御神的語言，只有神明的子孫才配講。我每逢聽到外國人講日本話的時候，我心裏很想把他勒殺，我們還是講英文。這是談論討厭或尷尬問題的普通語言。我罵人的時候，也常常歡喜講英文。」

「我幾乎忘記了另外一件事情。」滿洲國的蘇聯僑民在四萬人以上，其中二萬二千人左右服務于中東鐵路，其餘或經營小商業，或在各工廠中工作。他們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從事宣傳活動。他們的存在既然違悖日本的政策，所以我們必須利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去困擾他們。我們不能表示慈悲的心腸，不能表示軟弱的態度，與其放任一個宣傳家自由自在，不如懲罰一千個無辜的嫌疑者，我們必須遵守這原則。蘇聯倘拒絕出讓中東路的權益，日本人將用武力攫取，並把每一個可惡的蠻漢驅逐出境！對於不能夠加以驅逐的那些傢伙，我們將使他們的生活感到痛苦萬分，無法繼續居留，甯願出境。我們不能夠給他們片刻的安靜，片刻的和平。

「白俄對付紅俄，可以採取任何適當的手段，完全自由，不受拘束。每天搜查紅俄的住宅，把必要的傢具隨意拋擲，不斷的凌辱侵害，將使他們走頭無路，不得不離開滿洲。」

「除了這些紅俄外，北滿還有七萬左右猶太人，我們對付猶太人，感到更大的困難，因為他們的原籍雖然都是俄國，許多人已經歸化它國，有的入了英國籍，有的入了美國

籍，有的入了法國籍，有的入了土耳其籍，有的入了意大利籍，有的入了德國籍，有的入了波蘭籍。「滿洲」大多數的外國公司，都是他們出面的。無論何處，你看到一面外國旗，你就可以確定那裏藏着猶太人。自然，我們對於他們，尤其是那些歸化它國後已經享受領事裁判權的猶太人，不能直接地或公開地加以襲擊。但我們可以利用間接的方法，使他們感到困難，譬如說，要是爲了領事裁判權的關係，不能加以侵害，我們却可能懲罰想和他們做生意的人。我們得利用某種藉口逮捕和外國公司來往的俄國人或中國人，強迫他們斷絕交易。不久，俄國人或中國人就會明白，和外國公司來往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我給你這一番訓示，和我給北滿重要日本特務人員的訓示是一樣的。只有我能夠向你發號施命，你也只向我一人負責。不要使你的助手知道或懷疑你是替我工作的，或我是你的上司。你的重要助手也是如此，絕對不能說出誰是他們的上司，或接受誰的命令，我們特務機關的組織，決不能像一個鏈，換一句話，不能夠從這一個環發現那一個環。我們特務機關的組織，應該像點的連續，雖協同工作，却並無直接的聯繫。這樣，即使敵

方捉獲了一個人，仍無法找到其他許多人。

「我看見你札錄筆記。這是不好的習慣，日記簿很容易遺失，或被入偷竊。最好還是靠你的腦子。聽說你的記憶力不壞。這是你的一個長處。現在你去罷，明天開始工作。」

「對不起，你提及我的夥計，我的重要助手，請問他們到底是誰，並且在什麼地方呢？」

「不必擔心。到適當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的。我現在還不能夠告訴你『何時』、『何地』。第一件事情，你給我準備關於白俄僑民團體的報告。」他和我握手而別。

路上，我覺得如在夢中。他的話使我暈眩驚駭。不知所措。一切似乎完全不可思議，而最不可思議的，他竟向我說出了許多聞所未聞的事情。我曾經聽到許多關於日本人在朝鮮的暴行，以前從不相信，現在却不得不承認都是事實了。四個月來，「滿洲」的恐怖統治，也可同樣看待；以前，我總覺得日本人崇高俠義，高貴大方，現在知道這只是一種幻景，已經烟消雲散，化為烏有了。我已經面對着可怕的現實，狼已經卸去羊皮，假面具已經

揭開，顯露出日本人的真相：野蠻、殘酷和無情。日本民族完全沒有道德，對於他人的苦難，漠然無動于中；日本民族屠殺和消滅了幾百萬人的生命，一點沒有追悔的表示。而他們還妄自尊大，稱爲「神明的子孫」。

我和許多中國人一樣，被迫替日本人工作，做他們的幫兇。我的內心燃燒着反抗的火焰。我曾想加入中國的義勇軍，他們以拙劣的武器和敵人相週旋，寧死不願屈服。可是，我想起了我的女人和孩子，沸騰的情緒就不靜下來，我又恢復了理知。如果我一任情感的衝動，我的家屬怎樣呢？勇敢的女人，可愛的兒女，年老的岳母，在那些野蠻人的淫威之下，怎樣生活呢？我必須暫時忍耐，等候適當的機會，我想這樣的日子一定會來，並且不久就會來的。如果當時我知道擺脫樊籠的日子，將遙遙無期，我也許會決定採取極端的辦法。我等候離開「滿洲」的機會，幾乎有五個年頭。我雖然目視一切恐怖和侮辱，但因為懷着恢復自由的希望，終於耐心忍受。

我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天，我開始在着主人的指揮下工作。

上面已經說過，我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準備一個關於北滿白俄僑民團體的報告。據我知道，白俄僑民團體甚多，總機關都設在哈爾濱，「滿洲」各處都有支部。

主要的有下面幾個團體：

- 一 白俄難民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f Refugees) 主席爲柯洛古尼可夫 (Kolokolnikov)
- 二 白俄社會委員會 (The Russian Social Committee) 主席爲柯羅白夫 (Koroboff)
- 三 退伍軍人聯合會 (The Union of Ex-servicemen) 會長爲弗士畢基 (Verbitki)

四 保皇正統派 (Legitimists) 領導人爲基斯利清將軍 (Kisiltzin)

五 法西斯派 (Fascists) 領導人爲柯斯明將軍 (Kosmin)

六 地產業協會，會長爲甘達蒂 (Gandatte)

七 證券業委員會，主席爲卡巴爾金 (Kabalkin)

此外，還有許多哥薩克人的團體，以及其它次要的或全不重要的團體。

在這些白俄領袖中，日本人只覺得兩個人合式，一個是白俄社會委員會的柯羅白夫，一個是保皇正統派的基斯利清。

柯羅白夫已經是五十四歲的人了，却從未做過一天工作。有時任這個團體的主席會長，有時任那個團體的祕書會計，靠團體吃飯，靠借債度日，這就是他的職業。除了關於吃的東西外，他無所謂理想。他的唯一的快樂是飽嘗山珍海味。俄國人討論到他的政治學識時，往往以「饕餮家」這一個雅號來結束爭辯，可見他的名氣之大。不管主人是法西斯派也好，無政府主義者也好，保皇黨也好，或任何團體都好，他總是有會必到，有宴必

赴。他的觀念可以變化無窮，並具應付多方面的才能，這使他成爲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保皇正統派擁護西利爾大公（Grand Duke Cyril）恢復皇位。領導人基斯利清，却是一個愚鈍糊塗自鳴得意的寄生蟲。西利爾大公從巴黎發出各式各樣的勳章，鼓勵「滿洲」的忠實信徒。基斯利清的胸際就掛着十四枚閃耀奪目的勳章，他在大戰結束的時候，不過是陸軍上尉，如今西利爾大公却把他晉級爲陸軍中將了。

基斯利清的格言和喬治一世相同：醇酒肥肉，只有他享用伏特加酒，日本人常常給他充分備置。日本人所需要的，就是這種人物，所以委任他做「滿洲」白俄軍總司令。

平心而論，基斯利清確爲白俄退伍軍人中甘受日方雇用的一個。他們大多數不願做日方的工具，寧可飽嘗着迫害、飢餓和牢獄的滋味。

在熱烈歡迎侵略者的幾天以內，白俄就感覺到自身處境的惡劣。他們原來希望日本人做他們的救星，日本人却已露出猙獰的面目。

梅迪 (Nikolai Medt) 也是和我一樣受了日本人的強迫在哈爾濱工作，已有四個年頭。有一天他對我說：「給蘇聯做宣傳活動的共產黨員，都不及日本人在『滿洲』的活動那樣有效。」他的話是有根據的。過去大批白俄從國內逃亡到『滿洲』尋求和平與安全，如今每月却有許多白俄向蘇聯領事館請領回國的護照。他們寧可拋棄原來的信念，成爲布爾什維克，不願居留在『滿洲』受日本人難堪的虐待。他們覺得與其受黃色的壓迫，不如受紅色的壓迫。如今居留在中國本部或『滿洲』的白俄，沒有一個不咒罵日本人，只有被日本人釋放出獄的白俄罪犯，還繼續歡呼『萬歲』。他們不得不如此，否則就要重入牢監。

沒有一個富於自尊心的白俄，想和日本人發生什麼關係。因此日方委任基斯利濟做白俄軍總司令後，却找不到一個真正的白俄將軍做參謀長。結果他們不得不扶值一個傀儡。他們挑選了在哈爾濱 Fehurin 百貨商店門口乞討多年的一個病人。他以前是謝米諾夫 (Ataman Semionoff) 在西伯利亞率領哥薩克部隊中的一個軍官。幾天

以後，公報上發表薩爾尼柯夫少將（Salnikoff）已榮任參謀長。

其他白俄僑民團體的領導人，雖經日方通知歡迎其辭職却一致拒絕，於是日本人和那些「叛徒」發生激烈的鬥爭。有幾個不堪苛酷的迫害，數月以後就屈服讓步。其他如甘達蒂和卡巴爾金等，則在威脅、逮捕和不斷困擾的艱苦環境下繼續掙扎了四年，直到一九三六年，他們才放棄領導的地位。

甘達蒂雖是八十四歲的老人，精神仍不屈不撓。一個日本憲兵長官攜着逮捕狀到他的家裏，他胸懸日皇所頒賜的最高勳章挺身而出。凡佩帶這種最高勳章的人，就可不受逮捕。憲兵長官鞠躬而退，非常狼狽。從今以後，甘達蒂每逢要向「滿洲國」的法院，對於日本麥養的白俄無賴之徒所捏造的罪狀，提供答辯時，他總是掛着日皇的最高勳章，自由出入法院。

有一次，兩個白俄流氓誣告甘達蒂侵吞私立學校的基金，他原是該校的主人，並已做了二十年的監督，那兩個壞蛋靠着日本人撐腰，用最醜惡的言語，侮辱甘達蒂，中國法

官雖一再阻禁，也無濟於事。偽證者講完以後，中國法官問甘達蒂是否欲加以辯護。他站立起來，十分鎮靜地說道：

『對於這兩個惡棍的誣攀，我不願加以答辯。兩個俄國青年爲了每月三十五塊臭錢，竟不惜出賣自己的榮譽，我真覺得痛心。我沒有別的話想說。』

當甘達蒂離開法庭時，中國法官伴送他到門口，到於傳召一點表示歉意，並復述一句老套話：『對於這些不法行爲，我們中國人實在不能負責。』

第五章

會見一個舊相識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的上司吩咐我去訪問波爾旭區（Bolshoi prosp-ect）的日軍司令部，據說那裏有人等候我。

等我候的却是一個中國人，俄國話講得很好，待我非常客氣，像主人一樣。請坐，獻茶，敬烟，一套寒暄以後，他直接說道：

『樊思伯君，你將會見一個老朋友。』

『上司要我會見的人，我都願會見。』

『好極了；不過你將會見的人，和上司毫無關係，他不知道我們的上司，也永遠不能』

夠使他知道。他將接受你的命令。他爲執行那些命令所需要的錢，由你付給。此外，什麼都不用和他多談。」

「那末，什麼時候和他見面？」

「我們現在就去看他。我們走罷。記住！關於我們的上司或日本人，一個字都不能提及。」

門外已準備了一輛大轎車。

車子沿着波爾旭區前進，再向左轉灣。車夫向身旁的一個人說話，都是俄國人。

十分鐘以後，車子在一層樓的巨宅前停下來，我們顯然並非「不速之客」，因爲他們已經開門相迎。

走進會客室，我看見四個武裝的中國人，都帶着毛瑟槍。我正想加以審視，又走出一個神氣強悍的中國人，滿面堆着笑容。

我細細觀看，大吃一驚，站在我面前的，原來就是「滿洲」鼎鼎大名的土匪首領王

謙基（譯音）又喚林炳基（譯音）又喚馬祖基（譯音）又喚……

王謙基確是我的舊相識，上次我們會見的地方，是在朝鮮和「滿洲」邊境小金漢（Little Khinghan）山中的王屯台（譯音）。那一次，我損失了三個夥計，他也犧牲了九個弟兄。他因胸部和右腿中彈，受傷被捕。我把他送入醫院，據說傷勢甚重，可是他並沒有死。

中國的土匪首領，常常有很多的金錢和很大的勢力，四個月以後，王謙基終於又逃出牢獄，重操舊業了。

他現在又向我微笑着，伸出手來，緊握一陣。

他爲人勇敢坦白。他常常公開宣佈自己的姓名和行業。如果日本人也能同樣坦白公開，那便多麼值得欽佩呵！至少不會受到全世界道德上的唾棄和譴責。

他對我說道：「樊思伯君，我這次再和你會見，很覺高興，我尤其感到愉快的，是我們今後將共同工作。我告訴你，我已經忘記了過去的事情。我們必須不算舊帳。從今天起，我

們開始新的生活。」

他吩咐四個武裝的中國人：

「喂！你們走前幾步！這一位就是樊思伯先生，我已經告訴過你們了。從今以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你們必須尊敬他，服從他。誰在他的面前說一句壞話，誰就該死快決告。訴弟兄們，你們記住：這是我的命令，不尊敬樊思伯先生，就是不尊敬我自己；你們知道，誰不尊敬我，誰就休想活命。」

他又回過頭來，向我說道：「樊思伯君，他們是我的四大金剛。他們都具着鋼鐵一樣堅強的意志。」

他們向我鞠躬行禮，和大家握手。

過去二十天內，我和所謂日本軍官、憲兵及特務員的日本強盜不斷握手。我現在却和自承爲強盜的中國人握手，心裏感到一種愉悅和寬慰。

陪我同去的中國人，始終一言不發，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誰，他當然不是強盜。飢餓潔

白細緻，指甲長而有度，可見他從未做過勞動的工作。他必然是城市中人，他不介紹自己的姓名，只說：『我獲得上司的信任。』

王謙基揮手示意，推開一重門，已擺起筵席，桌上裝滿了豐富的中俄佳餚。

他說：『我們應該歡聚一下，來慶祝這一個久別重逢的機會。你肯賞光嗎？』

大家坐下後，我發覺所有穿了中國衣服的僕役，全是日本人。在東方住了許多年的西洋人，常能看出中日兩國人民的不同之點。

王謙基的談鋒很健。他與勃勃地細述過去我們許多次的遭遇。他講起張作霖將軍，講起其他中國的著名人物，有幾個已經做了他的犧牲品，並且講起日本、中國和歐洲的政治。

他的談話使我更起敬慕的意思，他有豐富的知識，和靈通的消息。我對他是要另眼相看了。

一個僕役走進桌邊，向陪我同去的中國人用日語低聲報告，後者即用俄語通知我

去聽電話。

「喂！你是樊思伯君嗎？我是特務機關長。吃過了飯就來，我等你。」

「是，我就來。」

我回到飯廳。伴我同去的中國人，因有其他要事，起身告別。我送他到門口，我說：「希望再有見面的機會。」

「恐怕沒有這種機會。今晚我就要動身到南方去。」

因為我的上司曾經吩咐過我，不准向特務員或與工作有關的任何人提出問題，所以我不再開口。

我回到席上，他吩咐僕役開香檳，酒酣耳熱，興高彩烈。

他又講起再度見面的愉快，和共同工作的趣味。

「我還要認真幹五年，發了財，然後洗手。我想住到關內的外國租界去，那裏我有許多朋友和以前的同夥。我也許還要出洋遊歷一次。現在我必須苦幹掙錢。我很願意聽你

的指揮。今天是新生活的開頭，我要取一個新名字。從今天起，我就叫老陰。樊思伯君，你也取一個新名字才好。」

「不要，我還是用原來的名字。」

「那也好聽說照意大利文的意思，『樊思伯』是一種會刺人的東西。中國人叫做蜂，我們就喚你老馮（蜂馮同音）……喂，過來斟酒，我們大家乾杯，恭賀老馮和老陰。」

乾杯以後，我向主人告別，一個僕役走來報告車子已在門外等候。

老陰送我出門，他再三請求，要我做什麼工作，就設法通知他，越早越好。

我跨上車子，前面坐的仍是那兩個白俄。

好像要中風的樣子

幾分鐘以後，我到了上司的辦公室。他微笑說道：「你在老王那裏很舒服罷。」

「老王已成過去了，他現在叫老陰。」

「我知道了。你現在叫老馮。」

「原來日本下人已經把談話的內容報告你了。」

他又微笑一下，然後說道：「現在我告訴你，老陰替我們工作，已經二十年了，可是他從不曾講過接受日本人的命令或金錢。至于他是否知道替我們工作，那就無關重要。事實上，他始終未跟日本官員接觸談話。」

「老陰現在帶來了三十六人，每一個人經過試驗證明，都忠實可靠。爲執行我們的計劃，他必須從本地的土匪中，挑選約一千五百人，這需要五六個星期。他們都聽你的吩咐，都歸你指揮。只有你一個人和他們接觸。絕對不能夠有一個字提到我或日本人，你必須記住：應該使他手下完全相信他們是替蘇聯政府工作的。或者使若干人相信他們是給美國人服務的。總之，一切靠你運用聰明的暗示方法，使他們猜疑他們是接受着歐洲人的津貼。你做我和外界的居間人，這就是你的工作的一部份。十天以內，老陰可以召集到一部份人來開始工作。」

「我已經命令憲兵司令徵募白俄若干人。他們要能夠無所畏懼，要能夠任意射擊，要能夠「守口如瓶」，而不在乎良心上的譴責。我本來想直接指揮他們，但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決定把他們交給憲兵隊。」

「原因很簡單，我要避免和歐洲人發生直接的關係。你固然是歐洲人，但現在已成中國人。要是我把你槍殺，我不必向任何人解釋理由。這不是說，我存心要槍殺你，恰恰相反，我認為我們可以相處甚得，不久我可能完全信任你。」

「這是白俄的名單，請你加以審查。做一個報告，我要參照憲兵隊的報告，加以比較。樊思伯君，我不信託任何人，我所接到的報告，常常要經過一次或兩次的對證。我需要的，是「真實」。」

「我要利用這些傢伙，壓迫若干殷富的猶太人和白俄。我要剝奪他們的財產，把他們逐出「滿洲」。他們離開「滿洲」時，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我大胆插嘴：「猶太人並非都不好，我知道「滿洲」有許多猶太人是十足的紳士，

他們老實實經營商業，歡迎「滿洲」的日本人。」

上司猛然躍起，衝到我的面前，好像要扼住我的喉嚨。

他滔滔然說道：「你對我講話竟敢這樣大胆？你竟敢這樣袒護猶太人？你再說一句，我就把你活活悶死！猶太人都是豬獯！歐洲人都是狗子！你竟敢說他們不是壞人？你竟敢說他們也有紳士？你懂得「紳士」的意思嗎？「紳士」這個名詞是英國人發明的。英國人掠奪了別人的財產，他就成爲「紳士」；要是他掠奪了別個民族的財產，他就成爲「爵士」。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猶太人都是「紳士」和「爵士」，因爲他們除了掠奪對方的財產外，簡直不做其它事情。不過，猶太人却不能拔去日本人的一根毫毛。但我並不因此滿足，我們日本人要來壓榨猶太人。這些白俄就是幹這醜態的勾當的。我們日本人不願把手弄污。你幹麼不看一看名單？」

名單上共有十人。

「名單上你有人知道嗎？」

「我差不多全知道的。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棍，犯案累累。」

「我就需要這種傢伙來壓榨猶太人。你以為我們應該雇用教師或牧師來幹這勾當嗎？」

他瞧着我，眼睛半開半閉，譏諷地微笑着，繼續說道：「我覺得很奇怪。我聽說你是一個真正的惡魔，可是我現在看出你却很拘謹，滿口講仁義道德。你跟張作霖和楊宇霆混在一起的時候，究竟幹些什麼事情呢？張作霖是一個土匪，你替他工作了十年，這就應該使你變成第一號的土匪。請你答覆這一個問題。」

我回答道：「關於張作霖將軍的出身和過去，有各式各樣的故事和傳說，幾乎使人難于確定一種意見。我和張氏相識的時候，他已經是東三省的巡閱使了。」滿洲「的能有今日，不得不歸功張氏。」滿洲「現在已經成爲中國最進步最發達的區域之一。過去二十年間，成千累萬的人民從國內移殖到關外，便是事實的證明。我從不知道張氏本人有壓榨中國人，俄國人或猶太人的行爲。不僅如此，要是他證明了任何公務人員確有壓

權的行爲，那個人的腦袋就非搬家不可。張作霖將軍和楊宇霆將軍從未叫我做過自己覺得羞辱的事情。假使你以爲我不配幹這工作，以爲我太拘謹猶豫，那麼，你對我又何必強迫呢？我只希望能夠帶着家眷回到中國去，什麼都不願意幹。

我的上司堅決地說道：你和你的家眷非居留在一滿洲不可。凡佔重要地位的中國人，都不准回到關內。他們只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替我們工作，第二條路是進古廟做和尚，第三條路是吃槍彈。照你的情形說，你是歐洲人，所以你不能夠做和尚，只剩下這兩條路；非替我們工作，就給槍斃。你在一滿洲，蒙古和西伯利亞各處，已經生活了二十年；每一個地方你都熟習；你瞭解各處人民的情形和他們的言語風俗習慣；你知道誰好誰歹。你在張作霖手下做事，功績很大，對我們應該同樣忠實。老實說，假使你是獨身漢，我就不能夠信託你，應該把你槍斃。假使你是獨身漢，我相信你現在也許已經成爲一個土匪首領，不斷向我們搗亂了；可是，你却有一個心愛的家庭，我們只要能夠監視你的家庭，你對於我們就不得不虔忱服務。要是你背叛我們的話，你可懂得，你的妻子兒女和岳

你就會遭遇怎樣的命運。你別再說要回到中國去。從今天起，在你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執行我們的命令，不要管什麼良心。關於良心譴責的問題，讓我們負責，我擺脫你在道德上所負的一切責任，你是信奉什麼宗教的？

天主教。

天主教從你贊揚猶太人的態度上看來，我就猜想你是天主教徒。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告訴你，日本人組織的國際運輸公司，已經獲得中東路上免費運輸的專利權，任何商品可在日本軍用品的掩護之下，免費運輸。國際運輸公司爲了這專利權，曾付出很大的代價，故日本軍事當局應該予以一切保護。任何商人如欲減低運費，必須通過國際運輸公司。

我們知道，日本憲兵長官和陸軍長官往往與私人接洽，代運貨物，把運費減低，撈入自己的腰包。這是不對的。我們不向蘇聯鐵路繳運費，這省下來的錢應該歸到日本軍部的庫房，不應該納入長官的私囊。自然，我們不能夠觸犯這些長官。無論什麼時候，要是

那些責任何不規理的舉動你必須設法懲罰商人。你的夥計常常要出去偵查破壞專利權的商人。不用說，國際運輸公司會供給你所有的各種消息。」

我大膽地問道：「蘇聯鐵路當局看到了大批的貨物，免費運輸，他們是不是會說什麼話？」

「他們一句話也不會說。他們能夠說什麼呢？鐵路是在我們的手裏，在日本軍隊的手裏。日本向蘇聯政府付錢，那是丟臉的情事。何況，中東鐵路不久就要歸我們所有。我們可照自己規定的價格，出錢收買，或用武力接管。你知道，蘇聯政府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完全是一羣紙老虎。蘇聯的紅軍是紙老虎，蘇聯的海軍也是紙老虎，我們今天佔領了滿洲。」

「明天佔領華北，後天佔領蒙古。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向全世界表示，蘇聯政府的統治者原來都是龐大的紙老虎。如果我們出了幾百萬塊錢收買中東路，我們却存心不出一個錢，佔領西伯利亞鐵路和西伯利亞的本身。我們征服了中國和西伯利亞以後，我們就要發揮海軍的偉力，向南進展；菲律賓，印度支那，婆羅洲，蘇門答拉，新幾內亞，澳大利亞，

印度……

這一位日本的「滿洲」特務機關長滔滔講述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大綱，得意忘形，興奮非常，好像要中風的樣子。

休息片刻，他又比較甯靜的繼續說道：「明天下午六時，你到波爾旭區的日軍司令部去找蔡振祺（譯音）他當面給你介紹五個助手。每一個助手另有一打左右的夥計。不要使你的助手知道，你是替我工作的，也不要使那些夥計知道，他們是替你工作的。你和他們混熟以後，再來見我，我給你新的命令。現在差不多早晨三點鐘了，大家睡罷。」

我的助手

第二天下午六時，我到日軍司令部去訪問蔡振祺。日本軍曹領我經過一個院子，走入空空洞洞的一個大房間。等了幾分鐘，約四十左右的中國人，身服西裝，進來問我是否樊思伯先生。

『是的。』

『歡迎之至。』

彼此握手，他說：『請你坐下，再等幾分鐘。』

日本軍曹送茶敬烟。互道寒暄後，我們就聽到汽車在門口停落的聲音。

日本軍曹進來報告：俄國人已到。

蔡說：『請他們進來。』

其中有三個人我相識，他們都是白俄退伍軍官。

簡單介紹後，蔡向玉個助手說道：『這一位就是你們的上司。你們要絕對服從他。你

們和你們的夥計，必須忠實執行他的命令。一切訓示和銀錢的問題，都向他接洽。除了他，

沒有第二個人指揮你們。』

于是，他又向我說道：『他們是你的助手，從第一號到第五號。沒有人知道而且也不

必知道他們的真姓名，現在我去了。』

蔡振祺告別後，我向五個助手說道：「現在我只有的一件事情叫你們去辦，就是：凡認爲軍用品而在中東路上免費運輸的一切貨物，必須通過國際運輸公司，不得由別方面包庇。」

我吩咐他們在深夜一點鐘的時候，到日軍特務機關第二部去看我，我是住在那裏的。分手以後，我直接去報告上司。

一見面，他就問道：「你覺得你的助手怎樣？」

「我認識三個人，都是白俄退伍軍官。其餘兩個人我不知道，看上去也像軍人。」

「你的眼光不錯，他們全是白俄退伍軍官，都很聰明，並非惡棍。他們是動腦子的，不是用蠻力的。你不會覺得他們討厭。」

「販賣毒品的專利權。歸給這裏的日鮮企業公司 (Japan and Korean syndicate)。」

「代表人是竹內律師。日鮮企業公司在「滿洲」各地，有經營鴉片，海洛因，嗎啡和高根店舖的絕對權利；有准許中國人設立烟館的絕對權力。爲了這專利權，該公司向日

軍當局納款幾百萬圓。所以，我們必須保障他們的利益。

→ 關於這件事情，日本憲兵自然也想染指。他們向販賣毒物和開設烟館的商人進行接洽，允許給予保護。那些店舖在軍官的保護之下，警察不敢得罪，更不敢封閉，這就牽涉到我們的任務，因為這一類的收入必須歸軍部所有，不能肥憲兵長官的私囊！你必須吩咐手下注意這一點。

→ 在中東路沿線的大小城市，除了哈爾濱以外，開設賭場的專利權，已經讓給朝鮮人和阿美尼亞人合辦的建安公司（Kim-Ambarian）。

→ 該公司沿鐵路線開設的賭場，以二十家為限。哈爾濱將另辦一大賭場，由我們管轄，賺的錢歸我們和幾個態度友善的白俄團體分沾。就是在哈爾濱，我們仍須保障該公司的利益。

→ 中東路沿線的淫業專利權（包括藝妓舞女等）已經歸給日本人的企業公司，哈爾濱的代表人是平田。該公司可以從東京大阪等處運入日本姑娘。憲兵長官自然又

要另想別法，包庇淫業。我們應該確立嚴密的限制辦法，使凡非該公司的日本姑娘，沒有安身的地方。

「關於對華免費運輸的專利權，日軍當局已經讓予南滿鐵路，而以國際運輸公司為代表。只有該公司可以把貨物輸入中國，不必繳納關稅或運費。不過，要完全控制這一件事情，其困難逐漸增加，因為邊境一帶的文武長官，都和私運商人暗通聲氣，拚命撈錢。所以我們必須十分敏捷，拘捕私運商人。」

「現在我們談到蘇聯僑民的問題。在「滿洲」的蘇聯僑民，不下數千人。我們不能夠使他們有片刻的安甯。他們全是討厭的傢伙，我們必須用搜查拘捕和虐待等等無情的手段去消滅他們，或強迫他們離開「滿洲。」」

我說：「如果我們逮捕他們，並無理由，恐怕要發生無限的麻煩。」

「並無理由……？一個特務機關的領袖，必須常常懂得怎樣去尋覓一種理由，譬如說：每一次你搜查蘇聯僑民的住宅，就需要一種理由，如果沒有什麼理由，隨便找一種，反

正是一樣的。我已經告訴過你，日軍特務機關第二部會供給你所需要的各種材料，像共產黨的宣傳小冊子，來自蘇聯美國或任何國家的信件，和全部的假造文件，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實行任何逮捕。此外，還有各種中文的共產黨宣傳品。我們決不能放鬆了中國人，尤其是有錢的中國人，日本是貧窮的國家；駐「滿」的日本軍隊每天要消耗幾百萬圓。我們必須盡力減輕這負擔。有許多中國人，當土匪，當軍官，或做別的買賣，發了大財，我們奪取他們的造孽錢，這是所謂恃入悖出，天理昭彰。猶太人也是一樣，他們靠欺詐致富，現在是他們受着報應的時候了。

「吩咐你的手下進行調查，那幾個猶太人最有錢，要查明他們的銀行存款，究有多少，他們的財產能否立刻變賣現款。一切報告必須準確可靠。我另外雇用了三個人，專門審核報告，我發覺了虛偽的報告時，對方休想沾到便宜。」

「一切準備完畢後，我們就可以展開整個的運動，倘一切進行順利，大家相安無事；如果不然的話，事情就相當嚴重，我決不寬容錯誤，也不寬容敷衍，請你記住。」

『我決不忘記。』

『你和助手在什麼地方見面？』

『我約他們於今晨一時，到日軍特務機關第二部所指定的那個房間裏去看我。』

『很好！關於怎樣保護專利權，怎樣應付蘇聯僑民和猶太人的幾件事情，你必須給他們確實的命令和指示。』

『現在，注意這一件事情。明天下午九點鐘，兩個白俄要上大馬高（Daiessou）站去搭車，一個叫克魯布雷（Krupenin），一個叫謝皮洛（Zabiello）。你吩咐一個助手去把他們槍殺。他們欺騙了日本人，欺騙就應該處死。你去罷。』

我會見五個助手，吩咐他們保護以上所述的幾種專利事業，然後問他們是否有人認識克魯布雷或謝皮洛。

第二號助手巴斯杜金（Pastukin）認識他們，並謂謝皮洛是波蘭人，並非俄國人。我說：『不要管它。他們兩人明晚上大馬高站搭車，我要結果這兩個騙子的性命，你』

既然認識他們，你去辦就得。你快去，找好好的銃手。」

第二天，克魯布甯是給殺死了，謝皮洛却臨時逃逸。

第六章

「滿洲」的娼妓

日本的女人終身過着奴隸的生活，她是專爲侍奉男人而出世的：侍奉父親，侍奉丈夫，侍奉兒子，侍奉工廠的主人或妓院的嫖客。女訓的第一課就是：「男尊女卑。」

由於這一種自大的觀念，日本的男人把女人看做一個奴隸，一架機器。而且這一種觀念是很普遍的，不論貧富，不論地位高低，不論平民和貴族，都是一樣的。受過西洋教育的日本丈夫，在外國人的面前，對他們的女人也許會表示若干禮貌，可是，這與其說是出於真正的尊敬，不如說是爲了敷衍面子。日本貴族的太太，常常要先向男僕鞠躬，她雖然知道她的地位高，他的地位低，可是「男尊女卑」不能打破。

不管是屬於那一個階級的日本丈夫，決不會把自己的女人看做一個對手，一個夥伴，或一個知己，即使她的才智學識勝過丈夫十倍，也是如此。

我在哈爾濱的時候，隔壁住了一對年青的日本夫婦，男的叫棚上，女的叫絹枝，棚上是一滿洲國（財政部的顧問（在「滿洲國」做事的日本人全稱顧問，不稱雇員。）他又小又瘦，毫無思想學識，英文也很蹩腳。絹枝却是海軍上將的女兒，大學畢業，對英法德三國文字的造詣很深，能彈鋼琴，能繪畫，能打哥爾夫球和網球。一句話，她是高尚風雅多才多藝的女人，而且，相貌也很漂亮。

可是，棚上待她很冷淡，簡直不當她是什麼東西，對她從不低聲和氣。她不雇用僕人，所有煮飯，洗衣，清潔等一切家務，全由她一人操作，從早晨忙到晚上，博取丈夫的歡心。棚上從辦公室回家後，她要替他脫皮鞋，洗腳，找拖鞋，接着開飯，他一人獨吃，她却奔來奔去，恭候服侍。他吃飽以後，她才在桌子的一角坐下，拘謹地吃着殘羹冷飯。

棚上每晚要到咖啡店或別的地方去和藝妓厮混，到深夜兩三點鐘才回家，他的女

人已疲倦欲睡，仍不得起身迎接，因為照日本的風俗，女人在男主人沒有回家以前是不能夠安眠的。

絹枝雖然在各方面要勝過丈夫十倍，但這有什麼用處呢？棚上是男人，男人不是「尊如天」嗎？絹枝是女人，女人不是「卑如地」嗎？

奧康樂教授 (O'Connor) 在日本各大學任教多年。他娶了一個貴族出身的日本太太，因此熟諳日本的語言和風俗。在他的名著「日本之威脅」(The Menace of Japan) 一書中，關於日本的婦女問題，他這樣寫道：

「法律上對妻子必須忠於丈夫一點，規定得非常嚴峻，犯罪的女人毫無寬容的餘地。男性却完全不受法律的拘束。」

「如果日本女子還是在原始時代，幼稚無知，這一種不道德狀態的存在，也許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我已經說過，日本女子根本上要比較一般的男性聰明，她的優美高雅，正不下於西方的女子。在日本，女性的卑劣感却使她不敢向男性反抗。日本男子生來就粗

發如牛，這真是日本女子的悲劇。

「日本男子的個人主義，不論在邏輯方面或理知方面，都無所謂止境。他可以把藝妓或姑娘領到家裏，吩咐女人招待「佳賓」。他甚至可以吩咐女人替自己和情婦預備枕席被褥，並在旁侍候。他甚至還會吩咐女人熱一瓶黃酒，送到面前，以刺激性慾。

「不服從丈夫就可以成爲離婚的條件。雖然離婚的時候，丈夫往往給妻子三行字的休書，但丈夫有權命令妻子走出，斷絕夫妻關係。這對於女子實在是最大的恥辱。

「我曾經看見一個新婚不久的女子在房門外聽候丈夫的喚呼，那一次的情景，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還只有十六歲。結婚剛滿一星期，她的丈夫就帶回一個妓女，吩咐她收拾牀舖，在門外侍候。我看見她跪在草席上，身體前前後後地搖擺着。兩手緊握着拳頭，每一次向前搖擺時，頭部向地板猛擊三次，她似乎要衝去腦子裏的想念。熱淚盈眶，流滿兩頰。她嚙着嘴唇，忍住眼淚，口邊滴下鮮血。她拉起衣裳的一角，忿忿然扭成一團，於是塞到發顫的口邊，咽住了憤怒和苦痛的慘聲……我這個不速之客，顯然使她的丈夫深感不

快，因此有半年多不敢去拜訪他。奇怪得很，我再去看他的時候，又遇到同樣的事情。可是，這一次她却平靜地閱讀報紙了，她看見了我，向我鞠躬敬禮，微笑表示歡迎……她已經懂得，服從是她的天賦了。」

早稻田大學的北川教授，曾於一九三四年六月間在日本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幾句話：『一個日本女子或小孩在男子的威勢之前，尚無法反抗，非大和族的婦孺，其命運必更爲可怕，不難想像。年青的朝鮮女子和台灣女子，自然要陷入絕對可憐的境地了。』

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主要原因，就是爲了日本警察拐騙年青的台灣女子，和侵吞她們的工資。如果任何台灣女子拒絕日本警察的權取，後者會假造罪狀，加以拘禁，或迫她繳納罰金，使甘心服從。

在朝鮮，有日本人開設的所謂女性合夥公司，專門經營「人肉」買賣。這裏對於妓女的訓練，極盡殘酷。姑娘倘沒有新客人，就要挨打，或通宵不准睡眠，姑娘欠了妓院老板

的錢，等於是永遠不能掙脫的枷鎖。妓院老板售給姑娘的衣服，往往比市價高四倍到十倍，而且一套衣服要輪流售給許多姑娘。朝鮮的公娼制度，也是日本人介紹的，日本人使朝鮮女子過着奴隸的生活。

一九三二年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內，淫業專利公司從日本輸送到「滿洲」的日本姑娘，不下數千人，分發給妓院、茶館、咖啡店、酒排間、跳舞場和日本菜館。在日本人看來，販賣婦女並非不名譽或不光榮的事情，把日本姑娘輸送到「滿洲」，當然一點也沒有羞恥的意味。

恰恰相反，日本人認為這是一種營業，和其它營業並無差別，日本的大企業公司和銀行，還投下了鉅大的資本。

哈爾濱的淫業專利公司，設在杜戈佛耶街（Torgovaya street）辦公室佔十一個房間，有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秘書一人，和雇員約二十人。

辦公室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沒有種族或國籍的限制。上門的主顧可以需要一百個

姑娘，也可以只需要一個姑娘，可以預定高等妓院「御待合」的姑娘，或下流妓院「三等料理室」的姑娘，也可以預定咖啡店和酒排間的藝妓。

該公司的門口，由憲兵駐守保護。主顧進門後，由一位衣履整潔的秘書導入半西式的精美房間。主顧當說明來意，需要幾個姑娘，營業的性質怎樣，然後又被導入一個大房間，翻開花名簿，裏面黏着姑娘的照片和她們的「略歷」：是否處女，高或矮，肥或瘦，教育程度，能否歌唱，跳舞等等。選定以後，雙方開始討論身價及合同期限，隨着簽訂合同，主顧先付百分之二十五的身價。

十五天或二十天以後，主顧接到銀行的通知，謂姑娘已經到埠，即可付款「交貨」。主顧就向銀行付款，向該公司呈驗收據，當由該公司派員陪往日本旅館，姑娘正在那裏靜待「交貨」。

從此以後，那些姑娘便成爲主顧的財產，絕對的和無可爭辯的財產，他可以隨心所欲，榨取她們。

合同的期限大多數是五年。滿期以後，姑娘往往回去出嫁，替天皇生育孩子。那些姑娘常常這樣說：『再過十八個月，我的合同就滿期了，我要回到家鄉去和未婚夫結婚。』那些不幸的姑娘，不受法律的保護。他們的命運完全捏在妓院老闆或茶館老闆的掌握中。所謂茶館只是妓院的別稱。

姑娘潛逃是常有的事情，警察奉命追捕，宛如對付逃犯一樣；捉獲以後，交給老闆，受着最嚴厲的私刑，使不敢再有出走的念頭。

哈爾濱的妓院老闆確乎擅長宣傳，凡逢新到一批姑娘時，就把她們打扮起來，盛裝豔服，坐着漂亮的汽車，招搖過市，標明地址，做一次活動廣告。

烏龜和老鴿的殘忍，在東方是盡人皆知的。他們把姑娘看做奴隸，看做人肉，只配受凌辱和虐待，只配受鞭策和傷害。

關於輸送日本妓女到「滿洲」的事情，「日本星期紀事報」有一次曾經加以刻切的批評，它說：『這一件事情決不能增加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尊敬心，如果僅從這一點』

着想，那末，日本也許會儘可能地設法避免或禁止。可是，日本當局毫不介意到這一點，而日本的新興企業家也懂得移殖男人不及移殖女人那樣能夠賺錢。

日本憲兵精明非常，從來不會失去「混水摸魚」的機會。他們在烟賭嫖三個領域內，不久就十分活躍。妓院，俱樂部和茶館，到處開設，如雨後春筍，却並未獲得淫業專利公司的准許。該公司負責人向日軍最高當局控訴，日軍最高當局則移交哈爾濱當局辦理。

我的助手開始報告日本憲兵長官破壞專利權。我的上司也承認遭遇到嚴重的問題，他不知道怎樣辦才好。如果他封閉那些場合，憲兵長官會起來反抗。他也不願和聲勢煥赫的憲兵隊站在公然對立的地位。

考慮了幾天以後，他教我吩咐老陰的部下，襲擊不屬於專利公司的俱樂部，茶館和烟館，劫掠任何值錢的東西，要是老板想反抗，索性把他們槍殺。

我和老陰商量之下，決定先向一家俱樂部動手。據我們知道，它是受憲兵隊管轄的，有四十個日本姑娘，賭博，鴉片和毒物，色色俱全。

老陰吩咐二十個夥計去襲擊那一家俱樂部，劫掠一空後，放火焚燬，可是幾個憲兵事前已經在附近駐守，強盜還沒有動手，就受着機關槍的掃射，二死七傷，其餘只好抱頭鼠竄。

老陰大爲憤怒，罰警裏替他的手下復仇。兩夜以後，大批強盜就襲擊受憲兵隊保護的兩家烟窟和一家賭場，槍殺了三個朝鮮人，痛毆烟鬼和賭徒，劫掠所有值錢的東西。隔了一晚，他們又襲擊一家俱樂部，槍殺了兩個想反抗的烟鬼和兩個朝鮮老板。

對於老陰的兇殘，憲兵隊也立刻採取報復的手段。三天以後，憲兵隊進行搜查屬於各專利公司的妓院，賭場和烟窟，並拘捕了五十個左右的客人，說他們是共產黨，各專利公司感覺到局勢的嚴重，表示驚惶。像這樣的事態，自不能讓它繼續存在，必須謀取解決的方法。

於是，各專利公司的負責人和憲兵隊的長官舉行會議，談判和平妥協的途徑，結果雙方同意，憲兵隊可以設立五家妓院，五家烟窟，一家賭場和一家毒物店，一九三六年，僅

哈爾濱一處，總有一百七十二家妓院，五十六家劇窟和一百九十四家毒物店。在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共有五百五十家正式妓院和七萬個日本姑娘。

「滿洲」的煙毒

在日本人鼓勵之下，淫業逐漸蔓延到整個「滿洲」，固然可怕，但日鮮企業公司所給予中國人民的毒害，是格外不堪設想了。

日軍侵入「滿洲」的幾月以後，整個的佔領區域，就成爲煙毒的世界。在瀋陽，哈爾濱，吉林各大城市，煙窟和毒物店，觸目皆是；幾乎沒有一條清淨的街道。日本人和朝鮮人還發明了一個很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凡吸嗎啡，吸高根或吸海洛因的窮人，可以不必入內，僅須輕輕敲門，門上的小洞便應聲而開；把手臂伸入洞內，隨交大洋兩角，夥計一邊取錢，一邊就在手臂上打針。

國際聯盟的報告，對於「滿洲」在被佔領以前與被佔領以後的毒化狀態，曾有明

顯的對照，從那報告中，我們看出了一幅驚人的畫面，就是說，日本的毒化政策，已經使整個被佔領區域，變成了毒害全人類的策源地。

自日軍佔領哈爾濱後，吸毒者的人數隨着激增。許多年輕的男女孩子，也做了毒物的犧牲品，街道上每天可以發現吸毒者的尸體。領事團和中外人民團體的抗議，宛如石沈大海。日本的毒販甚至侵入白俄的初級學校和高等學校，他們時常獎勵年輕的吸毒者。

日本人教中國的農民種罌粟，不要種大豆，在主要鐵路線附近，烟苗還不多見，可是，離開了鐵路線，就有無數的田地，遍植罌粟。日本人每年向中國銷售的鴉片，要值幾千百萬元；日本人佔領了一個地方，立刻進行毒化政策，因為任何人吸上了鴉片或毒物，就失去「反抗」的意志。

哈爾濱的 Uchatscovaya 街，有一家日本公司，專門向中國銷售鴉片。所有鴉片都被認為「軍用品」，由日本船運往天津，北平，漢口和其它城市。辦事處的主任是一個日

本軍官，重要的辦事員也是日本軍官，都穿了平民的服裝，好像普通商人。

在軍用品的掩護之下，每天有大量的鴉片運往中國，凡有日軍司令的地方，如天津、北平、漢口等處，把貨物交給日軍司令，沒有日軍司令的地方，則把貨物交給日本領事館，沿海用戰艦裝送，沿江則用礮艦裝送。

日本人在大連，瀋陽，哈爾濱，吉林，天津等處，開辦製造嗎啡，海洛因，高根和其它毒物的工廠，每年要出產價值幾千百萬元的毒物。

日內瓦和全世界正努力根除毒禍，但如果不能夠消滅日本人的陰謀，這努力是枉然的，日本企圖毒化全世界。日本利用毒物，損害其它民族的肉體和靈魂，以便更易征服。這計劃在邏輯上是無可爭辯的。可是，只有神明的子孫才能夠發生這一種概念和實行這一種手段呵！

史諾（Edgar Snow）曾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星星六晚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描寫「滿洲」毒物貿易的現狀：

「美國出席國際聯盟鴉片問題委員會的代表富勒 (Stuart Fuller) 提出抗議『滿洲國』實行鴉片專賣的聲明，對於東北毒禍的敘述，還相當溫和。據調查的結果，僅在哈爾濱一處，出售鴉片、海洛因和嗎啡的店舖，已有二百多家。某外國領事館人員告訴我，『這些店舖幾乎全是日本人和朝鮮人特許設立的。但隨便什麼人可以去買，不必需要執照。』我叫一個中國人領到最近的毒物店，付了二十個銅子，果然買到一服海洛因……」

「所謂專賣，在名義上是爲了要根除毒物，實則大大地刺激了毒物的生產量和消耗量。某當局曾向我鄭重聲稱，『滿洲國』境內百分之二十的日本人和朝鮮人，直接從事於毒物的買賣。」

用子彈、炸彈和發彈殺人，代價很高，實行毒化的屠戮政策，那不僅是可以賺錢的營業，同時也是高明的戰略呵。

日本人至少是這樣推想的。

日本的毒物貿易，並不限於中國；日本還把大量的毒物輸入南美、北美各國、菲律賓、馬來羣島、爪哇、蘇門答拉、婆羅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僅僅爲了這一點，全世界也應該起來反抗，以阻止這最害人的罪惡。

各國的警察和法律怎樣懲罰毒販呢？逮捕和徒刑。

怎樣才能夠剷滅日本的毒物貿易呢？在國際聯盟推動下的許多會議和委員會，已經產生了任何結果嗎？沒有，一點也沒有。只要日本能夠掩藏在撒謊和虛偽的幕後，推卸責任，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日本一方面進行麻醉全世界的貿易和政策，向各國人民鼓勵賭博和其它罪惡，一方面却禁止本國的人民從事吸毒和縱賭。『滿洲』的日本人，不准入賭場，一經發覺，就驅逐出境。吸煙或吸毒的日本人，受五年的徒刑。

日本軍事當局曾向『滿洲』的全體士兵散佈小冊子，其中有這樣一段：

『第十五節 像日本人這種優秀民族，是不配吸用毒物的。只有劣等民族和腐化

民族，如中國人，歐洲人和印度人，才吸用毒物。所以，他們註定要成爲我們的奴隸，最後必然趨於消滅。

『日本的士兵如果吸用毒物，就不配穿日本皇軍的制服，也不配尊敬我們的天皇。』

可是，天下的事情總不免有例外。儘管「三令五申」許多日本軍官仍然做了毒物的囚犯，不能掙扎，真是所謂「自作孽，不可活」。

情形非常嚴重，日本關東軍司令兼第一任「駐滿洲特使」武藤大將大爲驚駭，他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密函我的上司，督促注意下面的事實：『據最高軍事當局所知，許多日本軍官常赴賭場和烟窟，他們甚至吸用毒物。本司令茲請閣下注意此事，望嚴格執行特務機關的責任，約束軍官，尤其是年青軍官的私生活；凡軍官的行爲足以損害皇軍的聲譽，應隨時報告本司令，立刻予以懲戒。』

在日本的軍人階級中，武藤大將可以說是一「鷄羣之鶴」，他澈頭澈尾是一位君子。

型的人物。他具着優良的天性，反對劫掠淫亂的政策，企圖箝制黷武主義及其殘忍的手段。他曾經勇敢地向東京提出抗議，敘述日軍壓迫中國人民的種種醜行，主張不要再犯日本的罪犯惡棍移殖一滿洲，並主張削弱憲兵隊的權勢。他曾經竭盡他的力量，謀滅輕一滿洲一人民的苦難，阻止不公平的行爲。他孤身奮鬥，終于確切感覺到，他是在荒野中大聲呼喊，四顧茫茫，毫無反響。他心灰意冷，仍決定上書天皇，鄭重表示希望日本能夠改變對一滿一政策，並削弱軍人的權勢；最後，他籲請不要再虐待一滿洲一的無辜人民。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他實行自殺。

據日本人宣佈，武藤大將死于「心髓麻痺」。直到如今，全世界還有許多人受着欺騙。

第七章

日本軍人的報應

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上司又召見我。他已經接到報告，有巨量的大豆正由蘇聯公司運往海參崴。

「我們必須阻止蘇聯這一種營業。你命令我們的土匪，在穆稜附近炸燬貨車。」我通知老陰幹這一件事情。他答應立即吩咐駐紮在穆稜附近的弟兄，並教我設法送五十磅炸藥到那個地方去。我吩咐第二號助手擔任這一項工作。

四月十一日下午五時，老陰在電話中約我立刻見面。

見面以後，他就問我：「炸藥的事情究竟怎樣？火車已到穆稜，可是，你交待帶五十磅

炸藥去的助手，却沒有蹤影，我剛接到電報。」

我奔去報告上司，上司立刻通知憲兵隊，憲兵隊向各站發電查詢，各站回電都說沒有看見我的第二號助手。

十二日早晨五時，我偕憲兵隊的一個長官武藤飛往穆稜，途中在阿城和葦沙河南處降落，進行調查。午後二時，我們抵達穆稜。可是，既不能發見第二號助手，也不能發見五十磅炸藥，都已經失蹤了。我電告上司，他回電教我們留在穆稜。

六點鐘左右，我們正在討論辦法，一個憲兵下級長官走來報告，謂站長接到電報，五點半的時候，日本軍用車在橫道河子附近遇炸，死傷幾百人。

我們立刻飛往橫道河子，七點半抵達目的地，坐汽車趕到出事地點，景象十分淒慘。深溪上的一架小橋，在火車駛過時，突然爆炸。機頭拖了七輛兵車，直入河底，其它十一輛出軌傾覆，全部焚燬。

我們在出事地點，遇到橫道河子日本駐軍長官某少佐，二十個左右鐵路警察局的

人員，和大批工役，忙着發掘焦灼的尸體。

我們向某少佐打招呼，他簡略回答，要先辦理拯救的工作，然後進行調查。

幾分鐘以後，救護車開到，至深夜兩時，發掘的工作，始告完畢。沿岸陳列尸體，共九十二具，受傷者三百七十四人，其中六十人的傷勢甚為嚴重。救護車裝了受傷者，駛往哈爾濱，尸體則依照日本風俗，焚化成灰，送歸家屬。

黎明，又開到一列火車，下車的有若干路局人員，一隊日本兵，和許多調查員，觀察員及偵緝員，其中有日本人，中國人，也有白俄。

要查明爆炸的地方是很容易的。越過溪面的鋼條，下一塊大基石已被搬去，洞穴內安置着炸藥，一根電線通到離橋約二百碼的岸邊叢林，跟電池相接。

我一邊觀察這些情形，一邊就直覺的回想起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張作霖將軍和吳俊升將軍遇炸的往事。

目觀慘狀，不禁生憐憫甚至懺悔的意思，可是，當我回想起張作霖將軍的慘死，我又

恢復和平的心境。我和「滿洲國」的中國人，已經相處了二十多年，他們具着堅毅的品性，我向來敬愛他們，如今，我却看見他們受着壓迫，苦難和屠殺。

查明情形後，他們開始搜尋罪犯。到了四月十三日下午一時，他們已經在橫道河子及鐵路左右的村鎮，捉獲四百個以上的中國人、白俄和紅俄嫌疑犯。可是，案件的本身仍毫無線索。

下午兩時，一個日本憲兵隊的中佐，從齊齊哈爾飛到橫道河子，負責進行調查。這一個黃綁腿的兩腳動物，沒有一點人氣，其實罵他畜牲還不免侮辱了獸國。他是用中國名字的日本人在「滿洲國」和蒙古。許多日本軍官都用中國名字和蒙古名字，穿「滿洲國」軍隊或蒙古軍隊的制服。欺騙當然是唯一的動機。我們屢次從報上看到，蒙古或「滿洲國」的高級官員與日方舉行會議，或向日方表示同情的誠意等等，那些所謂高級官員，原來就是掩護在中國名字後面的日本人。

我給他取一個渾號，叫「托爾克馬達第二」(Torquemada II) 這一個中佐體格

上的醜陋，正與他不健全的怪癖的靈魂相協調；矮小得可憐，曲腿，牙齒陷在嘴唇外，成四十五度角，舌尖不斷舐着嘴唇，令人望而生厭。

他懂得幾個俄國字，能講壞極不堪的英語。

他說，肇禍的兇犯必須設法拿獲，他甚至不惜把出事地點附近的民衆，全數使受酷刑和屠殺。

據同行的武藤班長告訴我，「托爾克馬達第二」是一個下賤的雜種，他想回到哈爾濱，我的意思也相同。所以，我們決定致電上司請示。但上司命令我們不要動身。

四百個嫌疑犯閉在一個大堆棧內，中俄乞丐，上等人士，富人和窮人，男人和女人，都擠在一起，宛如羊欄，毫無差別。至少有一百個日本兵攜步槍和機關槍，把守四周。

下午三點半，「托爾克馬達第二」請我到火車站的辦公室，那裏另外還有兩個軍官，他說：

聽說你在哈爾濱給參謀部當翻譯員（武藤班長向他這樣介紹），你又是意大利

利人。這就格外妥善了。我討厭俄國人，不管是白俄，紅俄，還是黑俄，都是七樣。俄國人卑劣下賤，恰像中國人。他們只能夠在黑暗中互相殺害，不敢明槍交戰。他們全是豬羶……四萬五千萬中國人……一萬六千萬俄國人……你曉得總數是幾少？

我一聲不響。

「你不回答好，我告訴你，六萬一千萬隻豬，豬羶！豬羶！現在我們去審問罷。」

我們四人向那大堆棧走去，二十個憲兵衛護我們，推開大門，飽受恐怖的四百個嫌疑犯，以為是要釋放了，想向外奔衝，被憲兵用槍柄猛擊。

日本的軍事法庭開始了，「托爾克馬達第二」主審，憲兵列隊面對着囚徒。憲兵一人呈交一束日文的和俄文的案卷。「托爾克馬達第三」隨便取出一份，傳遞給我。

他說：「喚這一個人。」

那一個人的名字叫阿斯達金（Feodor Vasilovich Astakin）

他是典型的俄國工人，約四十五歲，走到桌子的前面。

廷審的紳士裏面說：「這一個傢伙是出事地點那兒的更夫。他是蘇聯人民，所以是共黨黨。他既然是更夫，就應該知道在橋底下埋炸藥的究竟是誰。叫他老實供出，否則把他槍斃。」

我講給阿斯達金聽。

他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能夠答復的，只有這句話。如果他們要殺我，隨他們的便。」

我把這幾句話講給托爾克馬達第二聽，他暴跳起來，好像一隻發狂的猩猩。

「瞧你，不肯招供，你不怕死嗎？你地許以為我們不能夠槍斃你……我給顏色

你看……」

他拔出手槍，用槍口擊着阿斯達金的額角，向我說道：「你再對他講『這』，並警告他，要是再不招供，我立刻槍斃他。」

但更夫毫不動搖，毫不畏懼，靜鎮地瞧着我，他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托爾克馬達第二」咆哮着，「他說什麼？」

「我不得不講給他聽。」他說，「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剛說出這句話，他就開槍射擊，應聲倒地，鮮血滿面，男的詛咒，女的哭泣，整個的屋子變成瘋人院，一個高大強壯的中國人，遏制不住心頭的憤怒，突破憲兵的包圍線，衝到「托爾克馬達第二」面前，後者連開三槍，結果了那一個人的性命。

他咆哮着：「你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再不安靜，我就用機關槍掃射。」

我爬上桌子，費了很大的氣力，傳達「托爾克馬達第二」的可怕的命令。

他們終於安靜下來。

兩個日本兵把屍體倒拖出去。

「托爾克馬達第二」又開始審問。五十多個中國人和俄國人，男的和女的，受到各種的威脅和侮辱。結果仍然毫無線索。只有一個中國孩子供出了一些模糊的情形，他說，那一天早晨，他看見兩個中國人和一個俄國人，在離橋不遠的地方。

每人經審問以後，依照命令，分左右站立。晚上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托爾克馬達第二」宣佈退庭，吩咐把未經審問的嫌疑犯繼續看管，站在右首的加以釋放，站在左首的拖出槍斃。被槍斃的有三個俄國女人和一個中國女人。

二百多個日本兵和憲兵竄擾四鄉，發揮獸性，散播恐怖，幾乎沒有一家能夠倖免。許多中國人和俄國人被屠殺，他們的住宅被劫掠焚燬。許多年青的姑娘被凌污，其中有的不滿十歲，五個傷重而死。酒店被襲擊，老闆被槍殺，各種暴行，一言難盡。

在火車站的轉角處，我們遇到一羣喝醉了酒的日本兵，他們拖着許多中國姑娘和俄國姑娘，有幾個完全裸體。「托爾克馬達第二」微笑說道：「從今以後，附近一帶不會再發生覆車的事情了。我們只能夠用恐怖手段來教訓這些俄國人和中國人。」

他請我們到他的住處吃飯，一共五個人：兩個陪審的憲兵長官，武藤班長，我和他自已。

菜肴很豐富，各種的酒都有，全是從店舖搶來的。他邊吃邊喝，喝比吃還要利害。

一喝醉了酒，他們就忘記了應酬外賓的禮貌，顯出原形。他們離開桌子和椅子，坐在地，解去衣服，拚命再喝，高談闊論，互相觀看，繼以狂笑。

突然，「托爾克馬達第二」好像觸動了靈機似的，吩咐一個勤務兵，勤務兵立刻走出房間。大家都瞧着我，又放聲狂笑。

「托爾克馬達第二」高聲說道：「乾杯呵！乾杯呵！聽說意大利人不歡喜水，只喝酒……在酒裏洗澡……有沒有這句話」

我一聲不響。

「你幹麼不講話？你和四個日本軍官在一起，值得驕傲，值得愉快，你却面帶愁容，這是什麼一回事」

他和其餘三人講了幾句日本話，於是大家又狂笑起來。

一個軍官爬到旁邊睡下，張開了嘴巴，露出一套醜牙，不久就像肥豬一樣打鼾了。

「托爾克馬達第二」還喝着酒，形狀格外令人討厭，帶着滯重的聲音對我說道：「

如果給你做一個日本軍官，你情願拿出什麼東西做代價？馬上回答我！」

我決定不回答他。

他繼續說道：「你要貢獻你的生命，就是這樣，你還是不能夠成爲一個日本軍官。在幾年以內，你可能成爲一個美國軍官，或英法俄各國的軍官，你却永遠不能夠成爲一個日本軍官。做一個日本軍官實在是最大的光榮。」

「我還記得，我從前穿了制服，在華盛頓街道上步行的時候，大家都含着妒忌的眼光看我，因爲他們明白，他們即使擁有無限的財富，美麗的別墅，五十層的摩天高樓，和一切莊嚴偉大的場面，他們却永遠不能夠成爲一個日本軍官。」

「日本的皇軍是世界上完善，最光榮和最偉大的組織。只有日本的皇軍從未打過敗仗，日本的皇軍曾經擊敗過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和俄國。」

「我們現在又要幹起來了。在幾年以內，日本的皇軍將征服中國，俄國，美國，英國和法國。整個的太平洋，從南極到北極，必須屬於日本。我們光榮的陸軍將控制地面，我們無

敵的海軍將控制海面。現在全世界還沒有明白我們的威力究竟如何。但我們開始行動時，他們就會感覺到。美國人對我們採取關門主義，可是我們仍將破門而入，做他們的征服者和主人翁。他們會高興給我們擦皮鞋。我們首先必須征服中國和俄國，把我們的太陽旗插遍太平洋的沿岸。全世界還沒有知道日本皇軍可能做的或就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什麼。」

他邊笑邊喝，繼續胡言亂語，毫不覺得他是在宣佈學校中教官的重要課程，也毫不覺得他是在洩漏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秘密觀念。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日本打敗德國需要幾個師團，你知道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好，我告訴你，我們早就估計過了。我們只要十五個師團就可能擊退德國的軍隊。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的校長這麼說，我們的參謀本部也是這麼說。日本一師團，等于俄國十五師，美國十五師，英國十三師，法國十師，德國六師。」

「日本的海軍可能粉碎全世界的海軍。你笑嗎？等着瞧罷，五年以內你就懂得我講的話。當我們用嚴厲的手段威脅張學良將軍的時候，他曾經向我們表示，中國國民黨、國際聯盟、蘇聯的紅軍、美國和英國的海軍，都替他撐腰。那嚇退了我們嗎？那阻止了我們嗎？一點也沒有。我們到「滿洲」已經六個月了。情形怎樣呢？國民黨就是說南京政府已經不願抵抗。國際聯盟派來一個調查團，全是「老太婆」，只想多吃一點東西。英國和美國的海軍沒有蹤影。蘇聯的紅軍，宣傳得很利害的紅軍，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你有沒有看見過。沒有，就是我們也沒有看見過。爲表示毫不畏懼紅軍起見，我們將奪取他們的鐵路，槍殺他們的人民。他們甚至連抗議都不敢提出來，再乾一杯！」

在他結束長篇大論之前，勤務兵回來覆命，等他講完，就趨前報告。

聽了勤務兵的報告以後，他就說道：「可不是嗎？」一脚踢醒了睡着的軍官。

推開大門，幾個日本兵擁入五個年青的俄國姑娘，她們都哭泣着，三個像鄉下姑娘，兩個似乎出身于上等階級。

他驚醒，惺忪的眼睛注視着俄國姑娘。

「托爾克馬達第二」帶笑帶叫站起身來，却又倒退，跌在睡着的軍官身上。軍官給他驚醒，惺忪的眼睛注視着俄國姑娘。

整晚，武藤班長和另一軍官，喝酒很少，始終沈默，只在旁靜聽，有時點頭，有時搖頭。

那些姑娘被迫坐到地板上，靠着「托爾克馬達第三」和另一軍官。他擺出英勇的氣概，給啤酒她們喝，她們却拒絕。他大大不快，向我說道：

「你告訴她們，我是中佐，在這區域內，我對每一個人有生殺之權。她們如果好好侍奉我們，她們不會吃什麼虧，否則就太糟糕了。你歡喜那三個，請你先挑選，你是我們的客人，有優先權。我們日本人待客人是常常很恭敬的。」

我既無動作，也不答覆，他又繼續說道：「也許你不歡喜俄國姑娘，你要中國姑娘嗎？到吩咐他們去帶一個來。」

我心裏厭惡之極，忍耐不住，乃起身告別，表示時間已過不早，要去睡幾個鐘頭，並且說道：「我對姑娘也不感興趣，因為我已經是有幾個孩子的父親。」

他注視着我，好像不願意給人家違抗的神氣：『你要得到我的允許，才能夠離開。』我冷漠地回答道：『不管是否允許，我現在要去了。我的責任是當翻譯。關於女人的事情，你另找別人罷。』

這樣我就走出了，我走出的時候，還聽到他向武藤班長問什麼話，武藤班長竭力撫慰他。

站長允許我在二等客車內過夜。

早晨八時我起身。我正想離開臥車時忽然走來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乞丐』向我討錢，他說：『我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兩男一女。』

我一邊向袋裏摸錢，一邊低聲問道：『從這裏到你們的隊部多遠？』

『三天路程。』

『那末，你想法子兩天趕到，教你們的領袖立刻就來，這裏幾百個中國人和俄國人正被屠殺。我的第二號助手究竟怎樣了呢？』

「我們把他活埋了。」

「你要錢嗎？」

「不要。」

「一路順風。」

我給他五分錢，離開臥車。

一個憲兵長官的狼狽

直到下午兩點鐘才看見「托爾克馬達第二」武藤班長告訴我，只有兩個姑娘給污辱，其餘三個已送回家中。

審問繼續進行了幾天。槍殺和酷刑，不分皂白。

憲兵隊的二十個白俄走狗，也從哈爾濱走來，他們立刻開始工作，把路有資產的人一網打盡，勒迫出重價取贖。大部份孝敬憲兵隊的長官，其餘則由俄國走狗分潤。

一個憲兵班長老實告訴我，在五天内，他獲得六千五百塊錢，「托爾克馬達第二」的收入，在兩萬元以上，其他長官也各有適當的酬報。

在日本的憲兵界，掠取被統治民族的財產，大家並不認為是欺詐的專情。普通軍官也具着同樣的觀念，不過較守分寸而已。「滿洲」的日本軍官，在期滿回國的時候，往往搜括了四五萬元。呻吟于日本苛政之下的朝鮮，台灣和「滿洲」的無數犧牲者，便是日本軍官敲榨良民的最有力的證據。

著名的女間諜川島芳子，曾于一九三四年之初在廣播中這樣說道：「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官在「滿洲」的橫行不法，使一般民衆懷着無限的憎恨。這種局勢的造成，完全是由于日本把最惡劣的公務員和軍人送到「滿洲」，他們只想在最短期間拚命搜括，不惜採取任何壓迫手段，以達目的。他們榨取人民的金錢，強迫老百姓種植罌粟。」

我又致電上司，要求回到哈爾濱，他仍然不准，來電訓示：「留駐原處，注意事態發展。」他顯然不放心憲兵隊，他是懂得太清楚了。

十九日晚上，老陰和兩個夥計，到達橫道河子。一下車，三人就給逮捕。老陰手下的一個強盜走來報告，我去見中佐，對他說明老陰是日本人的朋友，在採取任何步驟之前，他應該向哈爾濱請示。

「我向誰請示？向土肥原大佐請示嗎？你以為土肥原比我偉大嗎？我是憲兵中佐，一個憲兵中佐要超過一個陸軍大將。我要親自來審問這三個中國人，如果他們說不出到橫道河子來的充分理由，我就把他們槍斃。在這裏指揮一切的是我，不是土肥原。」

我和武藤班長商量：「我們必須設法拯救老陰和他的兩個夥計，否則將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老陰手下的弟兄，有幾百個人留駐在穆稜和橫道河子一帶。他們對於這裏的情形，一定非常明瞭，我們倘不設法拯救他們的領袖，他們恐將毫不猶豫地襲擊日本的軍隊。」

我不欲老陰的弟兄襲擊日本的軍隊，因為我還有別的計劃。

武藤班長建議致電參謀部，報告憲兵隊拘捕老陰的事情，並請求設法釋放。

深夜兩時，關東軍參謀部來電，命令「托爾克馬達第二」立刻恢復老陰等三人的自由，這命令他不得不馬上執行。

隔了六個鐘頭，他叫我去談話。他獨坐在臨時辦公室內。

他把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顴眉蹙額地說道：「你幹麼打電報給參謀部？老陰是誰？他給誰工作？你到底是誰？趕快回答這些問題！否則我就跟你一刀兩段。我心裏很想向你的腦袋開一槍。」

「我會向最高日軍當局提供諾言，永遠不說出替誰工作，所以我不能夠回答你的問話。如果你要知道我替誰工作和做什麼工作，請你去問參謀部。」

「我現在知道你是來監視我的工作的。」

「你錯了，我到穆稜是在鐵路炸燬以前。」

「你幹麼不動身？」

「這是上司的命令。如果上司要我離開這裏，我只會覺得高興，和你見面是沒有什

麼樂趣的。」

我昂然走了，甚至沒有鞠躬。

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愚笨的蠢物，這樣專橫狂妄的畜生，然而，他却是日本陸軍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當我還在咒詛着的時候，我在村莊附近又遇到那一個「乞丐。」我給他錢，他向我說道：

「C君率領二千人，明晚到達。S君已在這裏，今晚十一時，他上臥車來看你。」

和其他許多俄國人一樣，S君也加入了義勇軍，他們誓欲殺盡所有的日本人，燬滅一切日本的東西。

「滿洲」到處是退伍軍官和士兵所組織的義勇軍，他們隨時困擾敵人，使不得片刻的安甯。

在我離開「滿洲」的時候，這些義勇軍是鐵路線以外真正的統治者。日本人佔領

「滿洲」已經六年，可是他們所控制的，只是沿鐵路線的地帶，鐵路線以外幾公里的廣大區域，完全是義勇軍的世界，日本的飛機固然時常可以出去轟炸，但日本的步兵則不敢遠離鐵路線。

那些義勇軍——日本人口中的「匪賊」——造成了許多可泣可歌的英勇行爲，充滿了熱烈的愛國情緒，曾經給予敵人以無數次的驚人的襲擊。一九三五年五月間，離齊齊哈爾一百哩的 Meitokato 地方，日軍二千人包圍義勇軍三百二十三人，他們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抵抗日軍的進攻，足足三天，日本飛機投擲了一百多枚炸彈，活着的只賸六十人，而且幾乎全部負傷。日本兵以爲他們一定是殲滅了，都高枕安臥，他們却上了刺刀，帶着軍刀和手榴彈，于黑暗中向日軍的營房爬去，發生壯烈的搏鬥。義勇軍混入營房以後，左右廝殺，日本兵像瘋人一般，開槍亂射，互相屠戮。結果六十個義勇軍都壯烈犧牲，日本兵也死了一百五十七人，傷了二百多人。

就是最野蠻的部落，對於勇敢善戰的敵人，往往表示敬慕的意思，日本的軍隊却不

然。敵人越打得利害，日本的軍隊越變得瘋狂，他們對於任何敵人，只有仇恨和侮蔑，不管防守的或進攻的敵人是怎樣勇武果敢。只有日本人是英雄，只有日本人可能演出勇武果敢的行爲。

因此之故，那一次日軍長官看到了義勇軍司令的尸體時，還要發洩武士道的本能，除了咒詛已死的英雄外，還要加以踐踏和蹴踢。

這一種殘暴的獸性，似乎令人難於相信。可是，現在全世界已經可以從報紙上或無線電廣播中，看到或聽到日軍在華北、上海、南京、杭州等處的種種暴行。現在全世界當已不難想像「滿洲」內地所發生的不幸事態，而且，我所提供的證據，還不過是「文明國家」的暴行的一小部份。

第 八 章

復 仇

夜間十一點鐘，S君上臥車來看我，久別重逢，不勝歡欣。他是自俄退伍軍官，在歐戰結束以後，加入「滿洲」的情報機關，受我的指揮，有幾個年頭。他報告在C君領導的義勇軍部隊中工作的情形，和日軍發生許多次戰鬥的經過，以及未來的展望。我向他詳細說明橫道河子附近的整個局勢，日軍駐紮的地點和人數，以及日本憲兵隊，白俄軍，日本參謀部和日軍司令的所在地。

直到兩點鐘，S君才離開，消失於黑暗中。

二十二日，武藤班長接到回哈爾濱的命令，我也接到了一個電報，上司吩咐我留駐

原處，準備詳細的報告，並特別注意憲兵隊和白俄走狗的行動。

晚上九點鐘，附近居民突然呈緊張的狀態，原來一個日軍中尉在妓院裏槍殺了一個不很體貼入微的姑娘。他在走出妓院的時候，見人就開槍射擊，又打死了一個朝鮮人，打傷了一個俄國女人和兩個中國人。不用說，他是日本軍官，穿了大日本帝國的軍服，誰也不敢觸犯他一根毫毛。

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約老陰吃夜飯。午後四時，那一個「吃巧」走來通知我，說C君的部隊已包圍橫道河子，教我在天黑以後不要走出臥車。

九點鐘，老陰來了，隨帶兩個親信和四個弟兄，站在臥車外把守。

席上是佳肴美酒，老陰却憂容滿面。

他說道：「我現在算什麼呢？許多年來，我手下有一萬五千個弟兄，如今只剩一千人，他們曾經允許我至少可以招集五千個弟兄。他們要我幹的，只是一些醜惡的事情，拚不到幾個錢。我們搶劫了一個村莊，幾天以後，日本人和朝鮮人，就去侵佔。他們以為我完全

不明白這情形嗎？所以把我看做了呆子，隨便來玩弄我嗎？他們當心些罷！他們最初向我表示，只要我壓迫蘇聯僑民和朝鮮人，可是他們如今利用我來壓迫中國人，誣稱他們是共產黨。誰聽說中國農民會做共產黨？我嫌惡極了，有一天，我要給顏色他們看，我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默然不語，他繼續說道：『你別以為我對你有所不滿。我很瞭解你的情形，你幹這工作，完全出於日本人的強迫，違反你自己的意志。一切我都明白，就是藏在你的心裏的事，我也明白。我最覺得痛苦的，是你並不十分信任我。我們兩人可以共患難。我希望我們兩人，有一天能夠掙脫日本劣種的束縛，自由行動。日本人算什麼呢？在體格上，他們是矮子，在思想上，他們是猩猩。你看見過叫「托爾克馬達第二」的那一隻狷猴嗎？我每次見了他就惡心。』

『我在動身以前，很想割去他的兩隻耳朵，給他一個紀念。隨我同來的李通（譯音）已經罰過誓，如果「托爾克馬達第二」不趕快滾出橫道河子，他就要……』

講到這裏，步槍和機關槍聲突然大作，一個弟兄走上臥車報告，鎮上到處都有槍聲。時間是十一點十分，老陰顯出毫不關切的神氣。

我向他問道：『我們應該出去嗎？』

『去幹麼？我們有什麼辦法？我們只有手槍，對付不了步槍和機關槍，待平靜無事後，我們再下車。而且，據我想，他們也不會麻煩我們。』

老陰吩咐弟兄們走上臥車，原來不止四個，共有十一個。

槍聲時斷時續，直到早晨四點鐘，我們才走出臥車。

這一次襲擊完全出於日軍的意料之外，他們從夢裏驚起，不及攜取槍械，有的給殺死，有的給俘獲。許多在妓院中消夜的軍官，一聞槍聲，都穿了寢衣，徒手倉皇四奔，反抗的被槍殺，不反抗的做俘虜。事後，義勇軍安然退入山地。

當我們察勘情形時，一切後餘生亡的日本軍官和士兵，一個一個露臉，到上午七點鐘，集合起來的共有軍官十一人，和士兵一百三十七人，他們的槍械全給義勇軍奪去。憲

兵隊的二十三個白俄走狗，十四人送命，九人逃逸無蹤，此役日本方面的損失，被殺死的計一百四十三人，被俘獲的計一百二十七人。電報的交通恢復以後，我們又接到另一報告。知道另一部份義勇軍，同時襲擊離哈爾濱一百公里的一面坡。日軍一百三十四人被槍殺，八十六人做俘虜。

上午十一時，一大隊日本兵由專車開到橫道河子，十二架飛機四面低空偵察。

四月二十五日，我接到上司的電報，吩咐我趕回哈爾濱。老陰到車站來送行，他很感動地說道：『要是你不請我吃夜飯，我和弟兄們恐怕都已做了冤鬼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恩德。』

我向上司報到，他待我非常客氣，與其說他關心火車出軌和義勇軍襲擊橫道河子的事情，不如說他更關心「托爾克馬達第二」的一切行動，即從「托爾克馬達第二」初到橫道河子的時候起，直到被義勇軍俘獲的時候止，對於被犧牲的日本人，中國人和俄國人，他不加批評，也毫無憐憫或同情的表示。

五月二日，對於橫道河子事件，日軍特務部發表下面的「正式報告」：

「四月十二日下午五點半，蘇聯奸細在橫道河子附近傾覆開往穆稜的列車，死三人，傷十人。據兇犯供述，這完全是共產黨的陰謀。」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時，匪賊四千人襲擊橫道河子的日軍一支隊，我軍當予痛擊，斃敵三百六十七人，俘獲二百一十一人，並奪獲槍枝子彈甚多。我軍死四人，傷十一人。」

這一個報告的具名者是日軍特務部土肥原大佐。而這一個報告却也是以表徵日本民族的特性。他們懷着永恆不變的信念，以為只有日本人是優秀的民族，是神明的子孫，任何民族不能夠和他們相比擬。因為懷着這樣的信念，他們便不能夠承認失敗。這信念使他們盲目於事實的真象。他們連自己體格上的劣點，也不能夠加以辯別。

日本的陸軍和海軍究竟怎樣的實力？這是日本人絕對不容許加以討論的問題。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所向無敵，可能擊敗全世界的陸軍和海軍，此外沒有討論的餘地。每一

個日本人，上自天皇，下至苦力，都懷着這樣的信念。

爲什麼如此呢？因爲天皇是天照大御神的直接後裔，所以天皇的軍隊必然是不可征服的。天皇的軍隊既然是不可征服的，那末軍隊裏的士兵也必然是不可征服的了。

因此，如果說一個日本兵吃了敗仗，就是對於整個皇軍，天皇和天照大御神的侮辱，如果說若干中國人炸燬日本兵車，日軍死傷幾百人，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於是，把若干中國人變成「蘇聯政府」，削弱損害的重大性，減少死傷的數字，而且不表明死傷的是日本兵，以保全皇軍，天皇和天照大御神的榮譽。

日本的「官方報告」與事實或實際的動作，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日本軍官做報告或公報時，他的最重要的任務，在於誇張和渲染日本皇軍的大無畏精神和不可征服性。爲完成這一種任務起見，無所謂言過其實，無所謂不可相信。越是言過其實，越是不可相信，日本的軍事當局越是贊賞和得意。

在我給「滿洲」日軍工作的四年半中，關於日軍和「匪賊」或義勇軍的衝突，我

從未看到過一次準確的報告。日本人從未承認他們吃過敗仗，或蒙受重大損失。他們就是獲得了真正的勝利，他同樣要大大地加以誇張。假使我們把日軍當局所發表的公報集合起來，它們可以構成一冊「笑話大全」。

試舉一例。關於松柏鎮（譯音）地方的戰役，駐哈爾濱的多門師團長發表報告如下：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日軍一支隊約一千二百人，在松柏鎮附近（離哈爾濱只有幾公里）遭遇「匪賊」八千餘人，都配備着蘇聯的步槍和機關槍。幸我士兵忠勇萬分，經過六小時的激戰和幾次的肉搏衝鋒，「匪賊」終於狼狽逃遁，遺尸一千二百四十具，受傷者七百六十三名，我方死十四人，傷三十一人。」

可是，這完全是海外奇談。據我所知，事實是這樣的：

「大隊義勇軍在松柏鎮附近襲擊日軍三千五百人。日軍一度頑強抵抗後，被迫退往松花江沿岸，駐紮於漁夫的村舍中，等到天黑，乘漁船渡江，當遭義勇軍痛擊。渡到對岸

的，只贖一千六百七十六人，其中還有許多人受傷。六天以後，當日軍增援部隊佔領松柏鎮時，江邊一帶發現日軍尸首九百零七具，都赤裸着身體，制服完全給「匪賊」剝去了。在以後的十五天內，水面上又發現尸首五百三十一具，指揮官某大佐的尸首也在其中。

『五月二十七日，哈爾濱日軍當局接到義勇軍司令的信件，通知捕獲的俘虜，有士兵三百八十二人，軍官十一人，並建議相互交換俘虜。』

日本軍人頭腦的這一種基本特徵，不僅從嚴格的軍事問題上顯示出來，並且從日常生活的瑣碎事件上顯示出來。

再舉一例。哈爾濱一個日本憲兵，在街道上阻止行路的俄國人，要加以搜查。俄國人因為含着酒意，勇氣百倍，抓住了憲兵的衣領，奪去了他的手槍，重重地捶了他一頓，憲兵折斷了一隻手臂，頭蓋骨也被擊碎，躺在地上，不能動彈。刑事科的俄籍警長費多洛夫（*Theodoroff*）把酒醉的俄國人，帶入警察局，按照事實，提出報告。

第二天早晨，日本憲兵隊的司令喚費多洛夫去，大加申斥，幾乎要把他槍斃。

「你怎敢擅自報告一個酒醉的俄國人能夠解除日本憲兵的武裝，還加以痛毆呢？你已經侮辱了日本的皇軍和日本の天皇。另外做一個報告罷，講話要留神。」

可憐的費多洛夫，不知如何是好，便去請教一個叫石橋的日本律師。石橋不加思索，寫成下面的報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晚上十點鐘，日本憲兵寬信太郎途中遇着二十多個青年共產黨，他們叫囂喧嚷，侵害平民，擾亂治安。寬信太郎挺身向前，喝令那一批共產黨立刻分散，不得滋生事端。那些酒徒，不但不加理睬，反以木棒圍擊。」

「寬信太郎宛如真正的武士，奮不顧身，以寡敵衆，雖受傷頗重，終於驅走共產黨，並拘獲首領。他完成了自己的責任後，昏厥倒地。」

「我是一滿洲國」警察局的警長，對於寬信太郎這種英勇的舉動，自應呈報最高當局。寬信太郎不愧爲日本皇軍的代表，不愧爲真正的武士，我們表示無限的仰慕和敬佩。」

在哈爾濱，這一個報告成爲笑柄。可是，這一個報告却大爲日本軍事當局所贊賞，連費多洛夫也受到誇獎。

三個月以後，憲兵寬信太郎由長官頒給榮譽的勳章。

第九章

李頓調查團

我是於五月一日回到哈爾濱的。不滿十天功夫，李頓調查團就要抵達哈爾濱了。在一星期以前，各警務機關已經接到命令，搜捕欲向李頓調查團有所呈訴的嫌疑人物。

日本警務機關的系統，很難使人相信或明瞭。『滿洲』有下面這許多機關：

- 一、日本特務機關，機關長由東京委任，僅向東京負責。
- 二、日本憲兵隊，受日本軍事當局的節制。
- 三、滿洲國『的憲兵隊，受『滿洲國』軍事當局的節制。

四、「滿洲國」警察，由「滿洲國」內政部管轄。

五、首都警察，由市政府當局管轄。

六、日本領事館警察，向日本領事館負責。

七、刑事警察，由市政府當局管轄，但不受首都警察的節制。

八、「滿洲國」特務機關，由「滿洲國」軍政部管轄。

九、鐵路警察，由路局管轄。

這些警察機關個別活動，彼此沒有聯繫。它們不僅不合作互助，反而時常牽制衝突。它們中間的憎恨、妒嫉和仇視，令人難信。事實上，每一個警務機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偵察其它警務機關人員的行動，並加以攻擊。這一個警務機關認為某人危險而可疑，加以逮捕，那一個警務機關却稱他是模範的公民和紳士；這是常有的事情。舉出一個例子：卡佛爾斯基本來是大富翁，日本軍事當局掠奪了他的財產，他因為不能夠償還債務，便宣佈破產。「滿洲國」警察和首都警察都替他辯護，說他誠實可靠，毫無可疑的地方。

憲兵隊和特務機關却堅稱他是一個流氓，可能觸犯任何罪惡。這一種矛盾的證據，常常在法庭上惹起笑聲。

逮捕「嫌疑」人物的命令，對於哈爾濱各警務機關的工作人員，實在是一筆最好的交易。

一天一熱，各警務機關的工作人員便狼奔豕突，四面出去逮捕富戶，勒索巨款，然後恢復他們的自由。最苦痛的是，他們被憲兵隊方面敲榨以後，認為可以平安無事，却又給其它警務機關所逮捕，受第二次的勒索。若干有錢的中國人，竟被逮捕五六次，因為已筋疲力盡，不堪再經敲榨，便鄉鄰入獄。

據日本當局的命令，所有被拘的「嫌疑」人物，要到李頓調查團離開「滿洲」以後，才得釋放。他們都給幽禁在地下室，讓竊賊、賊盜、販毒等魑魅魍魎，混在一起，有許多人在李頓調查團離開「滿洲」的三四十天以後，才恢復自由。

在李頓調查團抵達「滿洲」的一個月以前，日本方面就命令許多中國人和俄國

人成立委員會，準備向國際聯盟的代表呈遞說帖。不用說，那些說帖都是出於日本人的手筆，中國人和俄國人只須簽字具名而已。不用說，那些說帖對於「滿洲國」的光榮的現在和未來，表示着無限的贊美和熱忱。

關於歡迎委員會的組織，確實費了一番心思。他們訓練全體委員，怎樣待人接物，怎樣措置自己。所有委員須默記要說的話和說話時候的神氣。他們不能夠多說一句話，也不能夠少說一句話，他們不能夠流露出足以招致懷疑的任何表情，否則他們就不能夠保全生命。

李頓調查團是到「滿洲」來調查真實的事態的日本人，於是竭力掩蓋事實，用各種方法欺瞞團員。

哈爾濱的摩登飯店——調查團重要團員下榻的地方，陷入被圍困的狀態。日籍和俄籍的特務人員，佔據貼近團員臥室、浴室、房間，伴為普通的旅客。三個暗探充任職員，其他暗探則充茶役和侍者。三個日本姑娘充任臥室的女僕。所有餐室、書報室和會客室，都安

插了許多暗探，其它像大光明飯店和新世界飯店等，也有同樣的佈置。

此外，凡日本人認為若干團員或許要去光顧的大商店，菜館和戲院，也派遣暗探，充任職員，招待，侍役等。

被捕的「嫌疑」人物，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一個中國人，俄國人和朝鮮人，以及九個日本人都送到松花江對岸松柏鎮（譯音）的集中營。離哈爾濱只有六公里。為預防團員訪問監獄起見，日方把各監獄中的政治犯，蘇聯人民和能講英語或法語的犯人，一律移往集中營。

各醫院也採取同樣的步驟，把所有可疑的病人都搬到日本醫院去。

一切佈置就緒後，日方還要假造民衆的熱忱，向調查團表示，他們都是擁戴「滿洲國」的。

在日方督促之下，趕製大批的「滿洲國」小旗和薄儀相片，小旗的成本每面三分，相片的成本每幅二分。可是，他們却向民衆每樣取費一元，而且是強迫的，所有哈爾濱的

居民，沿鐵路線的中國人，俄國人和朝鮮人，都須購買一套。推銷隊包括一個中國人，一個俄國人，兩個憲兵和一個收款的日本人。推銷隊挨戶兜售，並向居民威脅，倘不購買一套，在門窗張貼，表示歡迎調查團，全家將遭逮捕。如果貧民當場拿不出兩塊錢，限于十五天以內，向警察局繳款。

我的上司宛如失去了頭的蒼蠅，一面發出許多命令，一面又發出許多相反的命令；一面逮捕若干「嫌疑」人物，一面又釋放了他們，他真覺得坐立不安，恐怕隨時會發生對他非常不利的某種行動。

五月四日，我應召去見上司，走進辦公室，就知道他正在大發脾氣。一見面，他向我怒聲詆斥道：

「你什麼都不懂得，除了我告訴你的事情外，你什麼都不知道。我真不明白，張作霖將軍貪圖你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真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僱用你，提拔你，給你很多的錢。如果我做了張作霖將軍，第一天我就請你滾蛋，一分鐘也不要看你。你是不中用的傢

伙，毫無用處的傢伙！」

我回答道：「你既然覺得我毫無用處，幹麼不叫我滾蛋呢？我從未向你要求工作。只要你讓我自由，我決不會有所埋怨。」

「不准說話！你別忘記了我是特務機關長。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知道沒有答覆的權利。現在，我問你，你知道張鳳亭（譯音）和莫文瀚（譯音）這兩個人的嗎？」

這兩個大我是知道的。張鳳亭是大財主，是哈爾濱匯兌業委員會的主席，是二十多家銀行錢莊的老板或經理；莫文瀚是同發隆（譯音）百貨公司的主人，也很有錢。

上司對我說道：「這兩個人現在正起草請願書，教其他富商共同具名，他倆想秘密遞給李頓調查團。幾小時以前，一個日本特務員向我報告，據他所知，請願書的內容對於「滿洲國」是不利的。我現在給你正式的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務必拿到簽字的一份請願書。我們如果拿到了這請願書，就可以開軍事法庭來審問他們，把叛國罪加到他們的身上。換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沒收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財產不下一萬萬元，對守日本軍

隊有很大的幫助。這三件事情我完全託付給你，監視他們的行蹤，監視他們的住宅，監視去訪問他們的每一個外國人。我想他們去勸蔣利用外國人傳遞請願書。」

「這不成問題，我們可能把他們弄碎。不過，我手下的夥計已連續三天要工作二十四小時，抽調不出人員來做這事。」

他答道：「我也想到這一層，我已經決定，我們不妨利用老陰的弟兄來監視這些有錢的中國人。憲兵隊發給每人一張卡片，委任他們做臨時的特別偵探，反正是一樣的，他們仍受老陰的指揮，老陰仍聽你的吩咐。」

「你以為爲我們可能信託他們嗎？他們是強盜，一旦給予權力，不免會乘機橫行不法。此外，他們衣服破舊，也不很適配。」

「我已經佈置好了。發給老陰五百套『滿洲國』軍隊的制服，便解決了這一個問題。至于那些強盜會不會幹別的勾當，對我全無關係。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凡未經我們同意的人，一律不准接近調查團的任何團員。」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佈置妥善。三天以後，凡有錢的中國人，每家派了四五個穿了軍服的特別偵探，稱爲特別榮譽衛隊。其餘特別偵探，則在附近巡邏，尾隨那些訪問富戶的客人。

老蔭的弟兄們並沒有濫施權力。他們忠于職守，表現出良好的紀律。他們不僅嚴格約束自己，沒有任何可以非難的行動，許多人在李頓調查團離開「滿洲」以後，不願重操舊業，而欲永久替警務機關工作。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下午四時，國際聯盟派遣的李頓調查團，終于抵達哈爾濱。那一天中午的時候，火車站和各街道密佈着「滿洲國」的中國警察和俄國警察。在平時，哈爾濱街道上熙來攘往的，全是日本警察和日本兵，那一天是完全不見了。因爲參謀部已經下過命令，街道上不許發現日本制服，使李頓調查團相信，「滿洲國」的創立，確是出于民衆自發的意志，並非出于日本人的扶植。

于是日本憲兵和陸軍士兵，都改換了「滿洲國」軍隊的制服。

依照日本軍事當局命令，各省市當局和「滿洲國」軍事當局，均須隨同歡迎委員會，赴火車站歡迎調查團。

火車到了，李頓勳爵首先下車。其他團員魚貫而下，經過歡迎的儀式後，向出口的正門走去，突然有一個穿了「滿洲國」警察制服，並屬於日本憲兵隊的朝鮮人，走上前去，想向調查團的團員呈遞請願書。剛走了三步，他就給也是穿了「滿洲國」警察制服的日本兵抓住，拉到隊伍的後面去。

我的上司吩咐要親自審問那位可憐的熱血的朝鮮人。

他叫金貴（譯音），充任日本憲兵隊的偵探，已經七年，但他憎恨日本人的心理，隨着服務的時期而增長。他相信國際聯盟調查團的權力非常偉大，可能使飽受壓迫苦痛的祖國——朝鮮，重復獨立。他在請願書中表示，日本人統治「滿洲」還不過數月，日本人統治朝鮮却有許多年頭，國際聯盟為什麼這樣關切「滿洲」的自由，而漠視朝鮮的解放呢？

刑。
 晚上九點鐘左右，調查團諸公正在「饒等交錯」的時候，金貴却受着最殘酷的毒

我的上司覺得金貴一定還有同黨，所以要親自審問。

金貴真不愧為英雄。他始終不承認有同黨，上司先讓他自由招供。他老老實實說，他以為這是幫助祖國的一個機會，信是他自己寫的，想遞給調查團的團員，別人毫無關係。特務機關長因惱受無財符，並刻拋棄偽善的面具，變成野獸，吩咐嚴刑拷打。他們剝去金貴手上和腳上的指甲，把他的臂膀向外硬折，用火酒燈灼燒他的腳跟，最後我的上司用寫字的鋼筆擰出他的左眼珠。金貴却始終反復講着這幾句話：「我沒有同黨，信是我自己寫的，我要國際聯盟廢除刑罰的會審火。」

兩小時以後，他們把半死不活的奄奄的金貴，拖到幕地的附近，轟炸子彈打穿腦袋，了結他的「一生」。

每六個團員有四個偵探員保護。他們輪流監視團員的一切行動，記錄團員的「

切行動，譬如說，團員和誰談話，誰和團員談話，或誰欲訪問團員。

關於這種異乎尋常的表現，日本方面曾向調查團解釋理由：因為共產黨和爭取「滿洲」獨立的中國「志士」不僅要襲擊調查團的團員，並且要暗殺調查團的中國代表，所以不得不採取預防的步驟。

這理由毫無事實上的根據，對調查團一點也沒有什麼影響。調查團能夠到「滿洲」來自覩真相，共產黨歡迎不暇，何必反對？「滿洲」根本沒有主張脫離中國而獨立的中國人，所謂中國「志士」是完全不存在的。日本方面監視並偵察調查團的行動，只有一種目標，就是使調查團和外界隔絕。如果說爲了預防暗殺，那末，只有預防日本方面的暗殺。

一切準備都是徒勞無功，枉費心血。做監察偵察工作的許多中國人，俄國人和朝鮮人都反對「滿洲國」的計劃，竭力幫助調查團搜集材料，尋求事實。他們佈置秘密會議，和談話，設法傳遞書面的文件。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滿洲人民之輿情」一章內，曾有如下的陳述：

「本團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確實明瞭「滿洲」人民對於「新國家」的態度。不過，獲取這種證據，就相當困難。日本方面表示，因為調查團有受到土匪、朝鮮人和共產黨襲擊的危險，更因為調查團有一個中國代表參加，他的不利的批評也許會激怒了擁護「新國家」的份子，所以他們不得不採取特殊的步驟，來保護我們。當然，在混亂不定的環境中，危險自所難免。但這種特殊的保護方法，其作用顯然在於排斥人證。許多中國人不敢和我們的辦事人員見面。據我們知道，凡未得官方允許，任何人不准訪問調查團。因此舉行談話，往往十分困難，且須十分秘密。許多人告訴我們，就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之下舉行談話，危險性還是很大的。」

「環境雖然困難，我們除與「滿洲國」官吏、日本領事和軍事長官舉行公開談話外，仍能設法與若干商人、銀行家、教師、醫生、警察等舉行秘密談話。此外，我們還收到一千五百件以上的意見書，有的面交，有的郵寄。」

「我們曾接見許多團體機關的代表團，他們也往往留下一份說帖。這些代表團大多數是日本官方或「滿洲國」官方介紹的，所以我們很有理由相信，他們的說帖于事前已經獲得日方的許可。事實上，呈遞說帖的代表，于事後往往向我們表示，說帖都是日本人寫的，並不能表現他們的真正的感想。說帖的內容，有一個特點，就是：對於日本人參加建立「滿洲國」一點，既不表示正面的意見，也不表示反面的意見，僅陳述過去中國政府的腐敗黑暗，對於「新國家」的前途，則懷着無限的希望和信心。

「小商人，農民，工人和學生的意見書，報告着自己的感想和經歷。本團在六月間回到北平後，把這些意見書交給一個專家，加以翻譯，分析和歸納。結果，一千五百件以上的意見書，除了兩件以外，都疾首痛恨「滿洲國政府」和日本人。這似乎是民意之真誠的和自發的表現。

「在「滿洲國政府」做事的高級官吏，也有各種的原因。許多是張作霖時代的人物，他們或被利誘，或被威脅。有幾個官吏在適當的機會，曾經坦白誠懇告訴本團，他們的

做官是出于強迫的，一切權力都握在日本人手中，他們始終是忠于祖國的，他們在日本人面前向本團發表的談話，並非出于本意，不能夠信以為真。

銀行家和大商人也敵視「滿洲國」。他們討厭日本人。他們為自己的生命財產擔憂，時常這樣表示：「我們不願做亡國奴，像朝鮮人一樣。」職業階級如教師醫生等，也反對「滿洲國」。他們被監視着，威脅着。干預教育，關閉大學和一份中小學，以及修改教科書等，更增加了他們的敵意。大家憤恨對于出版物和郵件的檢查，言論的箝制，和關內報紙的禁止輸入「滿洲國」。學生和青年人對于「滿洲國」抨擊得尤為利害。

「在名義上，「滿洲國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級首領，全是中國人。日本人則居于「顧問」的地位。可是，這些「顧問」不僅可熊提供具體的建議，並且實際上也可能控制和指揮各級政府。

「我們把公開談話，秘密談話，信件和意見書中的一切證據，加以密慎的究竟後，獲得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中國人並不擁護「滿洲國政府」，認為它不過是日本人的工具。

而已。

李頓調查團在哈爾濱逗留了十四天，沒有知道五個中國人和兩個俄國人因為想遞送抗議的信件而給日本人逮捕槍殺。

李頓調查團也沒有知道，因為在摩登飯店附近行走而給日本人逮捕的有一百五十個中國人五十個俄國人。

家長受着拘禁的威脅，不得不吩咐他們的孩子，出去參加遊行搖旗吶喊。

「滿洲國政府」的每一個公務人員，每一個店員，每一個工人，每一個激發起來的中國人，或俄國人，都被迫購買「滿洲國」國旗，參加遊行，大聲疾呼：「滿洲國」萬歲！

第十章

贊美、獎勵、懲罰

李頓調查團動身的第二天，上司召見我。這一次，他似乎興緻很高，精神愉快，握手時坐以後，開始向我說道：

「我們現在終于可以喘息了！調查團團員，那些老而不死的傻瓜，已經動身了。他們向國際聯盟報告些什麼呢？聽他們的使，他們愛報告什麼，就報告什麼，反正我們日本人，不把這一件事情放在心上。國際聯盟承認「滿洲國」，固所歡迎，否則我們也可以不承認國際聯盟。半斤八兩，以牙還牙，我們已經用武力征服「滿洲」，國際聯盟儘管勞叨，我們不會把「滿洲」放棄。各國對於「滿洲」問題，幹麼要這樣大驚小怪，不怕麻煩呢？他

們全是笨伯？我們佔領中國，佔領西伯利亞，佔領菲律賓，佔領印度支那，他們又將如何呢？他們嚇得，日本還有驚人的舉動，很有意思的驚人的舉動，使俄國，美國，法國，荷蘭和我們的老相好——英國都感到驚奇。國際聯盟的三套將越來越多，我們佔領這三國，它要派調查團我們佔領那一國，它又要派調查團，一定會應接不暇。

停止片刻，微露笑容，顯然對於自己的口才感到滿意，態度相當持重，然後繼續說道：

「在李頓調查團逗留哈爾濱的期間，你的工作甚為滿意，一切都照我預定的計劃進行，所以我感激你，同時也應該祝賀你。有時我對你誇誇的，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不必理睬，我的性格是神經質的，要是有什麼事情出了岔兒，我會向第三個見過的人，大發脾氣。幾天以前，我說話太魯莽，希望你不要懷恨在心，我確乎神經過敏，應該向你道歉。

「我正在準備關於李頓調查團的報告，不久就要送到東京去。我在報告中將特別提出你的優越成績和審慎謹嚴。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可以完全信任你。無論如何，我並不有所懷疑。你是意大利人，對於偉大而高貴的日本民族，當然要覺得同情和仰慕。

「你和中日民族到底有什麼共同之點呢？一句話，中國人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他們是一錢不值的，除了做我們的奴隸外，他們是永遠一錢不值的。我勸你還是改入『滿洲國』籍，這樣你對中國可以完全斷絕關係。你的意見怎樣？」

我回答道：「讓我考慮一下。你知道，一個人改換國籍，不像電影院變更節目那樣容易。他在決定這一種步驟以前，必須再三認真考慮。將來日本當局如能完全信任我，不把我看做一個抵押品，我和家庭商量以後，也許可以接受你的勸告。」

「好！隨便什麼時候，你打定了主義，就來告訴我，我無不樂于替你保舉，我現在要使你

你知道，我是怎樣信任你。現在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請你去辦。『滿洲』的『匪賊』一共架去了五百多個日本兵，其中三十個左右是軍官。他們分為兩三個集團，最大的集團是在哈爾濱——樸格倫尼區納耶（Pogranichnaya）線上。那些『土匪』首領向我們建議，交換俘虜，兩個『土匪』交換一個日本兵。他們還索取幾十萬塊錢。我們願意交換俘虜，但不願意出錢。關於怎樣交換，何處交換的問題，我們也覺得有許多困難。這交

涉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但毫無結果，我想你一定能夠勝任這一件工作。那些「土匪」首領幾乎全是以前中國軍隊的長官，你也許認識他們。這樣你就更加容易獲得較好的條件。我特別向你提出一點：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如果「土匪」方面，中國人方面，或俄國人方面宣佈交換俘虜的消息，我們可以發表有力的聲明加以否認，不致有人相信確有其事。可是，如果你漏出這消息，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你必須保守絕對的祕密。

「兩三天以內，「土匪」的代表到哈爾濱，你隨他同去，和他們的首領進行交涉。同時，我要你確實查明是否真有那末許多日本俘虜。」

我向他聲明：「那些「土匪」首領既然是退伍軍官，他們一定知道我是中國人，替張作霖將軍服務了許多年。他們見了我的面，不會把我當做漢奸槍斃嗎？」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我們派遣代表，已非一次，他們常帶尊敬我們的代表。」

中國的強盜最重信約，顯然非日本的軍官所能企及。我向上司提起往事：日本兵越境竊取許多頭牛羊，兩個蘇聯的代表獲得海拉爾日軍長官的允許，走入「滿洲國」境

內辦理交涉，結果，日本方面却把那兩個代表毒刑處死。

他插嘴說道：『蘇聯人民全是討厭的傢伙。他們都應該消滅。我們現在再談另外一件事。不久以前，我因為聽說張鳳亭和莫文瀚兩個財主，要向李頓調查團有所接洽，命令你監視他們的行動。結果究竟如何？』

我回答道：『毫無結果。據我個人的意思，這兩個富翁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都是反對『滿洲國』的。但他們爲了要保全自己的財產，不會公然表示反對的態度。如果你們決定要侵佔他們的財產，你們實行沒收就好了，何必如此麻煩。』

他似乎很歡喜我這種坦白直爽的態度，邊笑邊說道：

『你的話很有理。可是，這兩個中國人在國內國外有許多朋友。倘我們不經過法律手續，沒收他們的財產，這舉動似乎太不光榮。可是，我們如果能夠證明他們確有陰謀反叛『滿洲國』，與切就可以依法進行。無論如何，我們還要從長討論。』

『現在你可以回去了，』土匪的代表到達時，我立刻通知你。』

第二天回家時，第一號助手已在門口等候。

關上了門，他對我說，第四號助手已經失蹤，找尋兩天，仍無下落。我走到第四號助手住的旅館去查問，據說他在三天以前攜帶所有的行囊，離開旅館。用長途電話向大連山海關各處探詢，也沒有結果。

第三天，我到摩登飯店去，會客室裏的侍者，交給我一封信，原來是第四號助手寫的：「樊思伯先生，爲了十分嚴重的原因，我不得不離開滿洲。日本畜生強迫我幫助他們作許多壞事，要把我一腳踢開。但你待我不差，我應該使你諒解我的行動，明白我所以要不告而別的真正原因。」

「上月間，兩個憲兵隊的班長告訴我，他們要綁架富天甸（譯音——從哈爾濱去只消步行五分鐘）的交通銀行行長。因爲他戒備嚴密，所以我們決定用武力逮捕。憲兵隊的一個俄國偵探奈浦（Krippe）兩個日本憲兵和我自己，把他捉到憲兵站附近的空宅內。」

「兩個班長吩咐先把肉票倒掛起來，然後又吩咐去逮捕他的女人。他們要她交出現款三十萬元，否則就把她的丈夫繼續倒掛。兩小時後，她帶來現款拾八萬元，交給兩個班長，其餘十二萬元，一時無法籌措，答允在十五天以內設法交齊，但要求先釋放她的丈夫。」

「行長恢復了自由。兩個班長給奈浦和我每人一萬元，關於這一件事情。他們教我們罰誓不宣揚出去。」

「今晨，日本領事館的警長和我見面，向我表示，他已經聽到綁架交通銀行行長的事情，要我給他八千塊錢，否則將實行逮捕。」

「我懂得日本人的詭計，我就是交出了錢，他們還是要陷害我的。因此，「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決定到別處去開闢新天地。」

看完以後，我去拜訪上司，把信遞給他。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並沒有發脾氣，反而放聲大笑。他說道：

「這叫做眼快，手快，腳快！兩個鐘頭到手十八萬塊錢，那兩個班長真是好傢伙！他們值身誇獎，可是錢的數目實在太大了。我所奇怪的，他們的舉動，一方面好像是大騙子，一方面又好像是大傻瓜。給兩個俄國畜生兩萬塊錢，這是不可以設想的。如果日本的窮軍官（他們身上常常不滿五塊錢）知道了這一件事情，他們將發動革命。」

他命令憲兵隊立刻拘禁奈浦，不得接見任何外人，聽候上司的發落。

兩個班長知道已經走漏風聲，不得不把十六萬元現款，如數交給上司，上司拿出兩萬塊錢作為獎賞。奈浦則被拘禁四十三天，在這期間，他不斷受着毒打，最後他供出了存款（還有九千六百元）的地方，才恢復自由，重回憲兵隊工作，若無其事。

交換俘虜馬到成功

兩天以後，我去拜訪上司，等了三十分鐘，走進一個日本人和一個中國人，都是陌生的。日本人和上司交談了幾句話後就退出。那中國人高大強壯，孔武有力，約四十歲左右。

上司向我介紹道：

「他代表橫行北滿的一羣土匪。他說，他們有三十次日本俘虜，兩個是軍官，三十四個是士兵，他們情願和我們交換俘虜。他準備留居哈爾濱，把他們的性命來擔保你個人的安全。明天你隨他的朋友同赴海倫，他教你下車，你就下車，他要你到什麼地方，你就跟他走到什麼地方。到了他們的山寨，你應該立刻查明事實，倘真有俘虜，就把他們的姓名和番號記錄下來，並接洽交換的條件和方法。」

第二天上午七時，我和那一個中國人同車赴海倫。路上，我向同伴提出許多問題，他一言不發，只點頭或搖頭示意。到了李家威埠（譯音）他請我下車，出站以後，我們經過小鎮，向一家住宅走去，門前拴着兩匹蒙古馬，不打招呼，我們就騎上馬背。走了六個鐘頭，下午三時，我們經過另一小鎮，一羣中國人和我的同伴低聲交談後，告訴我必須繫住雙目，這樣，我們又走了二十分鐘。當我解去布帶的時候，我們已經在一個洞穴中。五個中國人在那裏守候我們，其中一人，西裝皮綁腿，向我表示歡迎，俄國話講得相當準確。

討論很爽快。他們希望日本方面恢復二十七個弟兄的自由。他們則釋放兩個日本軍官和三十個日本兵。雙方決定辦法。他們先釋放十個軍官和十七個日本兵。日本方面則於第二天送回他們的十七個弟兄。他們防日本人條約要我做抵押品。顯然以為我是什麼一大亨。

晚上七點鐘，十八個日本兵果然紮住了眼睛，騎着蒙古馬，由他們派人護送，日本軍官帶去了我給上司的一封信。信裏我說明交換的條件。

兩天以後的黃昏，十七個弟兄回來了，他們便把第二批十八個日本人送往哈爾濱。我仍做「人質」。與其說是「人質」，毋寧說是一「佳賓」。他們待我非常客氣，而有禮貌。我吃的喝的，全是他們所有的最好的東西。

又過了兩天，其餘十個弟兄也回來了。我圓滿地完成了我的使命和去的時候一樣。他們把我護送到興隆鎮站（離李家威埠四十公里），乘車返哈爾濱。

上司見了我的面，笑容煥發，贊揚備至。

「今天我要向東京報告，指出你完成任務的優越工作。我特別要提起的，是你情願以自己的生命做擔保，使日本俘虜能夠迅速恢復自由。」

「現在你的第二步工作，是去向義勇軍接洽釋放幾百個日本俘虜。他們比較『土匪』是更難應付了。我們進行交涉，已有三月，毫無結果。這些義勇軍給我們許多麻煩，他們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武器也不好，他們却繼續戰鬥，炸毀火車，破壞路軌，並不斷造成各種暴行。日本的理想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其它「軟骨蟲」還認為團結統一的中國比較被革命所分裂並為日本武力所控制的中國對於日本實在更有益處，這是多麼奇怪的想法呵！」

「我敢說，中國要是團結統一起來，十年以後，就會不買一塊錢的日本貨。中國將可能製造一切——玩具，槍，子彈。十年以後，凡日本目前售給中國的東西，中國樣樣都會製造。不僅如此，中國將向我們出售生產品，中國將利用比我們更低廉的勞力來和我們競爭。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都不能夠跟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競爭，因為中國人比日本人更

能耐勞吃苦。

「我是日本軍人，似乎不應該向歐洲人這樣侃侃而談。但我所以向你直言無隱，實在因為我相信你這同情我們日本人的，因為我開始把你看做我們自己人。」

停止片刻，他繼續說道：「爲對付中國人的競爭起見，我們在中國設立許多工廠，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甯願使日本國內的人民失業。如果我們再給中國十年功夫，進行統一建設的工作，就等於宣佈我們自己的死刑。以目前的情形而言，中國雖然還沒有真正團結起來，他們却已經設立着兵工廠、飛機場和軍事學校等。再過十年，我們就不能夠和中國相敵了。以爲中國人勇於內戰，怯於對外的舊思想，已經不攻而自破。過去嫩江的戰役，松柏鎮的戰役，齊齊哈爾的戰役，以及其它許多戰役，你是已經知道了。那些土匪賊心，如今還像老虎一樣猛鬥，他們抗戰到底，寧願全部犧牲，不願屈服投降。到處有他們的蹤跡，却又什麼地方都不能夠發現他們。我們以爲他們是給殲滅了，可是我們的火車到處被炸毀，我們的軍隊每天被襲擊，並且還有幾百個日本兵做俘虜。要是我們再等十年，

我們不僅在中國本部沒有安全，在滿洲，在朝鮮，甚至在日本也無安全可言。我們還不能再等十年嗎？還能讓四萬五千萬中國人武裝起來，組織起來，把我們一脚踢倒嗎？斷然不能。如果日本不決定實行軍事獨裁，槍殺那些理想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以及危險而癡呆的搗亂份子，我們的國家就完了。我們現在必須徹底肅清中國。多延誤一年，工作的困難越多，要是延誤太久，將完全沒有希望。

我們必須控制中國的資源，才可能執行橫濱海陸軍的偉大計劃，才可能以我們的意旨來鎮懾全世界。

「我們控制了中國以後，就隨時可以征服西伯利亞，印度支那，菲律賓，印度，紐西蘭，澳大利亞。沒有中國，日本只好退守孤島，以魚為生。從東京到北平，中國是我們的工廠。」

「我恐怕講得太多，使你討厭，但有時談話也可解悶。要是你沒有別的約會，我想請你吃飯。」

「我隨後上樓，走入「神祕之人」的寓室。餐事全是歐式的，他表現出完善的紳士姿

熊，侍候我們的是兩個日本姑娘。

我想趁着這一個難得的機會，來滿足我對於這一個——神祕之人——的好奇心，他有時像高貴的紳士，有時却像下等的流氓；他在許多方面很有教養，對許多事情却又無知無識；他有時堅決相信日本勝利的前途，有時却又表示疑懼。他是我一生所遇着的最矛盾的人物之一。

當我們喝第二瓶法國酒的時候，我開口說道：

「我覺得你在國外一定旅行很久。」

「什麼緣故？」

「因為你的英語十分完善，不過略帶美國音。倘非遊歷甚廣，不與英美人相處很久，就不能夠講這樣好的英語。」

他看我一眼，然後呈現嚴肅的表情：

「你也許是對的。但恕我不能奉答。日本特務機關人員，不管他的身份怎樣，不能隨

便說出自己的姓名，地位，經歷或任何事項。我們沒有姓名，沒有光榮，沒有社會的生活，我們只是號碼而已。」

「請你原諒我的疏忽之處。我們還是談談工作罷。」

「一點也不錯。兩三天以內，你就要去辦理交換俘虜的事情。你也許要和『匪賊』廝混許多天，所以我決定讓你休息若干時，除非發生特別重要的事情，我不再吩咐你做什麼工作。」

第十一章

訪問義勇軍的司令部

四天以後，我應召去見上司。

辦公室內另有來自長春的軍官一人。那軍官從頭到腳看我一遍，向上司陳述某種意見。

上司對我說道：「關於釋放日本俘虜的事情，參謀總長非常贊賞你的才幹。現在參謀總長不僅希望你和義勇軍談判交換俘虜的問題，並且希望你能夠搜集情報，以便我們圍攻剿滅他們的根據地。你的意見如何？」

我回答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過去兩個多月的談判，所以毫無結果，原因就是

在於義勇軍方面已經明白，日本派去的代表，與其說是爲了交涉釋放俘虜，不如說是爲了搜集軍事行動的情報。因此他們防範非常嚴密。我不希望弄巧成拙，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上司和那軍官商量了十分鐘。我從聽得懂的幾個日本字，知道上司和那軍官的意見不同，後者鞠躬而退。

上司向我說道：「我在那軍官面前向你提出的建議請你不要放在心上。明天，你動身赴穆陵，義勇軍的代表在那裏等候你。我知道你會盡力去幹，我完全信任你。我們清願把兩個「土匪」交換一個日本人，但不準備出錢。你不妨宣揚我們偉大的武力，偉大的空軍，使他們感覺到我們不久可能加以剷滅。如能說服他們投降，自然更好。總而言之，我給你全權辦理此事。」

二十八小時以後，我到了穆陵站，跳下車。一個裝束得像俄國農民的中國人走進身邊問我是不是樊思伯先生。我隨他走出車站，兩匹馬裝鞍待發，我們跨上馬背，走到城郊。

最後幾間房屋的面前，日軍哨兵一人阻止前進，我出示通行證，通行證上吩咐沿途文武官員，不得向我提出問題，或干涉我的行動。

走了幾個鐘頭，我們到達一小鎮，義勇軍的司令C君，已在等候我們了。

C君向我打招呼：「喂，『滿洲國』朋友！」

我一邊下馬，一邊回敬他：「喂，土匪！」

C君把我介紹給其餘的長官，有幾位是我的舊相識。

C君笑着說道：「原來你現在是外交官，我們却做了『土匪』。可是，我對你既無妒意，也沒有怨恨。爲表示心地坦白起見，我已經給你預備了一頓佳肴。」

說罷，他領我到一家中國人的住宅，已經佈置了豐盛的筵席，潔白的台毯，上等的酒，精緻的菜，陳設簡樸而齊整，並有無線電傳送機和收音機一套。

「樊思伯，你不必奇怪，這裏一切東西都是日本人的。無線電，傢具，鍋壺，餐具，食物和罐頭食物，都是日本人送給我們的禮物，我的弟兄們，大多數穿日本人的制服；我們用的

步槍，機關槍和手榴彈，也是日本人的。我們有兩尊山砲，却沒有砲彈，還有許多匹馬，自然也是日本人的，我們很需要一架飛機，我們雖然有兩尊日本人的高射砲，打下了五架飛機，可是損壞太甚，不堪再用。」

飯後，C君領我去參觀他的部隊。他的話一點也不錯，制服，軍帽，牀氈……一切東西都是日本人的，我宛如置身於日軍的營房中。

C君繼續說道：「日本人埋怨蘇聯政府，向我們接濟軍火，這是多末滑稽呵！供給我們軍火的，不是蘇聯政府，却是日本軍隊，而且，除非他們自動退出，或完全消滅，這樣的接濟將源源而來。他們掠奪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財產，摧毀了我們的田園，我們的家庭，他們却稱我們是「匪賊」！」

我向他問題：「俘虜究竟在什麼地方？」

「不遠，只相隔十五里，我的部隊大多數駐在那邊，這裏只有五百個弟兄。」

他們全住民房，和老百姓非常融洽。奇怪得很，他們都十分整潔，紀律嚴明。他們參加

義勇軍，是出於自動的，隨時可以脫離，不受任何強迫。可是，他們都繼續服役，每天有新同志前往投效補充部隊，擴大人數。

我看見幾個受傷的弟兄，紮了綑帶，因此問道：「誰照顧傷兵？」

「我們有四個醫生，一個是外科醫生。」

C君提及他們的姓名，原來都是「滿洲」巨室的子弟，我全相識。

他繼續說道：「在我們的部隊中，有六個大富翁的子弟，有三十個同志曾經在政府機關中服務，有商人、學生和精通外國語的編譯員。可是，我們民族國家的創子手，竟稱我們是「匪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為祖國的自由解放而奮鬥。我們沒有侵略的野心。我們所以要打擊日本軍隊，因為我們必須保衛自己的家鄉。這是我們的國家，每一個人有抵抗侵略保護生命財產的權利。你已經看見老百姓待我們是怎樣親切。爲了什麼緣故呢！因爲他們知道我們是中國軍隊，我們是爲了驅逐「滿洲」的日本強盜而作戰。我們要打擊日本人的「一切」——他們的火車、鐵路和財產，我們要同樣打擊漢奸。」

「日本人慣於掩蓋他們所受的損失，可是，我敢老實告訴你，義勇軍沒有一天不打擊日本人，而且我們沒有一次不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要繼續打擊日本人，直到有沒他們的蹤跡，離開鐵路線幾公里的地方，日本人就不敢去。這裏完全是我們的世界。」

「匪賊」日本的宣傳機關同盟社，至今還稱這些義勇軍是「匪賊」。如果這些愛國志士是「匪賊」，那無怪「滿洲」要成爲「匪賊」的世界了。一九三四年二月間，日本第七旅團長服部將軍報告他的部隊在十次戰役中，損失了五百二十人。如果把這個數字做估計真正損失的根據，我們可以斷定服部旅團必已將近完全殲滅。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當國際聯盟舉行第十五屆大會時，中國代表郭泰祺對於東北義勇軍即所謂「匪賊」的活動，陳述如下：

「飽經蹂躪的人民，現在正以堅決的行動來抗拒大規模的非法的武力壓迫，他們將繼續遊擊的鬥爭，直到獲得最後的勝利。今日「滿洲」的情形，和日軍最初佔領「滿洲」時的情形，並無多大差別，換一句話，日軍所控制的，仍然限于重要城市和鐵路線，想

以不斷的「征討」使人畏懼服。」

「滿洲」五大鐵路局局長曾經有一個聯合報告，宣稱：「在一九三五年，國際列車損壞七十三次，客車被襲擊一百三十一次，車站被燬的七十四處，路員死亡的三百四十人，受傷的六百五十人，被綁的四百五十一人。」這是說明「滿洲」真相的最好的證據。鐵路既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我們可以推想大多數的死傷者，必然是日本人。

一件痛快的事

天將薄暮，我和 C 君上馬啓程，同行的有長官數人和隊員十人。兩小時以後，我們抵達俘虜的所在地。

吃過晚飯，我們從 C 君的家裏走到附近一所孤立的房屋，地面上鋪着大石板，有長凳，桌子和無線電收音機，顯然是會場。長官約四十人，有的玩紙牌，有的打麻將，有的看書，有的談話。

我們走進去，大家起立，C君一一介紹，然後解釋我所負的使命，談判立刻開始，對於交換俘虜一點，大家沒有異議，可是許多人懷疑日本人的誠意，恐怕上了圈套。

我向他們鄭重表示，我負責接洽這一件事情，決不懷任何鬼胎。最後雙方同意先釋放五十個日本俘虜，交換一百個義勇軍俘虜，然後再釋放五十個，換照這個辦法繼續進行。

晚上，我住在C君的家裏，行軍牀很舒適，自然也是日本人的。我們談起過去，現在和未來，談起我們的秘密組織，談起那些以金錢援助義勇軍的人物，談起若干過于重視自己財產的愛國份子，我們談起橫道河子和一面坡的得意傑作。自然，我也不會忘記了上司的囑託，他教我誇耀日本皇軍的如何偉大，宣傳日本空軍的如何可怖，以及提出義勇軍在最近的將來就有被撲滅的危險等。我們都捧腹大笑。

C君很高興的告訴我，在橫道河子主持軍事審判的那一個劊子手「托爾克馬達第二」竟然是一個模範俘虜，是一個最卑陋最服從的懦夫。談到深夜兩點鐘，我們才盡

與而睡。

早晨七時起身，在橫道河子到臥車來看我的俄國人S君，領着五個俄國人來和我見面，他們都加入義勇軍了。C君請他們和其他中國長官一起早餐，表現着最真切最懇摯的夥伴精神。

吃過早飯，我要求去看俘虜。他們分居二十幢房屋內，四面圍着鐵絲網，鐵絲網外有哨兵守護。軍官佔據三宅，職位最高的就是「托爾克馬達第二」。C君、S君、四個中國長官和我自己，向「托爾克馬達第二」住的宅子走去。門前幾個日本兵正用火油聽洗着衣服，另外幾個日本兵正在研柴。

日本俘虜站起身來，向我們恭敬鞠躬。有的穿了制服，有的穿了便服，有的甚至穿了睡衣，「托爾克馬達第二」就是如此，假使說他穿了制服，像一隻獼猴，那末，他現在穿了睡衣，長了鬍鬚，就宛如但丁在「地獄」一書中所描寫的妖怪了。

他見了我的面，做出似笑非笑的怪相。他想走前幾步，S君却毫不客氣地把他往後

一推。我以為他要提出抗議，不料他竟鞠躬道歉。

他變得多末快呵！他曾經把幾百個中國人和俄國人的生命，玩于手掌之中，曾經隨心所欲地虐殺無辜的老百姓，如今却在「匪賊」的面前搖尾乞憐！其他軍官也都鞠躬屈膝。那些不可一世的武士，那些皇軍的忠勇長官，那些殺戮平民的劊子手，那些凌辱年青姑娘的屠夫，如今威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向「托爾克馬達第二」說道：「我奉日軍當局的命令來交涉釋放俘虜的事情，談判的經過很圓滿，第一批五十人今晚或可動身赴哈爾濱。」

他鞠躬到地，用着最感激的語氣說道：「謝謝，謝謝，你真是值得尊敬的偉大人物，我恢復了自由，決不會忘記你的恩德。我盼望閣下能夠設法使我第一批離開。」

「我當極力設法，不過，這事情完全要由君決定。」

大家都很討厭這傢伙，我自己也不能想像，在幾星期前盛氣凌人的暴君竟變成了如此卑鄙下賤的畜生。

在路上，我向C君表示：『最好能夠把他痛打一頓。』

『今晚就使你如願以償。』

『恐怕我回到哈爾濱時，他們會槍斃我罷！』

『那不要緊，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一切可以安排妥當。』

黃昏時，五十個傷病羸弱的日本俘虜，縛住了眼睛，騎馬向鐵嶺河站出發，由二十五個義勇隊員護送。因為要躲避日本的偵察機，全部人馬都須夜行。我備函一封，帶給上司，說明交換的辦法，叮囑他不要失約。

在俘虜動身，我們吃了晚餐以後，C君請我走進小客廳，只有我一個人，隔了十分鐘，C君操着手槍，推門而入，低聲說道：『你要做得逼真。』然後高聲呼喝：『滾出來！混蛋的！』

『滿洲國人，』趕快滾出來！』

我故意戰戰兢兢，走進大客廳，看見『托爾克馬達第二』已經跪在中央。C君交給我一條鞭子，槍口向我瞄準，嚴厲地說道：『你這個混蛋的！』滿洲國人，』再三要求先釋

放「托爾克馬達第二」原來他是你的朋友。現在我命令你重重地抽他二十鞭，否則我就槍斃你。」

我表示光明正大的態度，堅決拒絕他的命令。

「你不肯嗎？好，反正是一樣，我們先把你的朋友抽了二十鞭，再來槍斃你。」

C君吩咐一個隊員道：「你重重地抽他五十鞭。」隊員向我取鞭子，兇惡地面對着恐佈的「托爾克馬達第二」。

「托爾克馬達第二」伸着顫慄的手，向我懇求道：「樊思伯先生，請你幫幫我的忙，抽我二十鞭罷，這傢伙是要把我活活打死的。」

我顯出很不情願的神氣，輕輕抽了他兩鞭。

C君嚴厲地命令我：「打重打重！否則二十鞭不宣效，要抽五十鞭！」

於是，我用全勁抽了他十八鞭，他像墮入陷阱裏面的野獸那樣呼號。

事後，C君吩咐把「托爾克馬達第二」押回拘留所。我送他到街上，滿口表示「抱

款。

釋放俘虜共需十九天，因為每一批俘虜，要從不同的路徑，送到不同的車站。

我向 C 君告別，向勇敢的長官告別，回到哈爾濱。

上司熱烈歡迎我，宛如歡迎英雄一樣。他說，他已經向東京保舉我做他的助手。

「托爾克馬達第二」做俘虜，竟穿了睡衣，有損皇軍的尊嚴，解往日本，其他軍官也

都遣送回國。

第十二章

綁票成爲一時風尚

兩個憲兵班長勒索十八萬元現款的偉大成功，惹起了不斷的妒羨和競爭。綁票於是成爲一時的風尚，憲兵隊雇用的十個強盜，每天要「抓」幾個有錢的中國人或猶太人。各警務機關都豢養綁票的匪徒，各大城市中有錢的中國人或猶太人，都不得不出重價取贖。恐怕瀰漫着整個的「滿洲」。

上面我已經說過，「滿洲」的地域非常廣大，日本各警務機關，都個別活動，並不互相聯絡。而且，許多被綁的肉票，尤其是中國人和猶太人，都由家屬私自取贖，不去報告警務機關，因爲他們知道綁票匪和警務機關是狼狽爲奸的。如果有所呈訴，恐怕出了巨款，

還要發生其它更大的麻煩。

日本憲兵隊和特務機關雇用白俄和中國人，專事綁架勒索，我何以能夠完全明瞭其內幕呢？因爲上司要確實知道肉票所出的身價，是否與交呈的數額相等，所以他吩咐我特別注意綁案。當上司親自詢問肉票時，我往往做他的翻譯。

以下幾件綁票案是我親眼目視和親手經辦的，此外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綁票案，更不計其數：

富翁萬堯卿（譯音）出二十五萬元贖兒子的票，自己也被綁兩次，第一次出四十萬元，第二次出十萬元。

富翁張清和（譯音）被綁三次，第一次出二十萬元，第二次出二十萬元，第三次出十萬元。

某百貨公司主人莫維唐（譯音）被綁兩次，每次各出十萬元。

富商盧泰（譯音）共出十五萬元，恢復本人和兒子的自由。

許多擁有巨資的和曾經做過大官的中國人，全部財產給日本人沒收，不得不遁入寺院，度暮鼓晨鐘的生活。前哈爾濱警察局長王君，現在是哈爾濱新俄國公墓附近一個廟宇中的住持僧，裏面許多和尚，都遭遇同樣的命運。我每星期要奉命去拜訪他們一次，固然有幾個曾作惡多端，該受報應，可是，其中却也不乏值得尊敬和善良的人士。

慷慨而慈善的卡遜貝克博士（Dr. Kasem-Bek）素為哈爾濱社會所敬愛，給日本憲兵隊綁去兩次，每次都出重價取贖。

赫利遜博士（Dr. Hellieson）的情形也是如此。商人達拉遜古（T. Rasenko）先給憲兵隊綁去，出一萬五千元，又給市警務機關綁去，出五千元。鐵斯敏尼斯基（Tismitsky）出一萬五千元，愛斯金（Eskin）出一萬元，希勒爾（Sherel de Florence）出二萬五千元。

憲兵隊長命令綁架波蘭學校中的某小學生，三個匪徒却綁錯了人，抓着一個托養在天主教堂的孤兒。可是憲兵隊長拒絕無條件加以釋放。他說：『天主教堂是有錢

的，如果孩子沒有錢，讓天主教堂來贖好了！」結果，吉林的主教出了兩千元，才把孩子贖回。

柯夫曼 (Kotman) 在哈爾濱開設了一家大藥房，從各方面看來，他不失為一個有錢的商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晚上十點鐘，白俄匪徒綁他到日本憲兵隊的地下室，勒索三萬元。十二日晚上，白俄鷹犬又把柯夫曼移往市郊的某小宅。

有幾個白俄走狗說柯夫曼很殷實，出三萬元不成問題，另外有幾個人則認為他拿不出這許多錢，因為他雖具若干財產，並無現款。

上司問我的意見究竟如何。我老實告訴他，柯夫曼的家屬必定拿不出這許多錢，並且，因為社會上盛傳綁柯夫曼的，不是強盜，而是憲兵隊，我特別請他注意這一點。

可是，他却說道：「我對於任何謠言，並不感到興趣，柯夫曼如果拿不出這許多錢，猶太人協會可以籌劃湊集。」

第二天，憲兵隊已經答應減為半數，參加該案的白俄流氓雷左耶夫斯基 (Radz-

oyevsky) 却加以反對，堅持柯夫曼的家屬應該如數奉呈。他自告奮勇，要求讓我來負責進行這一件事情，我們必定能夠達到目的。」

憲兵隊果然給他全權去辦理這一件事情。他伴着吉利金古 (Kirichenko) 和兩個日本憲兵，趕往藏肉票的地方，柯夫曼是渾身綑縛，並且塞住了嘴巴。

十一時半，上司突然召見我，他說道：「柯夫曼已經死了。他似乎因為心臟衰弱，受不住他們的刑罰。我要你去調查一下，報告真相。我已經通知憲兵隊，你不會遇到什麼阻礙。」

我趕往憲兵隊司令部，偕憲兵一人於十分鐘內趕往出事地點，推門而入，我從搖曳的燭光中，看出圍桌而坐，喝着卑酒的共有五人，兩個是穿了便服的日本憲兵，其餘三人爲雷左耶夫斯基，吉利金古和卡勒斯古 (Kalusko)。

雷左耶夫斯基請我喝酒，我加以拒絕，並向他們表示道：「我是來調查真相的。」

他以嘲笑的神氣斜視着我，說道：「死了一隻豬獃，我認爲並不需要起草什麼報告。」

這一隻猶太豬，愛財如命，他既不欲和女人見面，也不肯寫信給女人，我威脅了他一下，這老傢伙就斷氣了，這也怪不了我們，哈爾濱全是這樣的豬獃。

尸體躺在牆角落，覆着骯髒的舊氈子。我把尸體的上半段揭開，俯身觀看，大吃一驚，柯夫曼的面孔，受了強烈的火刑，已經模糊不可辨識，人肉的腥羶氣味，令人作嘔。

我問道：『誰幹的？』

雷左耶夫斯基回答道：『是我幹的，所有醜惡的猶太人，都應該這樣死滅。』

不幸的柯夫曼飽受慘無人道的毒刑。他們先炙了他的四肢，然後又炙他的面部，因為他痛苦不堪，極力呼號，他們便緊緊悶住了他的嘴巴，於是氣絕而死。

我回去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報告上司。他却並不如何關心，只說了這樣一句話：『一無結果，太可惜了！』

但日本憲兵隊並不因此而滿足。他們一方面把柯夫曼的尸體截成四段，拋入墳坑，一方面仍和他的家屬接洽贖票。柯夫曼太太在丈夫被殘殺了的三個星期以後，還交付

現款一萬八千元，要求恢復丈夫的自由。

日本憲兵隊和各警務機關所僱用的鷹犬，到處非常活躍，競爭甚烈，因此稍有資產的中國人和俄國人，都不敢離開他們的住宅，真是黑暗的恐怖的時代。

對於蘇聯人民，日本方面採取另外一種手段。他們不用綁票的方法，而以共產黨和煽動家爲藉口，把蘇聯人民投入監獄，勒迫巨款，否則不予釋放。日本方面對於許多有錢的猶太人，也往往採取同樣的手段。

日本的外交家向全世界鄭重宣稱，他們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事實上，他們所開放的，只有一個門戶，就是監獄的門戶。

史諾 (Edgar Snow) 曾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星期六晚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爲「日本建立了一個新殖民地」

「充滿了生趣的哈爾濱，如今是像活地獄一樣可怕了。哈爾濱的居民，其中包括白俄和紅俄十萬人，徒手出門，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險，就在白天也是如此。路劫，擄掠，暗殺和

綁票，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外國領事們也不得不雇用衛隊。有一天，我和遊歷「滿洲」的波斯頓議員丁赫（Finkham）赴松花江，訪問胸襟寬大的，最受人歡迎的漢遜（George Hanson）總領事。我們看見室內一張小桌上，堆滿了步槍和手槍，四面佈置着衛隊，防備盜匪的襲擊。」

「我是住在哈爾濱的摩登飯店的。主人是約瑟夫卡斯布（Joseph Kaspe）他的兒子天才鋼琴家西敏卡斯布（Simeon Kaspe）給白俄匪徒綁去，勒索三十萬元，並以割斷手指相威脅。結果，他們削去了小卡斯布的耳朵，再把他殺害。因此，老卡斯布非常憂懼。匪徒還藏了許多肉票，雖市區只有幾哩。」

小卡斯布的綁票案

小卡斯布的被綁，是轟動全世界的事件之一，我和這綁票案有着密切的關係，幾乎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日俄戰爭後，老卡斯布從俄國逃亡到哈爾濱。最初，他開設小規模的鐘表修理店，營業發達，過了幾年，就擴展為珠寶銀器店。一九一八年，他已經是遠東珠寶商的牛耳，和摩登飯店的大股東了。

當日軍於一九三二年佔領哈爾濱時，他開設着一家大珠寶店，摩登飯店也歸他一人所有。同時，他還經營許多電影院。他的財產總額，各人估計不同，有的說幾十萬，有的說幾百萬。關於他如何積聚財產的方法，也有各種不同的謠言和意見。

老卡斯布有一個大弱點。他歡喜宣揚自己的事業，自己的財產和在法國留學的兩個兒子；一個在巴黎大學，一個在音樂院。他常常誇獎他的兒子如何聰明，成績如何冠於全校。自然，兩個兒子都已經成為法國公民了。

因為他知道日本人非常關心他的財產。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把摩登飯店和各影戲院的所有權，換上兒子的名字。過戶的手續辦妥以後，摩登飯店和各影戲院都改換三色的法國旗。日本人眼看賺錢的生意經，落到法國政府的管轄之下，心裏自然不

高興。

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間，我的上司就表示要綁架老卡斯布。但他承認並不容易，因為老卡斯布很少出門，出門時常帶武裝衛隊。他住在摩登飯店的庭房，門窗都用粗重的鋼條保護，宛如一座堡壘，內內外外密佈着白俄衛隊。

小卡斯布在巴黎音樂院中畢業後，回到哈爾濱，他真是一個優秀的青年和造詣高深的鋼琴家，老卡斯布甚至認為兒子的才藝要超越巴德婁斯基 (Paderewski)。他忙着替兒子安排表演獨奏，不惜耗費巨資。

小卡斯布因為自己是法國人，毫未顧慮有人敢綁他的票，他實在大錯而特錯。哈爾濱的憲兵隊早就注意他的行蹤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上司向我詢問，法國領事雷那 (Reynaud) 和老卡斯布的關係是否親切。我表示他們並無什麼友誼。

「我也以為如此。法國領事和這些猶太豬獯，雖然是有錢的猶太豬獯，究竟能有什

麼共同的地方呢？法國領事當然明白，小卡斯布所以入法國籍，無非爲了保全財產，不遭日本人沒收。無論如何，法國的三色旗，不能夠阻止我們的企圖。我已經命令憲兵隊綁架小卡斯布。據我接到的報告，晚上他時常和猶太籍姑娘出去遊玩，回家很遲。我決定教中國人去幹，以免外間疑心到日本人身。待佈置妥當，我就通知你，你再吩咐老陰挑選最適合的弟兄八人。」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上司命令我派遣老陰和五十個弟兄到陶來昭（或多耐站）去懲罰該處的民衆，因爲他們殺死了一個下級軍官和一個憲兵。他並未提起關於卡斯布的事情，我以為他已經放棄原來的企圖了。

八天以後，第一號助手向我報告，據聞小卡斯布已經被綁。

我去報告上司，他含着特殊的譏刺式的微笑，說道：「我也聽到這一件事情，但詳細的情形還不明白。你無須擔心，我已經吩咐別人進行調查，我知道你很忙，而且這一件事情，幾天以內，就要解決。」

晚上，我的夥計詳細報告綁架小卡斯布的經過如下：

日本憲兵隊發出綁架小卡斯布的命令，而由憲兵隊的秘書兼翻譯中村和警察局的稽查馬丁諾夫（Martinoth）負責執行。馬丁諾夫手下有十五個惡棍。他和雷左耶夫斯基密切合作。雷左耶夫斯基當時是《L'ESPION》報紙的主筆，並且是所謂法西斯俱樂部的領袖。日本人就從該俱樂部的會員中，挑選他們所需要的暴徒。法西斯俱樂部成爲綁票陰謀的活動中心。幾天以來，一個希臘籍的惡棍，就不斷向中村報告小卡斯布的行動。他差不多每夜要和幾個年青女友出去遊玩。女友的姓名住址以及汽車經過的路線，都調查清楚。

小卡斯布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半夜被綁的，那時，他恰在一個女友的門前停下汽車，匪徒把他送到哈爾濱附近的某處藏匿。

第二天，憲兵隊派人向老卡斯布接洽贖票，勒索三十萬元。他斷然拒絕，以後幾次談判也毫無結果，憲兵隊要錢，老卡斯布却不願給錢，他允許可以拿出幾千元，但堅持必須

先釋放他的兒子。他的態度異常堅決，憲兵隊雖以殺害小卡斯布相威脅，也不能變更他的主張。

一個月以後，即在九月二十八日，憲兵隊割去了小卡斯布的耳朵，送給老卡斯布，可是這可怕的消息仍不能變更他的主張。他還只肯拿出三萬五千元，而且必須先釋放他的兒子。

法國領事向日本當局送一份抗議書，日本當局說他們正極力偵查小卡斯布的下落。

副領事夏朋（Chambon）却知道抗議書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所以另行進行偵查，不久就獲得線索。但因為缺少證人，夏朋乃設法把最年青的綁匪柯米薩倫古（Kornissarenko）帶到領事館，他完全承認，並且親筆寫下口供，夏朋立刻釋放柯米薩倫古。第二天，他親自訪問警察局長，面交柯米薩倫古的口供，對於綁票案內所牽涉的人物，正式提起控訴。

警察局長報告憲兵隊，憲兵隊立刻脅迫柯米薩倫古離開哈爾濱，同時逮捕夏朋手下的偵查員。據我所知，一九三六年我離開「滿洲」時，久米斯太煦（Kirmistach）——偵查員之一，還受着拘禁。

第二天，日本人津貼的兩家俄文報紙（Harbinskoe Vremia 和 Nash Put）開始攻擊夏朋，罵他是醜惡的猶太人和共產黨，極盡侮辱的能事，這一種攻擊，繼續了幾個星期。法西斯俱樂部的一個會員，甚至向副領事要求決鬥。

可是，小卡斯布的綁票案，已經傳播全世界。英、美、法各國的報紙，都重視這新暴行。東京方面有時很關心國際間的輿論，命令結束此事，我的上司乃吩咐逮捕列入名單內的綁票匪。十月九日，馬丁諾夫和商達爾（Shandar）兩人被拘禁，其餘則謾稱逃匿無蹤，仍逍遙自在，馬丁諾夫和商達爾兩人堅決表示不知小卡斯布的下落。在這個時候，憲兵隊和老卡斯布仍進行談判。

小卡斯布寫過許多封信；但老卡斯布不管兒子如何呼籲，不管威脅怎樣可怕，還是

堅持原來的主張，一點也不動搖。他自以為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甚至向人誇口，綁票匪最後將無條件釋放他的兒子，並且還要向他道歉。

這一種誇張的自信，實在是小卡斯布的致命傷。當老卡斯布的話傳入上司的耳朵，上司安閑地說道：『老卡斯布就是出了一百萬塊錢，也不會看到他的活着的兒子。』

此外，日本人不能夠釋放小卡斯布，還有一種原因，小卡斯布被綁以後與中村和憲兵長官談話數次。他知道綁票匪不是俄國人，而是日本人。他們是決不能讓他恢復自由的了。

恐怕法國副領事雇用的新偵探和老卡斯布手下的許多密探，會發覺小卡斯布的蹤跡，日本人便把肉票遷移了幾個地方。

鐵路警察局的「高等顧問」大井，開始干預這一件事情。他是真正的君子，在「滿洲國」留下優良的政績，除了武藤大將外，他是日本高級官員中最值得稱道的一個。他身居很高的地位，握着幾千哩鐵路範圍內的全權，可是他毫不憑藉職位，濫用權力，他維

持嚴格的公平和正道，絕對禁止酷刑。他對待下屬，不分國籍，好像是嚴峻而卓越的父親。就是憎恨一切日本人的中國人，也不得不敬愛他。在他管轄的區域內，沒有綁票的事情。任何日本人如欲自由行動，就給遣送回國。他不僅心裏反對日本軍事當局的種種暴行，並且從口頭加以攻擊。他往往說：『他們要犯罪，只能夠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因此，其他警務機關人員，到了大井所管轄的區域內，必須自行約束。

上面已經說過，當法國副領事夏朋，向警察局長提出小卡斯布綁票案的名單後，日本憲兵隊就把柯米薩倫古從哈爾濱送往樸格倫尼納耶。該處接近鐵路，受鐵路警察局的管轄，大井聽到這消息後，立刻吩咐逮捕柯米薩倫古，押回哈爾濱。他在許多人證之前，又招出了以前同樣的口供。

這第二次口供，也經過本人簽字，並且是由大井親自交給我的上司的。

可是，憲兵隊仍未放棄脅迫老卡斯布贖票的希望。從三十萬元減為十五萬元，從十五萬元減為十萬元，從十萬元減為七萬五千元，更從七萬五千元減為五萬元。但老卡斯

布的態度，還是和以前一樣堅決，只肯出三萬五千元，而且必須先釋放他的兒子。

大井接到報告，綁票案中的兩個匪徒，貝斯魯古(Besrudko)和柴耶齊夫(Zay-selth)，時常出入哈爾濱舊站。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他們正欲乘車赴小凌站，當被大井手下的探員拘獲。原來小卡斯布就藏匿在小凌站附近，由吉利金古和卡勒斯古兩人看守，他們是去認班的。吉利金古和卡勒斯古等候貝斯魯古和柴耶齊夫，不見蹤影。疑心發生了什麼變故，覺得非常不安。吉利金古到車站去打了幾次電話，向中村詢問那兩個人為什麼還沒有抵達。中村並不說明他們已經逮捕，盼盼吉利金古不要心焦。

在這個時候，卡勒斯古和小卡斯布單獨進行談判。

『如果你的父親給我一萬元，我就把你釋放，不必再孝敬憲兵隊。』

『怎樣辦呢？』

『你寫一封信，把信交給我。』

手續立刻辦妥。當吉利金古回來的時候，他發見兩個人面上的奇怪表情，感覺到一定出了什麼花樣。卡勒斯古堅持當晚要回哈爾濱，吉利金古深為懷疑，他又打電話給中村，報告情形。中村吩咐他轉告卡勒斯古，五點鐘到貨棧附近去會見中村。

中村偕憲兵一人和柯米薩倫古前往該處，抓住了卡勒斯古，加以搜索，查出原信，證據確鑿，無可抵賴。中村拔出手槍，擊穿卡勒斯古的腦袋，並派人吩咐久利金古，立刻殺死小卡斯布，趕回哈爾濱，再逃往它處。

吉利金古執行命令以後，帶着憲兵隊發給的一張假護照向北逃亡。但十二月十八日，他終於在紀隆鎮（Girondé）站，被大井的手下所逮捕。

關於卡勒斯古，憲兵隊宣稱他因拒捕而給警察槍殺。

第二天，雷左耶夫斯基請我翻譯小卡斯布寫的那封法文信，信裏懇求老卡斯布給卡勒斯古一萬元，並懇求不要玩弄什麼手段，否則他的性命萬分危險。他覺得卡勒斯古一定能夠踐約，恢復他的自由。

直到十二月三日，憲兵部才宣佈小卡斯布已經遇害。尸體的上面覆着幾寸厚的泥土。我從來沒有看見這種可怕的景象。他一定受了不可想像的痛苦，不可想像的酷刑。九十五天的非人生活，已經把他磨折成一副骷髏了，二十四歲的美少年已經是無從辨識了。十一月間，北滿的氣候常在零度以下二三十度，他的面頰，他的鼻子和他的手指，已經凍裂，肉一塊一塊脫落。他的耳朵已經割去，整整九十五天，他沒有洗澡，沒有修面，沒有理髮，這是何等可怕的景象啊！

小卡斯布的母親，扶病從巴黎趕往哈爾濱，希望能夠營救她的兒子。她是於十二月三日到達上海的。十二月四日的早晨，當她在惠中飯店早餐的時候，她從字林西報上看到兒子已經遇害的惡訊。

遺骸運到哈爾濱，老卡斯布不聽親友的勸阻，堅持要把棺材抬入寓所。他吩咐揭開棺材蓋，欲和兒子見最後一面。慘怖的景象震撼了他的神經，他立刻失去清明的理智，發出瘋狂的呼號。

我被監視了

全哈爾濱居民的憤怒，達到了白熱點。不僅猶太人極端咒詛這一種殘酷的狂妄的暴行。就是俄國人，中國人和朝鮮人，甚至若干日本人，也同樣表示憎惡。大家公然指控日本軍事當局，應負全部責任，發動示威運動，在小卡斯布出殯的一天，二百五十個憲兵和一聯隊的步兵，從齊齊哈爾調到哈爾濱來增強防禦的力量。

哈爾濱從來沒有這種盛大的出殯。日本當局雖然禁止送喪的隊伍通過主要的街道，雖然沿路軍警戒備森嚴，哈爾濱的全體居民，仍隨棺執紼，喊着「打倒日本軍閥！」「打倒野蠻的畜生！」等口號。

高福門（Kaufman）醫生致殯詞，痛罵殺害小卡斯布的兇手和主使者。

第二天，日軍特務機關喚高福門醫生前往，加以種種侮辱，並向他威脅，將他驅逐出境。雷左耶夫斯基則在他的報紙上，發表長文一篇，謂熱血的俄國人殺死一個「第三國

際「代理人的兒子」——薩蘭的猶太人，實屬正義的舉動，高爾門竟侮辱那些俄國「志士」，所以要求逮捕，並加以懲罰。

日本軍事當局不允許將六個綁票匪移送法院，却把他們押在刑事警察的監獄裏，共達十五個月，未經訊問。

他們在監獄裏，受着特殊的待遇。一日三餐由附近菜館供給，家屬朋友每天可以接見。據說，晚上他們快復自由，在憲兵隊的指揮之下，出去綁架劫掠。

我相信這是事實。一九三四年六月間一個晚上，我和憲兵隊的原少佐，率領着四個白俄探員，四個日本憲兵和二十五個老陰的弟兄，在哈爾濱附近某鎮，進行搜查蘇聯人民的住宅。我們忽然看見一羣人走來。原少佐吩咐大家躲開，待他們走近時，我們加以包圍。一個日本人走到原少佐的面前，解釋原因，我看見兩個歐洲人，一男一女，都縛着雙手，此外，有五個俄國人，一個是商達爾，一個是吉利金古，其餘三個則不相識。

原少佐放他們過去，也不講什麼，所以那兩個俘虜究竟是誰，我無從知道。

法國領事，卡斯布家屬和各國報紙，不斷呼號抗議，要求把殺害小卡斯布的兇手，送交法院，受法律的制裁，東京爲敷衍國際的輿論起見，命令將兇手六人移歸「滿洲國」司法當局審理。

可是，起訴書却由刑事「顧問」江口主稿，江口是無惡不作的，他每年要納贖十萬元，以維持他的「肥缺」。他是俄國匪徒，中國匪徒，朝鮮匪徒和日本匪徒的祕密勾結者。他草成的起訴書，可以說是遺臭萬年的傑作。起訴書竟稱六個犯人爲「最誠實最優秀的公民，真正的俄國志士，他們大部份的生命爲反對共產主義而鬥爭。即使承認他們綁架小卡斯布，他們的動機並非爲了個人的利益，而完全是爲了要資助反共組織，以繼續進行高貴的反共鬥爭。這是本案的事實，他們既不能單純地被着做盜匪，所以本案不能引用懲治盜匪法。而且，他們也不能站在普通刑事犯的立場，來答覆控訴的罪狀，換一句話說，應該從政治犯的觀點來判斷本案。那些罪狀究竟是什麼呢？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殘害人身，割去小卡斯布的耳朵的，是卡勒斯古，如今卡勒斯古已經不在人世，無

從答辯這一個罪狀。講暗乘機殺死小卡斯布的，也就是卡勒斯古，刑不及死人。講索詐錢財罷？完全沒有這回事，老卡斯布沒有拿出一塊錢。（對於綁票案的本身，却一字不提。）所以，從上面幾點解釋看來，他們雖「的罪狀，只是「意圖索詐，」但也「情有可原，」因為這一種行動，並非爲了個人的利益，而具政治上的作用，因為這一種行動的對象是被認爲共產黨的猶太代理人，是不義之財的收受者，是社會的公敵；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小卡斯布不過是替老卡斯布贖罪，這是勇敢而熱血的俄國人「情有可原」的又一點。

哈爾濱的領事團大爲震駭，把起訴書稱爲空前的暴行。「滿洲」的人民憤怒萬狀，據大井表示，像這樣的文件，實在是日本的奇恥大辱。

六個被告終于移交高等法院。「滿洲」各級法院雖受日本「顧問」節制，但哈爾濱的中國法官，如果覺得正義與公理完全在自己一方面時，偶然也放膽量，和「顧問」一爭短長。

審問綁架兇殺小卡斯布案的中國法官，對於起訴書上的表面理由，不能認爲滿意。

他們要瞭解真正的事實，要查明若干特殊的線索。可是，這工作非常困難，因為到處都有日本的偵探。

就在那個時候，上司召見我，對我說道：『高等法院院長想探究六個被告過去的歷史，你知道嗎？他顯然懷疑起訴書的準確性。嘿！他自以為比我們還要聰明，等着瞧罷！』已經通告各警務機關，倘有任何法官向他們調查本案的情形，他們必須都照江口的起訴書回報。可是，我仍恐主審的法官會向其它方面搜集材料。我現在要你監視三個法官的住宅，逮捕到他們家裏去的任何可疑的人物。我不願再見夏朋事件的重演。』（自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方面就指法國副領事夏朋爲「不能接待之人」，不久法國政府把他調往天津。）

一句話，上司命令我把一切事實和真相隱瞞起來，不使中國法官知道。

第二天，我請朋友介紹一位法官，允許供給他所需要的任何材料。一星期以後，我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送交法官。那些文件證明：各被告和政治並無關係，各被告是最危險最

兇惡的罪犯馬丁諾夫在六個月以前，曾奉憲兵隊司令的命令，殺害阿古諾夫（Агунов）
 〇（二）殺害許多有錢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商達爾和吉利金古是妓院的老闆，是白俄婦女
 的販子；各被告都是受着日本憲兵隊餒養的劊子手；割耳朵的，不是卡勒斯古，而是商達
 爾，撕肉票的也不是卡勒斯古，而是吉利金古。

在審問的期間，法官時常和我秘密會面，對於若干要點徵求我的意見和解釋。

在鐵路區域內被捕的柯米薩倫古，柴耶齊夫，貝斯魯古和吉利金古，身上所帶的文
 件都給大井抄出沒收，現在我又把那些文件送交法官。那些文件證明四個被告是憲兵
 隊的爪牙，他們的「一切行動可以不受阻礙。如果沒有那些文件，他們是不能夠在鐵路線
 上自由來往的。」

案子繼續審問下去，日本人對於法院方面所搜集的那些證據，感到萬分的驚惶，不
 知所措。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我接到自稱爲法西斯黨領袖的雷左耶夫斯基的警信。

信：

「樊思伯先生：敝黨現認爲閣下的工作，偏袒猶太人，與敝黨的宗旨完全相反。閣下當知以閣下的地位來進行這種工作，其影響實在太大。茲特鄭重警告閣下，以後不得敵視敝黨的同志和愛國份子。」

我接到了警告信後，心裏疑惑不定，有人看見我在晚上去訪問法官嗎？法官透露了什麼消息嗎？他們對於這一件事情，究竟瞭解到何種程度呢？我不管這些，帶着信去報告上司，他微笑說道：

「你不要把那封信看得太嚴重。雷左耶夫斯基本來是傻瓜，也許你去調查夥計們是否監視法官住宅的時候，有人看見你，便以爲你向他們供給材料。」

上司對我既然並不懷疑，我便大胆表示：「我在法院中旁聽，因爲法官的消息非常靈通，所以我有幾次離開庭之後，走到法官的家裏，想去發現任何信函字條，做調查的線索。」

上司打電話，講了幾分鐘，然後又對我說道：『我已經打電話給憲兵隊的長官，教他吩咐雷左耶夫斯基，不要管人家的事情，我並且告訴他，你去訪問法官是有命令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深夜一時，我從某廟宇中走出，和希臘偵探福多普蘇（Fotopulo）迎面相遇。他是專門派在摩登飯店工作的。

我向他招呼道：『福多普蘇先生，在這個時候，你到這個地方來幹麼？』

『我和住在附近的幾個朋友談天，忘記了時間。可是，樊思伯先生，在這個時候，你幹麼還要混在一個廟宇裏？』

『你應該知道，這廟宇裏有許多重要的人物，我負着注意他們是否住在廟宇裏的責任。我往往在這個時候走來，因為這是潛逃的適當時候。』

『黑夜也往往是進行陰謀的適當時候。』

這一種『新奇』的答覆，使我大感不快。不學無術的起碼侍役，居然想來和我『鬥智』。我決定給他一點顏色：

「福多普祿先生，我很久就有意思要和你長談。明天上午十一點鐘，請你到我的家裏，不要客氣！」

「樊思伯先生，我準到。」

第二天，我們坐在花園裏的長凳上，我開始說道：「福多普祿先生，你瞭解我的程度怎樣，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有一點你却必須明白。十七年以前，當你到哈爾濱的時候，衣衫不整，身無分文。正當的上流的歐洲人，都不願和你接近，你不得不與中國人合作，這樣你賺了兩三萬塊錢。中國人幫你的忙，使你能夠立足，像兄弟一樣，如今你所以能夠與上等社會相處，完全是靠了中國人的力量。你怎樣酬報他們的恩德呢？事實勝于雄辯，自從日人佔領「滿洲」後，你處逢迎他們，一天到夜鞠躬。溥儀登位時，在歐洲人中只有你上書「稱臣」。你幾乎沒有一天不欺侮像兄弟一樣待你的中國人。然而，你並不滿足，還要陰謀損害那些向中國人繼續效忠的人士。這種行為使我的朋友大感不快，他要和你見面，給你一頓教訓。」

我招呼老陰，他走到我們的面前，經我介紹，向福多普祿深深鞠躬，然後以尖刻而平靜的語氣說道：

「福多普祿先生，我的知己朋友樊思伯君告訴我，近來你愛管人家的閒事。因此他在精神上很不舒適。你知道，樊思伯君是我的盟兄弟，我必須使他能夠平安睡眠。不久以前，有人向他滋擾，我便把那個傢伙請到我的家裏，待他非常客氣，他覺得坐立不安，在一星期以後，懇求一死。我不希望你也陷入同樣的苦境。福多普祿先生，生命是非常甜蜜可愛的！你瞧罷！春天來了，大地開遍新豔的花朵。我希望樊思伯君不會遭遇什麼變故；要是發生了任何事情，在一小時以內，你就成爲爲我的「佳賓」，一度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星期。」

老陰鞠躬而退。

福多普祿嚇得魂不附體，呆坐不動，注視地面，不斷自言自語着：「老陰？老陰？老陰？」

「樊思伯君，我敢向你罰誓，我從來沒有要損害你的意思。我不過是執行中村的命

令。中村是很反對你的，他說，他要設法把你逮捕起來，關於小卡斯布的綁票案，法庭上會兩次提出他的名字，他確定許多事實是你報告法院的。」

「誰說我向法院供給材料的？」

「我不知道，我沒有告訴他。請你向老陰說明，我對你毫無怨隙。可是，你要擔心，中村以爲你和義勇軍有什麼關係。」

福多普祿是給我屈服了，不過這成功是暫時的，數月以後，他獲得報復的機會，我幾乎送掉自己的性命。

六月，小卡斯布的綁票案判決。中國法官按照法律，以觸犯劫掠綁架和暗殺各項罪狀將四人判處死刑，兩人判處無期徒刑。

哈爾濱人心大快。可是，兩天以後，我的上司下令逮捕主審的法官，宣佈判決無效。六個月以後，三個日本法官撤消原案，藉口六個兇犯都屬愛國份子，一律無罪釋放。

第十三章

「滿洲」是苛重的負擔

在被榨取的「滿洲」綁票不過是一門副業。

最重要的是：『必須推銷日本貨！』

「滿洲國」的每一家商店，都強迫推銷日本貨，日本人經營的大公司，把大批的日本貨自動分送給各商店，領取收條，每星期派員出去檢點存貨一次。如果沒有銷數，或者銷數太少，日本憲兵隊就出面干涉，把商店關閉。

不僅中國人和俄國人的商店，一定要推銷日本貨，就是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的商店，也同樣要推銷日本貨，國籍是沒有分別的：『必須推銷日本貨！』

既然「必須推銷日本貨」，其它國家的商品，就非阻止推銷不可。這原來是日本的政策，蔑視一切自由競爭和機會均等的原則。

「滿洲國」海關的控制權，完全操在日本人手裏，他們極力阻止外國商品的輸入。凡擅自輸入的外國商品，必設法加以破壞。外國商品即使經過了種種的留難，從海關棧房中提出，大多數必已損毀不堪，無法出售。如果是酒，則擊碎其瓶；如果是正頭，則加以沾污；如果是機件，則使之失去效用；如果是罐頭食物，則戳上小孔；如果是箱裝的，則拔去塞子；如果是袋裝的，則加以割裂……

哈爾濱白俄經營的紫朱林百貨公司（Tschurin and company）規模很大，「滿洲」各處都設有分店，該公司向匯豐銀行抵押借款五百萬元，因債務關係，受匯豐銀行的管轄，都懸英國國旗。

日本人當然討厭這一種辦法，他們不能夠損害匯豐銀行。不過，像紫朱林百貨公司這樣一個有力的商業機構，非加以破壞不可。因此他們逮捕該公司的董事長卡興諾夫

(Kassianoff) 和三個重要股東，一為卡蒂耶夫 (Katiayef)，一為巴平索夫 (Babinoff)，一為薩門諾夫 (Sarnanoff) 他們的女人同遭逮捕。四對夫婦和「罪大惡極」的犯人禁閉在不起，受着不斷的拷打和毒刑，他們終于不得不接受日本人的條件，才恢復自由。

哈爾濱有兩種英文報紙。一種叫哈爾濱導報 (Harbin Herald) 由英國新聞記者辛浦生 (Lenox Simpson 筆名為 Putnam Weale) 主編，因為他批評日本人的暴烈手段，日本人迫令該報停刊，同時沒收機件鉛字生財，並驅逐辛浦生出境。他到了大連，進行補救的辦法，事件引起了英國上下兩院的重視。倫敦向東京提出抗議，毫無結果。日本方面拒絕賠償任何損失，至今辛浦生還在大連。

還有一種叫哈爾濱觀察報 (Harbin Observer) 主編人為弗利脫 (W. H. Frost) 他的態度非常審慎，報上從不刊載批評日本人的文章，却也無濟于事。日本軍事當局有許多次訓斥他，威脅他，侮辱他，甚至用種種方法排擠他。環境雖然如此惡劣，他仍

繼續掙扎下去，最後他因不堪壓迫，終于離開了「滿洲國」。如今他在上海主持快訊社（Fleet News Agency）

日本人雖然到處宣揚，他們對於國際聯盟的任何建議或決定，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可是，當國際聯盟發表調查團的報告書時，他們又不勝其憤怒。他們不能瞭解爲什麼整個的文明世界竟一致宣佈他們是侵略者。這怎麼可能呢？日本不是神明的國家，武士的國家和天皇的國家嗎？全世界怎敢糟蹋他們呢？

在日本人的這種思想傾向之下，國際聯盟的譴責，確乎是不可思議不可解說的。有一點特別使日本人覺得掃興，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把日本人所有「高貴」的品質，完全暴露出來。他們爲欺騙調查團而進行的一切佈置準備，慘淡經營，煞費苦心，結果却徒勞無功。

調查團團員從日本人巧妙的騙局中透視一切。他們不僅收到了一千五百件以上反對和詬責日本人的書函，並且還在幾千個日本警察密探的重重包圍之中，接見了各

方面的人士。日本人向來自以為比愚笨的英國人聰明萬倍，向來懷着極端輕視的心理，無怪他們要覺得調查團報告書是一種不可忍受的恥辱了。

李頓調查團不僅承認日本人是侵略者，並且還向全世界暴露日本人的原形——騙子。這使天照大御神的子孫感到莫大的懊惱憤怒。給全世界的劣等民族公然宣佈為侵略者和騙子，在日本人看來，實在足以惹起普遍的切腹。因此，他們醜詆調查團團員，醜詆李頓爵士，醜詆英國，醜詆猶太人，醜詆互助主義。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公佈的第二天，我去見上司，他從頭到腳看我一遍，然後問道：『你看過報告書沒有？』

我回答他：『已經看過。』

『你如果真的已經看過，你如果懂得報告書對於我們的影響，你就應該自殺。你去罷，我沒有什麼話了。』

我邊走邊想，覺得自殺是太嚴重的一件事情。人是不能夠天天自殺的，必須慎重選

擇適當的手段和機會。日本式的自殺是「切腹」，意大利式的自殺是「彈貫頭部」，中國式的自殺是「服毒」。我呢，生於意大利，入了中國籍，却替日本人工作，所以假使我要自殺的話，必須想出一個方法，既不傷害三個國家的感情，還須能夠博取它們的同意和贊美。我至今仍徬徨着，也許日本人看到了這本書以後，會解決我的困難罷。

我有兩天不和上司見面，靜靜地考慮着自殺的問題。第三天早上，他召我去。我走進辦公室，看見另外還有一個日本人，上司和我握手請坐，客氣了一番，然後說道：

「樊思伯君，我奉命回國，明天就要動身了。從現在起，這一位先生成爲你的上司，我已經把你的工作和長處告訴他，我希望你可能繼續服務，並且可能有更好的表現。」

我和新上司相互鞠躬，約五十歲左右，真正的蒙古型，濃鬚，相貌並不討厭，聲音很尖銳，能夠講俄國話，他對我說道：

「樊思伯君，我記得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的伊庫茨克地方，曾經和你見過面，那時你跟英國的史蒂芬少佐和威勃大尉在一起。」

事實是不錯的，但我加以否認。

『明晨十時，請你再來，現在我還要接見他人。』

老上司送我到花園的門口，鄭重宣稱非常感激我的工作，並且表示我的前途無量。他說道：『我已經向你的新上司竭力保舉，他一定會重用你的。希望你永遠不忘記我，我們握手而別。』

第二天，我去覓新上司，他向我說道：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動搖了許多長官的地位，你的老上司便是其中之一。我現在負責主持北滿的特務工作。我已經斥退了許多重要的特務員，留下很少幾個舊人，我希望你不辜負我的好意。』

『關於國際聯盟的判決書，在東京方面，許多人都責怪『滿洲』的日本軍事當局，不應該讓李頓調查團收受幾千份以上的控告書，和舉行幾百次以上的談話。我却不以爲然，即使李頓調查團沒有收受任何文件，沒有舉行任何談話，報告書的結論對於日本

必然同樣不利。因為組織推動和支持國際聯盟的，是互助主義和猶太主義，是法國和英國；所謂互助主義和猶太主義，所謂法國和英國，反正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所有國際聯盟的決議，都是猶太人和互助團員組織的。國際聯盟有國際聯盟的方針，我們有我們的方針。以下是我們的計劃：

「自今天起，『滿洲國』境內的猶太人，互助團團員以及同情他們的人物，將不能獲得片刻的安寧。我們要個別地，不斷地迫害他們，侮辱他們，困惱他們，誹謗他們。我們必須使他們的生活，感到極大的痛苦。我們必須使他們認識，日本不僅能夠反擊，而且能夠新擊。我已經吩咐着家俄國報章，自明天起，對於猶太人，對於互助團支部，對於青年會，開始無情的攻擊。每天必須綁架有錢的猶太人，強迫他們拿出巨款。互助團支部和青年會必須關門大吉。即使他們並不與共產主義相結合，也沒有甚麼差別。自現在起，是要進行鬥爭了，毫無妥協的餘地。有一個叫老陰的中國人，目前在什麼地方？」

「他率領着五百個弟兄，在和龍附近。」

「幹麼？」

「因為幾天以內，六百五十個日本移民就要到來，他奉命去肅清四個村莊，準備容納他們。」

「已經幾天了？」

「兩星期。」

「兩星期驅逐幾百個下賤的中國人也要兩星期嗎？兩天就足夠了。打電話去吩咐他帶了五十個弟兄，立刻回到哈爾濱，那方面的工作交託給可靠的助手……」

第二天，「哈爾濱時報」(Harbinskoe Vremis)和「我們的路」(Nash Put)兩報，果然開始攻擊猶太人，互助團支部和青年會，對於後者更極盡中傷的能事。青年會的主持者是美國人海格(Hugh)由於十五年來的辛苦經營，青年會已成第一流的學府。他最初創辦小學，由小學擴充為中學，由中學擴充為大學，包括工科、理科和文科。這些當然都屬於青年會活動的伸展。

海格夫婦到處受人歡迎，到處受人敬愛，在哈爾濱，在「滿洲」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可是最醜惡下流的侮辱，却像潮水般湧到老夫婦的身上。報紙上罵青年會的男學生吸毒犯罪，罵青年會的女學生大多數賣淫。

但一切誣蔑誹謗對於青年會會友，並不發生影響，於是日本人的御用報紙「我們的路」的御用編輯雷左耶夫斯基，不得不採取暴力手段，法西斯惡棍襲擊男學生，並公然凌辱女學生。

如是者兩年之久。那些暴徒都有日本憲兵隊撐腰，海格有什麼辦法去對付他們呢？他受威脅的青年學生，逐漸不敢入青年會學校去讀書。一九三五年，海格本人也被迫離開哈爾濱。如今青年會依然存在，却已經日本化了，會員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

俄爾濱互助團支部的團員，百分之八十是外僑，主要是英國人和美國人，以及若干丹麥人和五六个俄國人。兩種御用報紙進行猛烈的攻擊，尤其把支部的長老英國人尼維爾（Neville）和他的兒子，攻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這位七十多歲的長老，却獲得

哈爾濱人民的普遍尊敬。俄國團員受盡了各種侮辱，在嚴重威脅之下，被迫脫離支部。

對於青年會和互助團支部的攻擊，固已舉部醜觀，但日本人的醜行污名，在攻擊猶太人團體和教堂的行動上，達到了最高峯。

「滿洲」希伯萊人協會的會長高爾曼博士，是最有教養的學者，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同加愛戴。日本人的御用報紙每天攻擊他。接連兩個月，他在路上也常遭白俄走狗毆打。我的新上司特別派定兩個白俄走狗，每夜去粉碎兩個教堂的玻璃窗，使他們無法補換，只好在朔風凜冽冷氣受骨的交易之下，舉行禮拜。

老陰和五十個弟兄習居哈爾濱，主要的任務是綁架有錢的中國人，勒索巨款。其餘一大部份弟兄分為兩股：一股活動於哈爾濱以東的中東路沿線，專事襲擊火車，阻礙蘇聯的商品從海參崴輸出一股活動於吉林省依蘭以北，脅迫中國農民放棄肥沃的土地，讓給日本的移民。日本人藉口農民所有的單契都出於偽造，沒收了良田二十萬畝。凡清願放棄土地，不加反抗的農民，每畝可得酬報一元，倘表示拒絕，就給日本入豢養的強盜

用武力驅逐。

但強盜的任務並非常是一帆風順的。一九三四年三月間，他們奉命去驅逐大龍山（譯音）一帶的中國農民。不料農民和義勇軍聯合起來，予以猛烈的反擊，結果那一批強盜遺尸一百多具，狼狽逃竄。

日本軍事當局大為不快，命令依蘭駐軍的長官率步兵一中隊開往大龍山，聯合當地駐軍，撲滅叛徒。但守大龍山的是「滿洲國」軍隊，長官為李岳卿（譯音）。當日本軍隊開抵該處時，當地駐軍已全體反正，加入義勇軍，日本長官和士兵沒有一個生還。

那些所謂「移民」究竟是怎樣人？

據日本軍部說，在道德上和體格上，他們是經過了一番選擇的，他們並且正式經過了兩年的獨身生活。實則完全相反，他們都是遊手好閒，無惡不作的傢伙。他們是「移民」，是到「滿洲」去墾殖的，却不懂得怎樣耕種大豆，高粱，羊奶和其它土產。他們的收穫微乎其微。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不是還有中國農民和他們的豐盛的田禾嗎？日本「移民」

「便在憲兵和軍隊的保護之下，搶劫中國農民的穀倉。」

許多中國農民用血汗換來的一點收穫，給日本「移民」擄掠一空，但他們並不滿足，還要綁架年青的婦女。

若干日本「移民」也許恐怕觸傷了自己的皮膚，不敢去搶劫中國農民的穀倉，他們便強迫中國農民的合家大小，替他們操作，除了吃飽肚子以外，什麼酬報都沒有。全部的收穫和中國農民的妻女，都變成了日本地主的私產。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和憲兵隊的井上少佐，磯部大尉，率領士兵二十人，到大東溝附近去調查七個日本「移民」被殺害的事情，結果，並無實據，井上少佐乃向上司請求，加以轟炸。

我們從大東溝回來，走到布條棚（譯音）附近時，遇着四五十個中國人——男的，女的還有孩子，由八個日本憲兵和幾個「移民」監護着。井上少佐詢問原因，其中一個日本人從容答覆，據稱他們是個農，在兩天以前潛逃，憲兵四面搜索，終於把他們尋獲。那

些潛逃者是怪可憐的，許多人都遭毒打，面部和手上還看得出乾污的血漬。井上少佐一言不發，毫無驚駭的表示，當然更談不到同情了。是的，中國人算什麼呢？他們不是像禽獸一樣，應該聽憑武士的擺佈和剝削嗎？

雖然用盡了逮捕，私刑，暗殺，破壞，沒收，綁架，征討和屠戮各種手段，對於所有日本人——武人，文人，富人和窮人，「滿洲」却已證明給予他們以澈底的幻滅和失望。「滿洲」已經成爲一種海市蜃樓式的迷景，已經成爲一種苛重的負擔。一筆賺錢的生意，結果却已成爲虧本的生意。日本「移民」要佔領一個村鎮，往往殺戮中國人或驅逐中國人，殊不知繁榮的產生，是靠了中國人的辛苦經營，不是憑藉村鎮的本身，一個中國人如果是爲了自己而耕種，他的收穫比較在日本人強迫之下而耕種，必大不相同。本來從山東移往關外的農民，每年有幾萬，現在是完全沒有了，恰恰相反，日本人的虐待和壓迫，使關外的許多農民逃入關內。東三省的礦業也大受打擊。一句話，「滿洲」的中國老百姓，懷着同樣的心理：『日本人要什麼拿什麼，我們何必再空耗心血呢？』

但軍費的負擔異常重大，日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據他們最初的估計，在實行武力佔領的一年以後，兩師團正規軍和憲兵隊的力量，就足以維持「滿洲」的治安。他們以爲義勇軍和「土匪」幾個月內就可以澈底「掃蕩」的。他們並且猜想邊境的蘇聯紅軍，在完成示威的任務以後，就會撤退的。現在，這一切是證明錯誤了，事實的發展完全和他們的期望相反。在六年以後的今日，「滿洲」雖然還留着許多個師團的軍隊和成千成萬的警察，「滿洲」的美勇軍和「土匪」却一天一天的增加，並且不斷困擾每一個日本人。甚至日本人視爲生命線的南滿鐵道，如今也時常遭遇襲擊。

蘇聯在邊境一帶，駐屯精良的紅軍約三十萬，具着新式的裝備，這對於日本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使日本不得不在北滿留置二十五萬大軍，以準備萬一。我們從南大將在海拉爾向陸軍官佐的演說中，可以看出日本對於苛重的負擔所感到的苦痛和憤激：

「大家必須枕戈待旦，目前的情形不能長此延續。日本斷乎不能爲了蘇聯一個國家，常在北滿邊境駐屯大軍，每年消耗巨額的金錢。蘇聯必須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必須撤退邊境的軍隊，否則我們迫不得已，勢將用武力加以驅逐。」

撈錢！撈更多的錢！

我的新上司似乎和善易與。他從不疾言厲色，就是在責備某人時，也往往出以平靜和說服的語氣，但有一點他始終堅持絕不放鬆，那就是錢的問題。撈錢！撈更多的錢！不惜任何代價，不顧任何手段。他時常對我說：「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設法減輕我們巨額軍費的負擔。我們佔領『滿洲』並不是爲了消耗幾百萬幾千萬金錢。一切軍隊的費用，必須由『滿洲人』來負擔。」

撈錢！撈更多的錢！增加匪黨的數量，擴充專利的事業，逮捕更多的富人，綁架更多的富人，勒索更多的現款，榨取更多的現款！日本的皇軍要的是錢，各特務機關的老爺們要的是錢，大家要錢，每一個人忙着去撈錢！

真的，每一個人忙着去撈錢。綁票的事情層出不窮，『滿洲』幾個主要的都市，籠罩

在恐怖危懼的暗影之下。沒有人再相信日本人所製造的故事了。他們都知道真正的綁票匪就是日本當局。

對於這一切，大家本來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大家却公開地大聲地表示他們的抗議和控訴了。尤其在外僑方面，他們老老實實把一切罪惡的責任放到日本的身上。所有日本人的姓名和藏匿肉票的地方，都經公開指出，哈爾濱的領事團曾舉行許多次特別會議，討論綁票和專利等各種問題，有幾個領事提供關於日本人主持暴行的證據。

中國人某君被綁隔了一個月，他的女人到警察局去商量營救丈夫，她看見警察局裏的一個稽查，却就是到她家裏去接洽贖票的代表。

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幾個強盜闖入齊齊哈爾某富戶的住宅，綁綁事主夫婦和男女僕役，正在翻箱倒篋的時候，更夫從花園中門槍擊斃兩個強盜，餘匪抱頭鼠竄。原來那兩個強盜，一個是日本憲兵隊所雇用的白俄，一個是日本翻譯。

在外僑社會中，議論沸騰，傳說紛紜，我把這情形報告上司，因為這也是我的一部份

責任。他却滿不在乎，對於一般人的嘮叨，一點也不感到興趣。他表示，如果外國人在「滿洲國」覺得不愉快不滿意，他們最好離開「滿洲國」。

但各方面的激怒和憤恨，一天一天普遍有力，連我的上司也不得不加以注意。他似乎已經接到了東京的訓示，那些可怕的傳言，必須設法制止。

上司召集各警務機關的首領，舉行秘密會議，討論局勢，決定對策。

兩天以後，刑事警察機關的負責人，向各報發表下列的新聞：

「若干時以來，不斷侵擾哈爾濱及其附近各處的綁票匪，終於給我們發覺了。兩個窮兇惡極的大盜，一個叫華勒斯基 (Valesky) 一個叫曼特利卡 (Mandrika) 警務機關現在正從事追緝。幾天以內或幾小時以內，他們就會落入法網。」

接連幾天，刑事警察機關把兩隻「人間之狼」如何綁架殺害許多肉票的事實，供給各報，加以渲染。在每一條新聞的後面，總是聲明兩個大盜不久即將束手就擒。

這些「天真」而又「巧妙」的捏造，可能欺騙聰明的社會嗎？絕對不能。每一個人

可能從烟幕彈的後面，看出活動的真相。大家都這樣說：「日本人究竟想玩一套什麼滑稽的把戲呢？」因為大家都知道，華勒斯基因犯竊盜罪，判處徒刑三年，最近才期滿出獄。他既然被監禁了三年，又怎樣能夠犯那些綁票案呢？

好聰明的日本人！

曼特利卡也不過是極平常的「扒兒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罪惡。

是的，日本人到底想玩一套什麼把戲呵？不久這把戲就出演了。

一天下午，哈爾濱各報都出號外，據稱兩個非常兇惡的，殺人不眨眼的和犯案累累的大盜——華勒斯基和曼特利卡，在哈爾濱近郊的一幢小屋內，突然被警察截獲，當時發生猛烈的戰鬥，自動手槍射出了一百五十多顆子彈，兩個亡命之徒終於飲彈而死。

又是接連幾天，哈爾濱各報盈篇累牘地登載着戰鬥的如何猛烈，警務人員的如何勇敢，匪窟裏藏着多少軍火，以及可怕的威脅現在是消滅了，哈爾濱和北滿現在是可以自由呼吸了等等。

我的上司和東京間、東京和長春間，各特務機關的首領間，彼此表示慶祝哈爾濱大張慶功宴，獎賞高升，滑稽之滑稽，把戲之把戲！

是的，日本人確乎是十分「巧妙」的！

事實却完全相反：華勒斯基和曼特利卡被指為綁票的積犯後，就接到刑事警察機關的通知，吩咐他們暫時離開哈爾濱，住在近郊的一幢小屋裏，不要露面。兩個可憐的蠢貨，落入日本人的陷阱。他們正在吃着麵包臘腸的時候，窗外的機關槍突然向他們掃射，他們既無武器，也沒有自衛的任何機會。華勒斯基胸部中三十一彈，曼特利卡背部中十九彈。我目擊經過，事後還看到尸首。

哈爾濱和全「滿洲」人士，對於警務機關暗殺這兩個小竊的動機，是非常明白的。因為大家還紛紛談論着綁票的事情，我的上司命令檢查所，關於綁票的新聞，一概不准登載，並且命令警察隨時逮捕談論着綁票的居民。

檢查所和警務機關奉命唯謹，可是，因為綁票的風氣愈演愈烈，因為往往有人失蹤，

一去不返。所以在私人的秘密的談話中，鄉間問題仍然是主要的材料。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太當翁老許朋熙（譯音）第二次被綁在六小時內完成交易，老許出五十萬元贖票，我是這一次談判的居間人。

六月初，希伯萊人夏蒲佛斯基（Chapovsky）被綁。他雖然受着各種酷毒的私刑，却拒絕通知親友借款贖票，這樣共有三星期。憲兵隊鑑於他的態度堅決，不可動搖，便於晚間交給兩個白俄走狗，在離阿爾濱不遠的比托美（Pitomnie）地方，加以殺害掩埋。

憲兵隊脅迫可憐的未亡人，簽具證書，囑託憲兵隊向銀行領取夏蒲佛斯基的存款。銀行方面因為沒有夏蒲佛斯基已死的憑據，因為往往有人失蹤以後，不久重復見面，所以拒絕付款。而這樣可以撈錢的機會，日本的憲兵隊當然是不肯放過的。銀行方面需要的憑據，他們認為實在不費吹灰之力。他們立刻發掘尸體，割去頭顱，移往河邊某處，第二天早晨便給憲兵隊的偵探發現了。銀行方面不得不照付存款，憲兵隊分得一半。

當年六月中旬，上司吩咐老陰組織遠征隊，率領弟兄赴蒙古綁架七個會長，其中兩個是王公。七月九日，老陰回到哈爾濱，帶來十五個肉票，經過了三星期的接洽談判，才全部釋放。據一個翻譯告訴我，日本軍事當局釋放了三百萬元，老陰獲得五萬元的特別獎賞。

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我的一大願望才成爲事實。老陰率領全部弟兄，襲擊火車，殺死了二十一個日本士兵和兩個軍官，奪獲哈爾濱「滿洲國」銀行解往齊齊哈爾分行的現款三十萬元，宣佈和日本人脫離關係。

不盡財源滾滾來

日本人佔領「滿洲」之初，隨便委任「顧問」和「翻譯」。後來日本軍事當局發覺那些「顧問」和「翻譯」不久都發了大財，於是改變方針，所有「顧問」和「翻譯」的位置，必須出錢購買，誰出的錢多，就給誰去做。

「中央警察廳」第一任「高等顧問」八木，向日軍特務機關納賄五萬元。在兩年內，他成爲幾種重要產業的主人，銀行裏還有存款三十萬元。

最有利可圖的位置，是刑事警察機關的「高等顧問」。江口做了三年的「高等顧問」，每年向日軍當局孝敬十萬元，他仍然變爲巨富。

起碼警察機關裏的「翻譯」，每年也須拿出三千元到五千元的活動費。

日本人富於犯罪作惡的才能，異想天開，無微不至。他們有一種情報組織，專門探聽家屬親友的團聚和婚嫁喜慶的事情，在恰當的時候，警察特然光臨：「你們擅自集合，未經准許，到警察局去！」玩紙牌或打麻將的，被捕入警察局，唱歌唱戲是妨害治安，也給抓到警察局去。他們必須拿出很大的罰款，才能恢復自由。因此哈爾濱居民停止一切宴會請客。

於是，各警務機關又想出榨取生財的新方法。這便是所謂「門牌捐」。日本警務當局幾乎按月通知居民，爲「某種原因，門牌號碼必須變更。全「滿洲國」一律辦理。警察

挨戶調換門牌取費一元那種薄薄的搪瓷牌只值幾分錢而且不知用了多少次。所以這一筆收入對於他們實在不無小補。

每逢冬季勞苦的中國人向松花江去斫冰，賣給哈爾濱及其附近的居民。在哈爾濱，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間特別冰室，儲藏冰塊，以備夏季的需要。松花江的水可以自由取用的松花江的冰當然也可以自由取用。

然而不然，一九三三年二月間，斫冰期正將開始的時候，一個叫高橋的日本人，向日軍特務機關繳納一萬塊錢，獲得松花江冰業專利權。松花江沿岸即由日本兵駐守，不准自由斫冰，必須先向專利公司接洽，每一百公斤付代價五角。這却還不是最好的生財捷徑。

磯田開了一家玩具漆器店但不能賺多少錢，所以他決定盤給另一日本人。第二天，他向日軍特務機關接洽，情願拿出一萬元，設立「哈爾濱煙突清潔公司」。換一句話說，哈爾濱所有的煙突，必須由專利公司去清潔，否則就侵犯了專利權。特務機關接受他的

建議，派憲兵十名隨身保護，從那一起，哈爾濱便每家每天發生同樣的情形：

一個日本憲兵，一個翻譯，一個中國工人，走到人家的門口，敲門或按電鈴。

「我們要看主人。」

「各位有什麼事情？」

「我們來掃除烟突。」

「掃除烟突我家裏的烟突很乾淨，而且就是不乾淨的話，我可以叫隨便什麼人掃除的呵！」

「先生，你錯了，如今哈爾濱的烟突只有烟突清潔公司可以掃除，我們就是代表專利公司的，你必須讓我們掃除烟突，否則我們將用武力掃除，這樣，你不僅要償付清潔的費用，還要擔負違抗國法的罪名。憲兵一定會證明你是違法的。」

「清潔費多少？」

「兩塊錢。」

『好好，拿兩塊錢去罷，不敢辛苦諸位。』
家家如此。

山崎是哈爾濱最著名的惡棍之一，陰謀多端，鬼計百出。

有一天，他訪問日軍特務機關，提出開設包討債公司的建設，願與特務機關合作，收取借據期票等各項債務，以贏利的百分之二十五，作為孝敬。條件講妥後，包討債公司立刻成立。

山崎當然不高興給人家討債，他收買一切票據，不管是真是假，過期不過期，一律照票面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加以收買。票據到手以後，他向債戶討取全部的本息，利率是按月三分。如果無力償還，山崎便以憲兵隊為後盾，強佔住宅，店鋪，土地和各種財產。

試舉一個例子，哈爾濱著名的重利盤剝者布金（BOGIN）把票面共計二萬五千元的各種期票，以七百元售給山崎，有些是假的，有些已經付清，有些已經過期了許多年，其中有一張兩百元的期票，是黑爾尼克（HEINIK）夫人于三年以前寫給布金的。本息

已經完全付清，但布金當時因找尋無着，故未將期票退還，另由布金出具收據，證明一切。

但這並不發生任何效力，山崎不僅要求償還本金二百元，並且堅持黑爾尼克夫人必須照付三年的利息，按月五分計算，連手續費共達八百四十五元，那可憐的寡婦自置小宅一所，山崎便向法院起訴，請求變賣。

黑爾尼克夫人的女兒，恰在我的手下做事，她請我幫忙。我據情報告上司，他答應設法。兩天以後，山崎退還原來的期票。

這不過是我代抱不平的偶然一次的成功而已。

此外，還有一個組織，即「白俄事務局」，完全受着日軍特務機關的控制，強迫頗有地位的白俄退伍軍人做名義上的局長。他毫無實權，唯一的職務，是在日本人所準備的信上簽字。所謂「白俄事務局」對於全體白俄和「滿洲國」的每一個外僑，同樣操着絕對的權力。「白俄事務局」內分六部，雇用的都是白俄，而且都是最要不得的罪犯、廢子和「冒險家」。

各銀行，公司，工廠商店，菜館……必須向「白俄事務局」登記，如果未經登記，任何人不能雇用職員也不能找尋職業。

「白俄事務局」雇用了許多「稽查員」經常分赴各商業機關，向職員查閱「登記證」。倘無「登記證」則強迫立刻停止工作。所以，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夥計，每一個銀行或公司職員，每一個商業機關，必須向「白俄事務局」繳捐納費，結果是日軍特務機關的金庫中，「不盡財源滾滾來！」

發行彩票，這是「白俄事務局」的副業。

「白俄事務局」另外還有一種重要的任務：在俄國人和中國人間，進行反宣傳，並進行間諜工作。「白俄事務局」在「滿洲」和中國本部，設立支部，每一個支部便成為正式的情報機關。「白俄事務局」的全體雇員自然成為日本憲兵隊的特務人員了。

在北平，天津，漢口，上海等處，所有「白俄事務局」的支部，實實在在是日軍間諜的巢穴。租界行政機關和警務機關所雇用的白俄，都向「白俄事務局」登記，受着日本人

的津貼。

我替日本的特務機關工作了四年半之久，在這期間，我經常從「白俄事務局」情報員方面收到關於中國的各项報告。

天津的俄文日報（Vostokjanie）和上海的俄文日報（Slovo）都受着日本人的津貼，並且都由「白俄事務局」的情報員主持。

「白俄事務局」更爲重要的任務，則爲招募訓練白俄青年，加以組織，給以武裝，由日本人指揮，在蘇「滿」邊境製造「事件」，越界襲擊，無端挑釁，把一切責任都推到蘇聯的身上，日本可以隨便提出抗議。「白俄事務局」特別設立了一個高級軍官學校和兩個下級軍官學校，專事訓練白俄青年。

有幾次，我爲了工作上的關係，曾到蘇「滿」邊境，遇着許多穿了「和製」蘇聯制服的白俄。他們往往襲擊「滿」境的村舍，儘量劫掠，然後故意向蘇境退去，使居民相信襲擊者真正是紅軍。那些強盜穿的是蘇聯制服，由蘇境而來，向蘇境而去，無怪居民要受

欺騙。第二天早晨，日本政府向莫斯科提出強硬抗議，同盟社則向全世界的報紙散播刺激新聞。

日本人並且製造同樣性質的空中「事件」。他們把幾架飛機，漆得完全像蘇聯飛機。日本駕駛員駕着「和製」的蘇聯飛機，盤旋於「滿洲」邊境的上空，投擲無數「和製」的中俄文共產主義宣傳品，有時也投擲一兩枚炸彈。當然，日本方面立刻就派遣調查團，赴出事地點搜集宣傳品，並使居民陳述證明目視蘇聯飛機投擲炸彈和共產主義宣傳品的經過。於是，日本政府又向莫斯科提出強硬抗議，同盟社又向全世界的報紙散播刺激新聞。日本人要使全世界覺得那些該死的紅軍，都是害人的東西，於是日本人心滿意足，掩袖而笑。

「白俄事務局」把白俄雇員，分批遣往蒙古，察哈爾和熱河等處，幫助日本人進行日本化的工作。在「滿洲」的鐵路線，日本人也採取同樣的手段。凡發覺護路的中國衛隊聯絡義勇軍，不能加以信任時，由本人就改派白俄衛隊。「白俄事務局」雇用他們，每

月發餉六十元，並供給制服，供給住宿和西餐。事實上，就是那些白俄，仍不免逃跑叛變。因爲他們開拔到遠方去駐守時，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吃的是中國飯，住的是骯髒茅棚，日本人對待他們，宛如奴隸一樣。他們也從未領到一塊錢的餉。

從哈爾濱到龍門鎮的支線完成時，曾經有一批白俄叛變。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通北站的二十一個白俄衛隊，殺死了兩個日本軍官和五個士兵，他們奪獲五挺機關槍和許多枝步槍，焚燬車站，然後全體逃跑。

日本人通過了「白俄事務局」的活動，在佔領「滿洲」的最初兩年間，曾經把許多白俄家屬移殖到距海拉爾七十公里，並靠近蘇聯邊境的三江地方。「白俄事務局」允許給予經濟上的幫助，給予農具牲口和住宅。可是，他們達到三江後，太失所望，武裝的日本兵嚴密監視，強迫他們工作，污辱年青的婦女，各種暴行，層出不窮。「白俄事務局」委派杜白煦(Tirbashi)做首領，他以共產黨爲藉口，殘殺了許多同胞。

不斷的侮辱和壓迫，必然會惹起反響和報復。一九三五年八月間，三江一部份的移

民是叛變了，幾個日本軍官，許多日本士兵，杜白煦和他的幫兇，都在被侮辱者的狂怒之下，獲得了他們的報應。

第十四章

脫離樊籠

話是講不完的，本書篇幅有限，也容納不盡，而且有若干事情牽涉他人，連累外國領事，倘使我「和盤托出」，必然要侵害其它國家的法律，辜負許多朋友的好意。

我的痛苦掙扎，終於將告結束了，一九三六年之初，在小卡斯布綁票案判決以後，我成爲「衆矢之的」，各方面仇視我的情形，非常明顯。怎樣辦呢？逃跑嗎？一家五口，談何容易。而且，現款不多，也是困難之一。日本人原來允許每月給我一千四百元，但自食其言。第一個月全數照付，第二個月只付半數，第三個月只付三分之一，三個月以後，每月付二三百元，六個月以後，分文不付，我提起錢的問題，他們老是這樣說：「時局一平定，我們決全

數送奉，但時局永遠不平定，我便永遠看不見他們的錢。他們欠我五萬二千元。

雖然明知是空想，我當時仍希望日本人至少總會付我一部份薪水。

一滿洲國「的公務人員，都屬「同病相憐」。警察不發餉，軍官也不發餉。憲兵隊的長官和少數軍官，可以包庇私運、賭博、淫業和販毒，大發其財，但大多數的公務人員，只有死路一條。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法院方面獲得准許證，變賣自己的房產，售價為一萬二千元，我去收款時，他們表示在一個月以後，始能照付，並謂須在報上刊登啓事。

啓事刊登出來了，一個月過去了，二千五百元「公斷金」的要求也向我提出了，可是，我仍然不能收款。又一種啓事刊登出來了，又一個月過去了，可是，我仍然不能收款，據說我和外埠恐怕還有未清的債務。

我向上司表示過許多次，我要有錢才能生活；如果他們不能夠給錢，就應該讓我自

謀生活。他却總是這樣說：『再等一屆罷，時局比較平定後，一切都不成問題。』

有一次，我堅持要錢，他就說道：『歐洲人統治東方的時候，他們付給東方人的最高薪水是多少，你知道嗎？最高每月五十元到一百元。現在我們是主人了，我們幹麼要多出薪水呢？』

我從白天忙到晚上，做着各種令人厭惡的工作，却須依靠私人的一點積蓄過活，不禁憤怒欲狂。不過，我也有一種慰藉，就是：我要使日本人爲了「自作聰明」的卑劣手段——愚弄我，侮辱我，剝削我，並且監視我的家屬——付出很大的代價。我用各種方法使他們得不償失。我把探聽到的一切消息，祕密供給義勇軍和日本的敵人。日本軍隊出發時，義勇軍常常於事前獲得通知。

日本人要實行「搜索」或「逮捕」時（所謂「搜索」或「逮捕」的意思就是「沒收」或「綁架」）我往往先行通知對方，使他們從速逃逸。

「滿洲國」政府的許多中國雇員，都和我一樣是在日本人強迫之下繼續服務的。

但大部份已經加入秘密團體，從事暗殺日本的文武官員和漢奸。日本人遇害的不下數千人。出賣靈魂的漢奸，同時犧牲了自己的性命。傀儡溥儀曾三次被刺，他的一個侍從，焚燬了王宮的一半。長春，齊齊哈爾，哈爾濱的軍用飛機場，先後起火，破壞軍用車的次數，更不知凡幾。日本軍警無法查究線索。

在日本警務機關和特務機關密佈的偵探網下，中國人仍能保全完善的情報組織。說一句老實話，日本人都很愚蠢。對於一個「眼勢」或「手勢」，聰明人一看就懂得是什麼意思，日本人却需要劃出圖表，再加上一個鐘頭的解釋。

八月間，我又想向法院收款。我請了一個日本律師，允許給他一千元。因為當時的情形更壞，處境十分危險，必須準備出走。我的女人受了幾年的磨折，身體虛弱不堪。醫生證明她必須變換空氣，長期休養。我的上司却拒不答應，他說：「哈爾濱的氣候非常良好，你的女人沒有易地休養的必要。」

八月十日，上司問我在一九三四年是否認識李興漢（譯音）。我告訴上司，遠在日

本人佔領瀋陽以前，我就認識李興漢，他是「講武堂」的歷史教員，但自瀋陽失陷以後，即不知下落。

上司向我端詳一番，說道：「你以為你在瀋陽所認識的李興漢，和不久以前在哈爾濱松良大廈拒絕憲兵逮捕，從五層樓跳窗而死，李興漢，會是一個人嗎？」

「我怎樣知道呢？哈爾濱的李興漢，在他的生前和死後，我從未見過。」

上司又向我端詳一番，「請你寫出你的中國姓名。」

我當場寫了「樊思伯」三字。他看了一遍，把字條塞入袋內，不加批評。

然後，他又問我：「一九三四年蘇聯飛機一架被迫降落「滿」境，你曾經和兩個駕駛員接談嗎？」

「你是不是指兩個逃兵？當時是誰也不准和他們接談的。」

上司警告我道：「你不要故意開玩笑罷！你當然明白他們並非逃兵。我們所以說他們是逃兵，無非侮辱那些「紅狗」而已。我接到幾方面的報告，你在長春和他們談了半

點多鐘。」

報告完全不對，我不僅未獲和蘇聯駕駛員談話的機會，甚至不能夠接近他們。報告的人實在是太騙子。我知道我現在被人懷疑。你既然不信任我，幹麼不停止我的職務呢？我拿不到錢，反而受着各種侮辱。我很明白，一切都是爲了中村和雷左耶夫斯基那兩個毫無用處的傢伙，對我懷着敵意。

聽了我的有力的反證，上司伸出手來說道：「樊思伯君，一切都不成問題。我知道這些傢伙反對你。不過，我一面聽人家的話，一面也聽你的話。」

幾天以後，爲了討論綁架兩個猶太人和關於十九歲的阿伯拉罕維支（ABRAHAM AMVICH）贖票問題，上司召我參加。憲兵隊要阿伯拉罕維支的父親，出三萬元贖票，上司探詢我的意見。

我回答道：「據我所知，他沒有這許多錢。即使他有這許多錢，也何濟於事呢？孩子已經給憲兵隊的夥計殺死了。」

「大家都這樣講的嗎？」

「自然。」

「他們究竟講些什麼？」

「他們說，所謂綁票匪都是日本憲兵隊和日本警察機關的夥計；所有綁票的巨款，都由日本軍事當局收受。一傳十，十傳百的談論，是無法阻止的。我們不能夠把他們完全逮捕阿！」

晚上，我再去拜訪日本律師，詢問有無進展。他表示困難很多，最好是向日本法官面談，給他些錢。

無論情願與否，我不得不再受一次「榨取」。日本律師領我到日本法官的家裏，經過介紹以後，這一個狂妄自大的法官，從頭到腳看我一遍，好像我是什麼昆蟲的標本。談話的結果，我必須給他三千元，才能收取房產的售價。我不同意，當時簽了三張一千元期的票，給包討債公司的山崎。他允許我一星期內可以領款。在談話的時候，我曾幾次

提高了喉嚨，不料這一個貪污的法官竟向我表示，不要忘記了和我談話的，是日本的法學家。無恥地向我索詐三千元的司法界的惡魔，竟自稱爲法學家！

八月底，日本律師通知我到法院去領款。法院給我一張清單，上開：房價計一萬二千八百元，除捐稅二千五百元，訴訟費七百五十元外，淨餘九千九百五十元。我把清單交給出納員，他看了一遍，認爲清單內有不符之處，教我稍待片刻。我等了又等，結果他教我明天再去。

我回到家裏，憤怒異常，兩足沈重如鉛。我是完全沒有勇氣了。我已經失去了和那些畜牲鬥爭的一切力量了。我的女人有病，不便增加她的苦痛。我的十四歲的女兒，却竭力安慰我，她說：『爸爸，不要喪氣，我們一定能夠脫離『滿洲』，一定能夠脫離這些野蠻的猢猻。我們就是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也算不了什麼。你還強健，你又有才幹，現在所受的損失，將來都可設法補償。』

晚上，山崎打電話給我，說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我不得不去。他鞠躬歡迎，恭維備至，這

一種禮貌蒙蔽了全世界，被認爲是日本人的真正的品性。殊不知日本人偷理生活的精義，就是虛偽和欺騙。寒暄客套，敬茶敬烟以後，他向我表示，如果我情願給出納員（日本人）五百元，他就簽發支票，不再計較清單上的小枝節。法院裏的出納員終於不是一日本的法學家。所以開口只要五百元！我滿口答應，又給山崎五百元的一張期票。

第二天，我同出納員見面時，他含笑歡迎，表示小枝節已經改正，不成問題，隨手交出支票。山崎和另一日本人，以及他的白俄保鏢拉伯索夫（Lapshoff）已在外面相候。我們同往銀行兌現。謝天謝地，沒有發生麻煩。兌現以後，我把三千五百元交給山崎——三千元是法官的，五百元是出納員的。

晚上，「我們的路」和「哈爾濱時報」兩家俄文報館的代表，光臨寓所，各要求捐助五百元，當場給我臭罵一頓。不久，我又接到「我們的路」報館的電話，向我提出警告，如不於三天以內付款，他們將在報上發表新聞，指我是第三國際的代理人，中國國民黨的奸細，和土匪的同盟。「哈爾濱時報」也用同樣的手段。我直截表示，他們愛說什麼，就

說什麼。

我向上司報告一切，他却冷漠地聲稱，對閒談不感興趣。

我明白現在是迫近最後關頭了。

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我去訪問 C 君派在哈爾濱的聯絡員，請他傳達緊急的消息。也是那一個晚上，福多普祿通知我，中村要我給他一千元。我加以拒絕。兩天以後，他又打電話給我，他說因為我不肯拿出一千元，中村心裏非常不快，現在一千元不夠，中村要二千五百元了，否則將宣佈我的秘密，性命難保。

九月三日，參謀部的一位朋友秘密告訴我，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憲兵隊隊長和我的上司，將在晚上舉行重要會議，討論關於我被人告發的幾項問題。他允許在開會後立刻以討論的結果通知我。

第二天早晨七時，我得報告如下：憲兵隊隊長提出各種文件證據，間接地證明我和義勇軍發生關係；福多普祿宣稱，他幾次看見我在深夜從一個寺院中走出；關東軍特務

機關長對於李興漢日記簿上寫着我的名字一點，非常重視，我的上司極力替我辯護，但毫無用處。他們決定在三天以後，把我送到齊齊哈爾，就是說，使我永遠失蹤，沒有下落。

所以，我的朋友敦促我：『你必須立刻動身。』

『我的家屬呢？』

『管不了這許多。你活着離開「滿洲」，總比死在「滿洲」強得多。你留在「滿洲」，是無法營救你的家屬的，但你離開了「滿洲」，却有較好的機會。現在你還有軍事執照，逮捕令現在還沒有發出，你趕快動身到飛機場去罷！』

這確是聰明的勸告。我先去會見C君，向他說明一切，他十分贊成，並懇摯表示設法把我的家屬平安送到大連，乘船赴青島和我見面。我去向一位中國老友告別，再奔回和家屬告別。我不敢攜帶行李，太太吩咐書記伴我到飛機場，在我平安啓程後，向她報一個信。

半小時後，飛機向長春大連出發，第二天我乘輪從大連抵達青島。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晨，我上日輪青島九碼頭去迎候我的家屬，甲板上不見蹤影。我疑心出了什麼岔兒，便上船找尋。到了頭等艙，我看見一個房間內，我的女人坐在牀上哭泣，女兒愁容滿面，兒子在旁安慰他的母親。房間門口却有兩個日本警察把守，使我大吃一驚。我知道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呆立着，假裝並不關切的神氣，可又不能決定辦法。正在猶豫間，兒子看見了我，操意大利語鎮靜地對他的母親道：「快去快去，我們給逮捕了，他們還要捉你。」我立刻跳上碼頭，報告中國當局，中國當局要求日本領事允許我的家屬上岸，但結果完全失敗。

我的家屬在日本領事館，受着日本領事長時間的訊問，仍送回船上，當晚開往上海。三天以後，重返青島，中國當局再度要求，仍無效果。我的女人和兩個孩子，原船押回一滿洲。那一個晚上，日本領事館的警察長和兩個偵探到旅館，謊稱日本領事要和我談話，企圖綁票。我立刻通知中國警察局局长，他派來四個警察，隨身保護，一直到我乘了中國飛機，向上海出發的時候為止，真使我感激不盡。

重見上海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我到了上海，立刻進行營救我的家屬。首先，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我的上司，報告不別而行的原因，向他鄭重表示，我沒有進行對日不利宣傳的意思，我唯一的願望，只要能夠和我的家屬團聚。同時，我寫信給哈爾濱日軍特務機關長安藤，內容大致相同。我把兩封信抄送日本駐華大使。

九月十九日，我接到大連意國商人魯拉基（Luraschi）的電報：「因禍多普祿事件，寶眷被捕，十日內閣下如不投案，寶眷將押解哈爾濱。速匯款五百元。魯拉基。」

九月二十日，上海各報接到日本通訊機關同盟社的大連電，稱我盜取戲院業同事意國人巴杜文尼（Paduvarni）和台爾米休（Delmissier）的款項，逃出哈爾濱，所以我的家屬已給扣留。當天，同盟社又向哈爾濱各報發表消息，稱我沒有償還龐多普祿二萬五千元的債務，所以逮捕我的家屬。

幾天以後，我的辯護律師普賽梅（Prenet）接到巴杜文尼的答覆，略謂他並無向我控訴的事情，因為絕對沒有這種動機，至於台爾米休，在五個月前已經去世，所以也不可能對我提出控訴。

九月二十八日，我再度致函安藤，提出警告，倘同盟社仍散播我的謠言，我爲自衛計，不得不發表使日本當局有所顧忌的聲明。從此以後，英文報紙和俄文報紙雖不斷抗議日本軍事當局扣留我的家屬的不法行動，同盟社却默然毫無生氣了。

將近十月中旬，哈爾濱的朋友通知我，十惡不赦的中村和暗殺夏浦佛斯基的兩個白俄，已經秘密離開哈爾濱，到上海來。幾天以後，我果然看見那兩隻走狗，在法租界莫理哀路我的寓所附近鬼鬼祟祟地行動着。我的幾個朋友警告他們，要是下次再見面，將餵以毒害夏浦佛斯基的同樣藥物。

中村住在黃浦路二十五號日本總領事館內。一天，他從外灘某日本銀行走出的時候，我站在他的面前，攔阻去路，黃黃的臉孔，變成鬱金色，他慌慌張張地分辯，他到上海來

是爲了別的事情，一點也沒有麻煩我的意思。像我的朋友對付兩個白俄，我也給他同樣的警告。

兩天以後，一個日本人來訪問我，他說他是奉命來和我進行談判的。如果我能夠指出「滿洲國」內抗日團體的一部份負責的中國人和俄國人，我的家屬就可以恢復自由。我完全加以拒絕，並向他表示，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我並不知道那些人是誰，據我的意見，所謂抗日團體，只存在於日本當局的海中。我更向他提出警告，日方如不迅速釋放我的家屬，我將儘量宣佈日本人在「滿洲」的各種暴行。

他說：「我們並不顧慮這一點。你所宣佈的事情，我們可以完全否認，沒有人會相信。」結果是不得要領而散。

十一月初，某領事勸我上書東京的本野子爵，那時他在外務省的地位很高。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同時，普賚梅律師屢次訪問日本總領事毫無進展。日方一致推諉，他們與「滿洲國」並無什麼關係。不久我接到本野子爵的回信，他對我深表同情，但東京方面無

法採取有效的行動。

我對於太太的身體，非常憂慮。我料到她的健康情形，必因虐待而更趨惡劣。我已經用盡了一切合法的和平的手段，營救我的女人，但都失敗了，我決定採取其它步驟。

我寫信給哈爾濱的一位朋友，請他設法通知某君立刻動身到上海來。十一月十日，某君到了上海，我寫好一封信，請他轉交義勇軍領袖C君，第二天，他就回哈爾濱。我在信裏懇求C君設法營救我的家屬，至少設法使我的女人脫離監獄。

某君到了哈爾濱，立刻去和C君的聯絡員接洽，據聯絡員說，C君正在內地活動，很難尋覓，所以他介紹穆陵的另一聯絡員。某君又趕往穆陵，盡數日力量，終於找到了C君，當面把我的信交給他。

十一月二十三日，C君率領勁強的隊伍，襲擊海林（離穆陵六十公里），俘獲三十個日本人，其中有九個女人。隔了兩天，他通知哈爾濱日本軍事當局，謂被俘的三十一個日本人，倘日方允許我的家屬安然離開「滿洲」，就可以恢復自由。日軍特務機關長

答應向東京請示。

十二月三日，C君又要求日方先釋放我的太太出獄，否則他將槍斃俘虜的半數。第二天，我的太太就離開了監獄，移居西伯利亞飯店。

談判繼續進行。日方提出各種辦法。他們情願把兩個強盜交換一個日本人。但C君嚴厲拒絕，最後他終於獲得勝利。不過，日本人怎樣釋放，我的家屬怎樣離開「滿洲」這些都是困難的問題。日方堅持先釋放日本人，C君則堅持先讓我的家屬離開「滿洲」。結果，雙方同意：我的家屬抵達大連時，釋放一半日本人，其餘一半則在我的家屬抵達上海時恢復自由。

雙方各如所約，飽嘗六個月的苦痛後，我的家屬終於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抵達上海。

隔了一個月，日本人天門來訪問我，自稱為日本當局的代表。據他表示，東京當局對於我的事情，已經着手調查，知道「滿洲國」的日本當局待我和我的家屬，實在太不公

平，決定賠償我在財產上所受的損失，被沒收的東西如數交還，四年的欠薪也如數照付，只要等到調查完畢，一切問題都可解決。東京當局聽說我要寫一本關於「滿洲」的書，希望我打消這計劃。

六月初，快訊通信社社長弗利脫告訴我，金奈（Charles Bishop Kinney）已從「滿洲」來到上海，要和我見面。金奈的父親是丹麥血統的美國人，母親是夏威夷人，他的太太是日本人，而他自己則在南滿鐵道會社的宣傳部做事。

他在上海是很闊綽的，住在百老匯飯店，許多日本官員和若干白俄，時常去拜訪他。我在樓下休息室打電話給他，他請我到樓上去，我請他到樓下來。

我們坐在會客室裏，他對於我所遭受的卑鄙醜惡的待遇，不勝其同情和關切。他說，虐待我的家屬的許多日本公務人員，如左瀨和正一等，都被嚴厲處罰，日本當局現正進行調查，他們將補償我的一切損失。

突然，他向我說道：「聽說你要寫一本書，敘述四年半以來你在「滿洲」的經歷。我

不敢相信，因為像你這樣聰明人，決不會幹這樣愚笨事。雖然你已經歸化中國，但你生來是意大利人，日本和意大利現在是友邦，你如果反對日本，就等於反對意大利。」

我回答道：「金奈先生，日本人強迫我做了四年半的工作，差不多毫無報酬。他們反而沒收了我的要值到五萬元的財產，扣留我的家屬，先後達六個月，其中三個月，我的女人把光陰消磨在地牢裏。難道一個有血氣的男子，受了這些侮辱糟蹋，不應該設法報復嗎？日本人的口角春風對我是再不會發生什麼作用的了，日本的威脅，一點也不能夠使我恐懼的了。我要完成我的任務，任何條件不能夠轉變我的計劃。爲了日本，在日本人的壓迫之下，我曾經參與過許多罪惡的可怖的行爲，我的良心上不能夠安甯。可是，爲了洗贖我自己一部份的罪孽，爲了那些仍然呻吟於空前野蠻壓迫之下的人們，我至少應該向全世界宣佈真相。這便是我的答覆。」

太太的話

我的丈夫安然離開了哈爾濱，飛往大連。我也收拾行囊，準備第二天乘火車赴大連，轉往青島，和他見面。他能夠脫離險境，我覺得十分欣慰，對我自己倒並無什麼恐懼。他出走的消息，在二十四小時內是沒有人會知道的。第二天早晨，我領着十四歲的女兒琴妮菲（Genevieve）和八歲的兒子伊大洛（Hilto）搭乘到大連去的火車，一路之上，說不出的焦急和惶慮，終於抵達大連，坐上開往上海的青島丸。

下午兩點鐘，一個日本人走入我們的房艙，自稱為日本警察長官，名正一。他檢閱我的護照，並出示哈爾濱的來電一通，命令把我逮捕，押返「滿洲國」。要到我的丈夫回去後，才能夠恢復自由。於是他打開行李，大加搜查，把所有值錢的東西，一律沒收，計：一千日元，六百六十五舊俄金盧布，三百四十五美元，鑽戒兩隻，玉戒一隻，金手表兩隻，和其它金器若干。他強索我的結婚戒子，我加以拒絕，他向我的肩部重重擊了兩下，用俄國話罵我一聲豬鬃。

兩個孩子忍耐不住，衝到他的身上，帶哭帶求。

正一若無其事地把購物納入袖珍皮夾，從容而去。

當他忙着翻箱倒篋的時候，我的女兒把她的私蓄三百九十元偷偷地塞到胸部。後來，我把那一筆錢交給同行的旅客鮑倫斯白朗（Baerensprung）可是，一個日本偵探出賣了我們，正一向鮑倫斯白朗劫去了琴妮菲的錢。

青島丸在青島停泊的時候，我的丈夫走上船來。幸而還沒有給日本警察發覺，聰明的伊洛大就暗中警告他，趕快上岸，否則將立被逮捕。上午十點鐘，我們給押到日本總領事館，一個日本軍官對我說，如果我的丈夫不回到「滿洲」我們須重返哈爾濱。

我提出抗議，表示這逮捕是毫無理由的，是非法的，而且，青島是中國的領土，日本更沒有逮捕我的權力。那軍官却說：『太太，我們不是逮捕你的，你是我們的貴賓。』我想起正一毆辱我的事情，表示憤慨，那軍官向正一說道：

『你做了一件很大的錯事。她不是白俄，據哈爾濱來電所云。她是受過高深教育的，能夠講幾國的語言，並且是外國報通訊員。你的行為對於我們是很不利的，你最好還是

向她道歉了事。」

正一向我深深鞠躬，說道：「太太，實在對不起，我以為你是俄國人。」

我們又給押回船上，改居三等艙。青島丸向上海出發時，旅客表上已經沒有我們的名字。青島丸在上海停泊兩天，我們蜷伏艙內，不准走動一步。我們又到了青島，中國當局上船交涉，可是不能夠和我們見面。我們在大連登岸，解往憲兵司令部，二十四小時未曾進食。經過許多懇求後，才得和意大利商人魯拉基通電話，請他送些吃的東西，並請他打電報給我的丈夫，報告被捕和身無分文的經過。據憲兵隊告訴魯拉基，我的丈夫欠福多普洛的債務沒有清償，因此被控。

樊思伯接到了電報後，立刻電匯四百元，託魯拉基轉交，日方強迫魯拉基把匯款交給他們，我分文無着。

我在監獄裏坐了八天，政治警察長佐瀨和走狗柴佛洛夫（Zavaroff）從哈爾濱抵達大連。他們把我和兩個孩子帶回哈爾濱，同入骯髒的囚室。兩天以後，琴妮菲和伊

大洛出獄，和我的母親同居。

過了一星期，我在佐瀨的面前受鞠：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中國國民黨有什麼關係嗎？他是不是猶太人？他是不是互助團團員？他和「土匪」有沒有什麼關係？關於小卡斯布綁票案，他對你說過什麼話？」

我回答他，對於工作上的問題，我的丈夫從來不和我討論，任何信函文件都不帶回家中。

過了九天，他們又把我帶到佐瀨的辦公室，另有日本少佐軍官一人，英語很好，他向我問道：

「對於小卡斯布綁票案，你的丈夫幹麼要使綁票犯受嚴重的刑罰？誰慫恿他的呢？是不是猶太人？還是互助團支團？據我們所知，在過去十八個月間，你的丈夫曾經從一家外國銀行領款二十萬元，分發「土匪」，使他們炸燬日本的火車。你的丈夫每於深夜往寺院中去訪問前中國官員，到底是訪問那個人的呢？他曾經化裝過女人嗎？他曾否到過

哈爾濱的互助團支團？」

我一概回答毫無所知。

他繼續說道：「你的丈夫如今在上海寫一本書，反對我們日本人和『滿洲國』，你寫信去告訴他，要是他還想和你們見面的話，關於日本人的事情，他一個字都不能夠寫。」

我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恢復我的自由，讓我到上海去，關於你的恐嚇，我是不會寫信去告訴他的。」

佐瀨插口說道：「你真是一個固執的女子。我們日本人懂得怎樣使一個頑強的女子講話。」

隔了幾分鐘，押進一個俄國女子，形狀非常可怕。頭上沒有一根頭髮，手指上沒有一塊指甲。

佐瀨指着那女子向我說道：「你瞧，她不肯講話，我們就把她的頭髮，一簇一簇的拔

下；你瞧，她的指甲是修得多末精緻光滑啊！」

那女子可憐的淒慘的神情，幾乎使我昏厥，可是，我鼓起了勇氣，回答道：

「你們可以同樣虐待我的啊。但請你們不要忘記，我的丈夫已經恢復了自由，你們

既然知道他是怎樣人，你們對我就不得有一點顧慮。」

我重回囚室。

在我被拘禁的期間，我看見許多身體健全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從囚室中拖出去，當他們躺在擔架上，重回囚室的時候，往往四肢斷裂，痛苦不堪。以下便是幾個例子：

十六歲的中國姑娘，名韓玉儀（譯音）已經過了六個月的牢獄生活了。她受了幾次毒刑；用電流鐵塊灸燒她的腳，用火柴灸燒她的眼珠。我脫離囚室時，她仍在那裏受罪。曹希夢（譯音）太太，二十七歲，日本人用槍彈打穿了她的腳踝，迫她招供。蘇聯婦人柴哈金古（Zaharjensk）太太，已被監禁四十天，幾乎每天要上一次刑罰。她的手指都給壓碎了，頭髮都給連根拔除了，眼睫毛都給燒光了，有時把她倒懸，有時把她直吊。囚

爲她實在不知道什麼，最後才釋放了她的。

她入醫院療治，但已無法可施，終身殘廢。

他們迫我寫信給我的丈夫，請他回來，否則將以毒刑相加；他們曾經威脅過許多次，可是並未實行，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因爲挨餓挨凍和睡在濕地上，我在被監禁的一個月以後，體重減輕了二十五磅，時常昏厥。監獄醫生耶興斯基（Yasinsky）向警察長表示，如再不改善待遇，我就要送命。果然，我的家屬送來了兩條毛氈，一隻枕頭，每星期還可以送兩次食物。

被監禁後第八十八天的早晨他們忽然把我釋放，全家住在西伯利亞飯店，但我仍不能離開哈爾濱。

我出獄的時候，佐瀨對我說道：『我寫信給你的丈夫，教他不要在上海報紙上搗亂。你告訴他，雖然在『滿洲國』的『土匪』羣中，他有許多朋友，我們在上海，在他所到的任何地方，也都有暗探。』

我在西伯利亞飯店住了三個月，佐瀨訪問我幾次。他是十分客氣的了，非常關心我的健康，並且每次堅請我報告我的丈夫，身體甚好，日本人很優待，以及勸他不要發表反對日本人或「滿洲國」的任何文字等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警察總局局長召我談話。我還是很軟弱，我的女兒琴妮菲伴我同去。因為局長荒井只會講日本話，所以由松野男爵的女兒做翻譯。

荒井向我說道：「現在你和你的孩子，隨便什麼時候可以離開「滿洲」了。你到了上海以後，告訴你的丈夫，日本人雖然強迫他工作，但他勾結「土匪」出賣我們，這無論如何是不能洗刷的罪戾。」

我要求返還在青島丸上被日本警務人員搜去的銀錢飾物，他們表示毫無所知，不能負責。

我們是于二月二十一日離開哈爾濱的。我們的朋友聽到了這消息，都非常高興，但他們不敢上火車站送行，恐怕會引起麻煩。

二月二十三日，我們從大連乘大連丸赴上海。在六個月以前劫掠我的財物的正一，又出現了，我要求他返還那些東西，他含着譏諷的微笑回答道：

「你的丈夫出賣了我們日本人，你還能夠活着離開『滿洲國』，真應該感謝上帝。告訴你的丈夫，千萬不要以為已經佔了我們的上風。日本人到處可以找到他的。」

第十五章

實踐諾言

『上帝會保佑你，使你安然回到中國，使你的家屬平安無事。』

這是一個最知己的中國朋友對我的臨別贈言。他是古道可風的君子，剛毅不屈。

我接到了日本軍事當局下令逮捕我的祕密消息後，我去向老朋友告別。他兩手拍着我的肩膀，目光直射着我的眼睛，說道：

『朋友，我現在是太老了。對於親愛的同胞和親愛的「滿洲」，已經是無能爲力了。可是，你還在壯年，而你知道一切。在這五年來，西洋人能夠目視日本人如何殘酷，如何虐待「滿洲」人民的，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你最配把這一羣野獸的罪惡和暴行，加以敘述和描寫，我希望並且相信你，一定能夠安然回到中國。回到中國以後，你必須竭盡你的力量，向全世界揭發關于『滿洲』大悲劇的真相，不為日本御用的任何通訊社或報紙所歪曲掩飾的真相。」

「要宣佈赤裸裸的真相。你能夠允許我嗎？」

「我允許你，我決定宣佈全部的真相。」

「不要忘記！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

過去了一個，月，又是一個月；爲了營救我的家屬，我東西奔走，六個月的光陰，不知不覺消逝了。

日本人完全沒收了我在哈爾濱所有的財產，他們不斷給我以無情的迫害，甚至在上海還竭力使我生活不能安頓，爲了自己的生存，我不得不和惡劣的環境奮鬥掙扎；因此，我對於老朋友的莊嚴的諾言，一時無法實踐。可是，他的面孔常常活現在我的心景，他的目光好像還直射着我的眼睛，他的和善的聲音還縈繞於我的耳朵邊：「不要忘記！」

現在我已經完成我的任務了，我已經實踐我的諾言了。在這一本書裏。我揭發了赤裸裸的真相；在日本黷武主義的額角上刻着劊子手的烙印；使貪慾無厭的日本軍官，受着全世界天良的裁判；暴露這些「沐猴而冠」的禽獸，怎樣陷入了不可測量的罪惡的深淵；並且，爲了人道，爲了文明，爲了正義，向全世界宣佈了「滿洲」人民在雷霆萬鈞的壓力下所蒙受的恥辱和苦痛。

我所敘述的完全是事實，是我親眼目視的事實，往往也是我被迫親自參預的事實。許多讀者看了這些事實，必定以爲是可怕的難信的夢魘。對於那些不瞭解日本內情的人，這是可能的，不過，接觸到日本黷武主義核心的人，就覺得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了。

全世界對於日本的知識，可以構成一本「夾纏二大觀」。我們尤其不得不感謝英國。當一九零六年日俄兩國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的前後，英國在恐懼和雄心勃勃的兩種衝動之下，覺得非把「北歐之熊」——俄國——的巨爪拔去和門牙敲落不可，於是大大讚美萬分勇敢，萬分刻苦和萬分前進的新日本民族。這宣傳幾使全世界爲之如昏眼。

花。這宣傳好像神話一樣，而英國的保守黨便是創造這神話的最大幫助者。在這神話煙幕的後面，一個龐大的「科學怪人」却逐漸成長起來，威脅着當初那些創造者。

日本和日本的一切事物都是海市蜃樓式的迷景。宛如一個泡沫，遠觀是很美麗的，細看原來是幻影，而且越迫近時越見其空虛。

日本人的叩頭鞠躬和客氣禮貌，折穿了講，不過是虛偽的外表。在日本的「武士」看來，爲了目的，可以不擇任何手段。撒慌也好，欺詐也好，陰謀也好，反覆也好，虛偽也好，只要值得，什麼都好。實則虛偽是出於他們的本性。據我所知，任何人一度接觸過日本的文武官員，對於他們的粗魯卑鄙，沒有不表示深切的輕鄙。

叨了文明國家的光，像這樣的民族却具備着現代的武裝！

文明和日本的贗武主義是不能混爲一體的。日本人所有的教育，藝術，倫理，宗教，一切的一切，都是向別的國家移植，抄襲或摹仿而來的，他們在商業和工業方面的成就也是如此。不論在精神上，文化上或物質上，整個的日本是爲一羣無知無識的「剽竊者」。

所領導着。

日本文學就徹頭徹尾是中國文學的移植品。但中國文學是哲學道德和常識的寶藏，可以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日本文學却是割離隨的渣滓，建立於虛無縹緲的皇室起源說上，可謂集荒唐矛盾的大成。日本每年出賣幾千幾萬的年青姑娘，供給遠東各處的妓院；日本的父母把兒女們押給妓院，到賣身契約滿期後，再領她們回去嫁人，若無其事；像這樣的國家，還有什麼道德可說嗎？

這一羣貪婪的野狼，竟在地球全橫行無阻。在全世界的每一個都市裏，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峨其冠而華其服，裝出紳士的架子，實則全是窮兇極惡的野狼。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日本正以一百萬的大軍和無量數的武器侵略中國。幾百萬的無辜人民是給屠殺了，幾千萬幾萬萬的財產是給破壞了。但這還只能算是中國人民所受真正苦痛的開始。倘然整個中國像「滿洲」一樣被征服，日本人將以更大的努力來進行巧取豪奪，奸淫殺戮和綁架迫害的各種罪惡，企圖毀滅偉大的中國民族，其情形的

慘酷，將遠非過去我所目觀者可比。而日本人却認爲這是一替天行道。

日本的真相，日本的乖謬反常的真相，必須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使全世界及時警戒。本書所指出的姓名，都是真實的。有些人目前還在「滿洲」爲了他們的安全，我略去了他們的姓名。

我所以要完成這一個工作，是爲了兩種原因：第一，對人類文明有所貢獻；第二，效忠於「滿洲」人民，以副老朋友的願望。我的良心終於獲得安甯了。和遠東告別。我仍然可以到新世界中去開始我的新生活。

譯 後 記

本書原名「日本的情報員」(The Secret Agent of Japan)是一個在日本駐「燕」特務機關中工作的外國人，把所見所聞及親身經歷的事實加以敘述的報告文學。

我們從書內看到了日本軍人各種罪惡、腐敗、和墮落的行爲，我們從書內看到了日本的特務機關，除進行政治上的陰謀以外，還主持着專事掠奪迫害我同胞的可怕的組織，用卑鄙醜惡滅絕人性的方法，如實行毒化政策，放縱賭博，包辦妓院，開設無奇不有的所謂「專利公司」，一方面腐蝕我同胞的精神肉體，另一方面則藉此來榨取我同胞的血汗金錢，以彌補侵略經費的不足。誠如本書作者所說：「日本人以不慌不忙井然有序的步骤，來完成屠殺劫掠的任務。他們抽取被犧牲者的鮮血，使長期陷於不死不活的狀

態中。『這話是如何沉痛而深刻啊！』

然而，這一羣失了人性的野獸，竟自稱：『日本人是神明的子孫，而且地球上只有日本人是神明的子孫。』

橫行在我們東北四省的『神明的子孫』，目前又在我們的華北、華中和華南，用同樣卑鄙醜惡滅絕人性的方法，『使被征服的國家償付征服的血帳。』淪陷後的大都市如上海、南京、廣州、漢口等處，所以很快就變成黑暗世界，變成魔窟，變成人間地獄，我們讀完本書以後，就可恍然大悟了。

倘然整個中國像『滿洲』一樣被征服，日本人將以更大的努力來進行巧取豪奪，奸淫殺戮和綁架迫害的各種罪惡。『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嚴重警惕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在桂林。

“神明的孫子”在中國

每册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作者	Amleto	Vespa
譯者	邵宗漢	
發行者	國民出版社	
印刷者	青年書店印刷所	
總經售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7
144362

~~144362~~

144362